

# 学术 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 社科综合类国际交流期刊

●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 广东省第一、二届优秀社会科学期刊

● 首届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期刊评奖获奖期刊

'97·12 总第 157 期

·月刊·

# 《广东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家文库》出版

由广东省委宣传部组织、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广东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家文库》丛书(第一、二批)已经出版。1997年12月30日在穗举行了《文库》丛书首发式,会议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本钧主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于幼军出席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全文另发)。省人大副主任张汉青、老同志陈越平、张江明、省社科联主席张磊、广东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姜玉玲、广东省社科界老专家以及《文库》丛书作者等,共50余人出席了会议。《文库》丛书(第一、二批)收入著作共22种,涵盖了哲学、经济学、文学、历史学、教育学、新闻学等领域,展示了我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文库》丛书由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据悉,《文库》丛书明年将推出第三批,目前开始接受报名,采取个人申报与集体推荐相结合的办法,评选标准是:坚持正确的科研方向与学术水平并重,评人与评成果相统一。

## 《广东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家文库》目录

第一批		第二批	
经济学探索与研究	李 翀	理论的生命与价值	钟阳胜
第三产业与服务消费品 研究	李江帆	改革思辩录	易振球
文学的锣鼓	郭小东	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 研究	李新家
在改革开放中重塑人格	黎元江	在文化的观照下	蒋述卓
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	李宗桂	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探索 史与诗	张炳申
在新的价值世界中创造 财富	黄锦奎	战国秦汉六朝史研究	刘斯翰
广东改革与发展探索	许卓云	教育心理学研究	陈长琦
接合与更替	莫世祥	中国国民革命探微	莫 雷
农业·农村·农民 变革与探索	罗必良	以认识论为出发点	刘曼容
西势东渐与东方世界的 回应	梁桂全		王宏维
历史与现实的理性沉思	张富强		
	李恒瑞		

# 目

## 学术研究

(郭沫若)题

社长 主编

梁渭雄 刘斯翰

副主编

郑英隆 林有能

编辑部主任

林有能(兼)

编务主任

黄荣显

### · 学苑聚焦 ·

在《广东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家文库》首发式上的讲话  
.....于幼军(5)

广东文化建设之路上的坚实一步  
——《广东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家文库》(第一、第二批)评介  
.....王为理(7)

《广东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家文库》出版 ..... (1)

### · 学习贯彻十五大精神 ·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的深刻论述  
.....黄永尧(9)

把握好股份合作制的内涵.....温志明 陈代余(12)

### · 经济 ·

顺德改革发展战略的经济学思考.....郑年胜(14)

论中国资本市场深化的宏观效应.....陈孝兵(20)

技术改造与集约经营.....陈学工(24)

从信息经济学论及市场激励机制

——兼谈1996年诺贝尔学奖得主米尔利斯和维  
克里的贡献.....陈拾顺(28)

### · 法学 ·

改革开放与广东依法治省实践.....张富强(32)

现代企业信用的法律思考.....黎学玲 邢翔(37)

### · 历史 ·

从族谱看珠江三角洲的宗族伦理与宗族制的特点  
.....叶显恩 韦庆远(41)

清代广东沿海地区会馆分布考.....刘正刚(47)

十年来有关南昌起义若干问题研究综述...张晓冬(51)

1997年第12期

# 录

## · 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 ·

- 香港回归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郑 群(55)  
新的探索 新的建树  
——《当代中华凝聚力》序…………… 张 磊(57)  
“一国两制”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章叔才(59)  
增强凝聚力 克服离散力  
——香港回归后长期繁荣稳定的保证…… 陈剑安(63)

## · 文学 ·

- 明清之际小说评点考论…………… 林 岗(67)  
刍论古代笔记中的训诂…………… 陈焕良(72)  
雷达的文学批评初探…………… 邝邦洪(77)

## · 教育 ·

- 21 世纪南中国教育发展畅想…………… 冯增俊(80)

## · 学术动态 ·

- 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繁荣社会科学研究·  
——“邓小平理论旗帜与社会科学研究”座谈会综述  
…………… 本刊记者 哲 生(83)  
香港回归后粤台关系展望研讨会综述…… 庄伟光(88)  
粤澳关系研究的跨世纪展望  
——第十次粤澳关系研讨会综述…………… 谭湛明(90)  
关于经典的确立  
——广东现代文学研究会学术研讨会纪要  
…………… 傅宗洪 唐正杰(92)  
《学术研究》1997 年总目录…………… 黄荣显整理(94)

## ACADEMIC RESEARCH

主办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编辑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电话:83815300-283

83846307,83846177

邮政编码:510050

出版

《学术研究》杂志社

排印

番禺石楼官桥彩印厂

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46-64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M268 北京 399 信箱

刊号

ISSN1000-7326

CN44-1070

广告经营许可证

粤工商广字 010349 号

总第 157 期

- A Speech in the Conference of Issuing 'A Series of Works by the Young and Middle-aged Social Scientists of Guangdong' ..... Yu Youjun(5)
- On a Steady Step on the Road of Guangdong Cultural Construction ..... Wang Weili(7)
- 'A Series of Works by the Young and Middle-aged Social Scientists of Guangdong' Issued ... (1)
- Deep Exposition on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at a Primary Socialist Stage ..... Huang Yongyao(9)
- Share Cooperation System: Selection through History and Logic  
..... Wen Zhiming and Chen Daiyu(12)
- Shunde County's Strategy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n Economic View  
..... Zheng Niansheng(14)
- On the Macro-effect of Chinese Capital Market in a Deep Movement ..... Chen Xiaobing(20)
- Technological Reform and Intensive Management ..... Chen Xuegong(24)
- An Economic Mechanism of Market: in a View of Informational Economy ..... Chen Taishun( 28)
- The Guangdong's Administrative Practice Depending on the Law under the Condition of Reform  
and Open ..... Zhang Fuqiang(32)
- A Legal Consideration on the Credit of Modern Enterprises ..... Li Xueling and Xing Xiang(37)
-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thics and System of Family Cla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 the Light of Genealogy ..... Ye Xianen and Wei Qingyuan(41)
- Distribution of Guide Halls in Guangdong Coastal Areas in the Qing Dynasty..... Liu Zhenggang(47)
- Summary of a Decade Study of the August 1 Nanchang Uprising (1927) ..... Zhang Xiaodong(51)
- On the Return of Hong Kong's Sovereign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Coherence ..... Zheng Qun(55)
- Preface of 'The Current Chinese National Coherence' ..... Zhang Lie(57)
- Chinese National Coherence under 'One Country with Two Systems' ..... Zhang Quancai(59)
- Ensurance of Long-term Prosperity and Steadiness after Hong Kong's Return  
..... Chen Jianaan(63)
- On the Note Comments of Novel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Lin Gang(67)
- A Trial Talk about the Textual Study in Ancient Notes ..... Chen Huanliang(72)
- On Mr. Lie Da's Literary Criticism ..... Kuang Banghong(77)
- A Free Talk about the Educ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in 21st Century ..... Feng Zengjun(80)
- A Summary of the Points from 'The Symposium on the Banner of Deng Xiaoping's Theory  
and the Work of Social Sciences' ..... Zhe Sheng(83)
- Viewpoints from 'The Symposium on the Future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Guangdong and Taiwan  
after Hong Kong's Return' ..... Zhuang Weiguang(88)
- A Prospect of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Guangdong and Macao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 Tan Zhanming(90)
- Points from a Symposium: 'How Selecting the Classic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 Fu Songhong and Tang Zhengjie(92)
- General Catalogue of the Journal from No. 1 to No. 12, 1997 ..... Huang Rongxian(94)

## 在《广东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家文库》首发式上的讲话

□于幼军

对我国人民具有特殊意义的1997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即将到来。当此辞旧迎新之际,我省一些老领导、老同志和社会科学界的知名专家学者,《广东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家文库》第一、二辑的作者,新闻界的朋友们济济一堂,举行这个首发式,我代表省委和省委宣传部,对《广东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家文库》正式出版表示热烈祝贺。

组织出版《广东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家文库》,是省委宣传部贯彻江泽民同志关于“培养一批全面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学贯中西、联系实际的理论家”的指示,遵循“服务中心、以立为本、虚功实做、务求实效”的基本工作思路,加强我省社会科学理论队伍建设和繁荣社会科学事业的一项重要举措。

党的十四大以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我们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宣部的具体指导下,通过认真总结经验和深入调查研究,逐步找到了一条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要求,比较符合广东实际的宣传思想工作新路子。这条新路子概括地说,就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落实江总书记提出的“四项主要任务”,遵循“服务中心、以立为本、虚功实做、务求实效”的基本工作思路。几年来,我们遵循这条基本工作思路,在实践中着力抓好思想导向、基础工程、精品创作、班子和人才、体制和机制以及硬件建设六个环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深切地认识到,要很好地完成党中央和省委给我们确定的宣传思想工作目标、任务,要繁荣我省

的社科、文艺、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事业,人才是关键。面对宣传思想战线前几年存在的人才流失、一些单位和学科后继乏人的现象,必须下大力气抓队伍建设。要在充分发挥老一辈专家者的传、帮、带作用的前提下,加大中青年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力度,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政治坚定、思想活跃、理论素质好、科研能力强的跨世纪中青年社会科学人才。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这几年我们相继召开全省第一届青年作家代表大会、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中青年新闻出版工作者代表大会、中青年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引导广大中青年社科、文艺、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工作者,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解放思想、开拓进取,为繁荣广东的社科、文艺、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事业而奋斗。在全战线组织实施“培养跨世纪优秀人才的“十、百、千工程”,并设立了社科理论出版、文学艺术出版等基金,组织出版广东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三个系列的文库。通过这些工作和措施,扎实推进中青年队伍建设,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提供条件。今天,《广东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家文库》正式出版了,我相信,它的出版,必将激励我省广大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奋发图强、尽显才华,在社会科学理论园地留下自己栽培的一朵奇葩。

《广东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家文库》第一批收入著作12本,作者是我省首届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选出的12位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家。第二批收入10本,作者是我省社科理论界成就卓著的中青年社会科学家。两批22本著作,共约660万

字,有代表性地展示了我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哲学、经济学、文学、历史学、教育学、新闻学等领域的探索历程、学术成就和水平。透过《文库》,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经历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洗礼的我省广大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树立了勇于探索、着力创新的科学研究精神和敬业乐业的献身精神,具有良好的学术素养与开阔的研究视野,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他们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基础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相结合,为我国特别是我省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批研究成果,也促进了我省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与进步。

编辑、出版《文库》的实践表明,《文库》的编辑、出版,起到了引导我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把握正确的科研方向,调动我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科研积极性,为省广大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和活跃的学术氛围的作用。随着一大批中青年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逐步成长起来,我们有理由相信,21世纪的广东的社会科学园地,将是姹紫嫣红,春色满园。

《文库》的出版,对于入选《文库》的22位作者来说,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因为这是他们在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汗水后收获的金灿灿的果实。但是,正如我在《文库·总序》中所指出的,入选这套《文库》,不应成为作者学术成就终结的标志,而应该成为新的起点。希望入选《文库》的作者们充分发挥处于创造力最旺盛的黄金时代、已经在某个学科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甚至是学

科带头人等优势,深入到改革开放实践中,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围绕十五大提出的重大课题,深入实践,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为促进我省社会科学事业更加发展与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们生活在一个需要理论的大变革、大发展、大振兴的时代,波澜壮阔、蒸蒸日上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要求我们围绕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一步认识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求我们进一步研究开放的中国走向世界的战略和策略,以实现民族振兴的伟大历史使命;要求我们总结发达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经验教训,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可以使我国后来居上并持续发展的道路;要求我们探索和倡导新思想新观念,回答实践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保障、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社会科学大有可为。面对这前所未有的发展社会科学的机遇和挑战,我衷心希望全省广大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高地举起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深入到改革开放实践中,立足广东、胸怀全国、放眼世界,探索和回答我省在改革发展新阶段上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为广东的社会科学事业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

# 广东文化建设之路上的坚实一步

——“《广东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家文库》”(第一、二批)评介

□ 王为理

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排头兵”，在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广东的经济上去了，广东的文化呢？不少人说广东是“文化沙漠”。广东人大彻大悟：文化是可持续发展的“无本之本”，广东必须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中有所建树、有所贡献。这无疑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设立“广东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出版《广东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家文库》(以下简称《文库》)，正是这种努力中坚实的一步。

《文库》由广东省委宣传部组织、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目前已推出第一批 12 本、第二批 10 本著作，共约 660 万字。《文库》较有代表性地展示了广东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哲学、经济学、文学、历史学、教育学、新闻学等领域的探索历程和学术成果。纵览《文库》，可以感受到以下几方面的鲜明特点：

首先，《文库》突出反映了广东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经济学领域的着力探索与研究。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前沿阵地和综合实验区，广东开展了近 20 年的实践。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理论的分析与解答；丰富的实践又为理论的研究与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条件，为理论的创发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广东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充分利用广东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从各个不同侧面对经济学理论特别是经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进行了多层面、多视角的研究与探索。如《经济学探索与研究》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国际金融三个层面对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和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与对策展开了深入研究；《第三产业与服务消费品研究》建立了服务价值理论，并对近年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实践中出现的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

进行了实践性很强的深入分析；《在新的价值世界中创造财富》重点探讨了价值转化若干变化规律与价值转化工程的基本原理、步骤和方法，提出了价值转化工程这一现代价值科学新体系；《广东改革与发展探索》着重进行了宏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动态分析与对策研究；《农业·农村·农民——思考与选择》联系社会经济宏观背景，切入农村改革与发展问题，对农业、农村、农民这一主题进行了多维透视，重点探索了在这一主题上的可能选择；《变革与探索》用控制论思想研究传统社会主义计划产品经济的控制论矛盾及其改革趋向，并通过广东经济发展与变革的研究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的规律及政府政策，特别提出了“后发工业化”、“后发城市化”、“后发现代化”及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改革思辩录》对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市场经济体系、企业体制改革以及企业股份改造与完善等进行了诸多探索；《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了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问题；《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探索》对经济综合发展战略、区域工业化、社会发展和经济社会改革等问题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

其次，《文库》反映出广东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十分注重传统社会科学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传统社会科学主要体现在文、史、哲等领域，这些年受到极大冲击，其研究环境相当困窘，既表现为学科内在发展的危机，也表现为外部研究条件的恶化。这方面在先天就有不足的广东表现得尤为突出。可喜的是，《文库》表明广东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这方面具有相当大的研究热情并不乏出色之作。如《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对文化学的基本理论、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等重要问题做出了深入研究，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透彻的阐释，对现代新儒学做出了推陈



出新的分析;《以认识论为出发点……》结合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并伸展为对价值论、道德哲学、文化问题及女性问题的探讨;《文学的锣鼓》对“知青文学体系”、“文学中的女性文化迁沿”、“南方精神的再度崛起”等重要文学概念做出了颇有建树的系统阐释,对新时期文学的现代精神等问题进行了宏观论证;《在文化的观照下》运用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将中国古代、当代文艺理论中的若干重要问题置于文化的观照下加以考察,深入揭示其形成的文化背景和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文化精神;《史与诗》的汉文化研究、汉赋研究及古典诗歌研究体现出兼及文体内在发展逻辑和外部经济、政治、文化背景来审视、阐释文学史的努力;《接合与更替》遵循如实揭示历史进程及相关因素接合更替、发展演变的学术思路,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接合更替、护法运动等课题进行了颇具创意的研究;《西势东渐与东方世界的回应》重点讨论了近代中国对外关系上的史事和人物,对近代国际关系、近代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李鸿章外交思想和外交活动、近代岭南文化等均做出了深入的专题研究;《战国秦汉六朝史研究》通过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民族问题、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的研究,为中国古代国家的研究提供了有益思考,并推进了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的研究;《中国国民革命探微》围绕中国国民革命这一主题对国民革命的特殊性、国民革命与工农群众运动、国民革命与冯玉祥国民军、国民革命与孙中山等专题性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颇有说服力的新见解。此外,《教育心理学研究》通过对阅读心理、学习心理与学习理论、德育心理与心理教育的系统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活动——因素分析法”这一新的阅读能力研究方法和“学习双机制理论”这一新的学习理论。

最后,《文库》反映出广东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十分关注现实问题,重视对地方文化建设的

理论探讨。这方面的研究既为广东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及时的理论指导,也开阔了广东社会科学研究视野,推动了广东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这一点除了在经济领域有集中反映之外,在其他领域亦有丰富的体现。如《历史与现实的理性沉思》在深入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对社会改革与社会开放理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社会发展规划等与现实紧密相关的问题做出了颇具心得的探讨;《理论的生命与价值》立足于实践进行哲学思考,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社会经济增长、政府经济管理、现代科技革命、世界性产业调整趋势、国际投资变化以及领导思想和领导方法等问题进行了具有较强实践性的研究;《在改革开放中重塑人格》从新闻学特有的研究视角出发,对“有中国特色的宣传科学”、“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报业集团”、“改革开放前沿的经济文化建设”等问题进行了针对性很强的理论探讨。文、史、哲等领域的其他几本著作也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广东的历史与现实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富有地方特色的探讨,如从文学角度对岭南作家的作家论、对广东文学的文化走向和广东市民文化的研究;从历史学角度对香港、台湾地区的近现代历史及与之相关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对岭南文化的专题研究、对孙中山的研究;从哲学角度对广州文化战略和岭南文化转型的研究等等。

总体来说,《文库》从不同的领域和角度体现了广东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勇于探索、着力创新的科学研究精神,展示了他们良好的学术素养与开阔的研究视野。广东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基础理论研究与实践问题研究并举,为我国特别是广东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系列理论分析、实践思路和政策建议,也促进了广东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与进步。

作者王为理,广东人民出版社编辑,哲学博士(510102)

责任编辑:童 轩

# 学习贯彻十五大精神

##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经济建设的深刻论述

□ 黄永尧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根据邓小平理论和我国国情,对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根本问题作了全面、深刻、科学的阐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有许多新的突破,是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迈向新世纪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十五大报告第一次从9个方面论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历史进程: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阶段;2、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3、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4、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5、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6、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7、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8、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9、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这9条特征,描绘了初级阶段整个历史进程,勾画

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个什么样的初级阶段以及这个阶段所承担的历史任务,有助于人们更加清晰、更加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明确努力奋斗的目标,大大丰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使人们懂得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使广大人民在认识 and 实践中更加深切地理解为什么现在必须实行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从而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这9条,是全党统一认识的基础。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是为排除“左”和右的干扰,是要提醒全党同志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基于这一认识,十五大报告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原则性的理论总结。

一、第一次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传统的看法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生产资料公有制。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到1995年9月,十四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十五大报告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

展”进一步上升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的高度,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不仅坚持了公有制主体地位,而且从基本制度结构中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地位。十五大报告的这一表述,是对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最大突破。

二、科学地界定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扩大了公有制经济的范围。

长期以来,人们通常认为公有制经济只有两种形式——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党的十四大提出:“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随着产权的流动和重组,财产混合所有的经济单位越来越多,将会形成新的财产所有结构。”十五大报告在科学地界定公有制经济含义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这就把公有制的内涵、范围大大拓宽了。报告还进一步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十五大报告对公有制经济含义的科学界定,对于发展中外合资企业和不同所有制参股的股份制等混合经济将起极大的推动作用。

“文化大革命”后,我们党冲破“两个凡是”,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是一次思想解放。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第二次思想解放。这次十五大提出公有制应当有多种实现形式,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即产权制度上的理论突破,有助于我们站在一个新的视角来认识产权制度改革,解决长期困扰我们而在实践中又不可回避的难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这对国有企业改革走出误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对“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予以新的界定。

长期以来,在如何看待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问题上,人们往往用数量指标来衡量。这次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含义有两点:一是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二是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

用。并强调了要从质和量相统一的角度来看待公有资产占优势问题,既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有质的优势。质的优势主要表现在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技术上先进、管理上科学、效益较高等方面。公有制经济占主体是就全国而言,不同地方、不同产业可以有差别。

十五大对国有经济作了新的界定: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从地位上讲,是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从作用上讲,是发挥主导作用的。以此作为标准,现存国有企业就有一个重新定位的问题,即国有经济不应超出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和发挥主导作用这个领域。按这个标准衡量,现在的很多所谓国有企业显然是越位了。只有大企业、大集团才掌握经济命脉和发挥主导作用,成千上万的小企业并不具有这种地位和作用,没有必要搞成国有企业。这就为放开小企业提供了理论根据。

四、对“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给予新的界定。

十五大报告指出:“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这就告诉我们,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不是表现在量上,而是表现在支配上,国有经济的着力方向要体现出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要提高国有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结构,对关系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要占支配地位;在其它领域,则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把有限的国有资本集中到国有经济需要加强和充实的领域和部门,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

五、明确肯定“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

十五大报告指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

股份制是资本组合的一种形式,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需要。它通过市场的竞争有效地调整社会的产业结构,促进企业提高管理水平,推进社会化大生产向更高阶段发展。

股份制的性质取决于其所组合财产的成分及其组合方式,取决于谁控制着组合后的财产。当所组合后的财产是集体或国家而不是私人家族控制时,这种股份制企业就明显具有公有性。

过去把股份制当私有制,这次十五大一改过去的看法。

1992年初,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对股份制曾指出“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经过5年实践,十五大报告在股份制问题上有重大突破,从“坚决试”到可以用,这就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有利于在实践中去大胆利用股份制和资本市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 六、肯定各种各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

股份合作制是资本联合、劳动合作相统一的组织形式,实行按股权份额分配和按劳分配相结合。股份合作制可以成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肯定股份合作制经济对于当前改造小企业,对于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过去对股份合作制经济曾有过争论,这次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目前城乡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导,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公有制的本质是劳动者的联合体。确立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和所有者的地位,将使劳动者的发展与公有制的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

七、第一次明确肯定“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五大报告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

过去把非公有制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我们党的一系列文件中,都把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这次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

位,实现了由“对立”、“补充”向“共同发展”的转变。这说明,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内部的东西,而不是外部的东西。

八、明确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国有经济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现在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国有经济比重有所减少,对这个问题要有全面的认识。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一论断科学地回答了如何看待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下降问题,消除了人们思想上的疑虑。

九、第一次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分配制度。

十五大报告提出的分配原则有新的突破,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在传统观念上,按劳分配被视为社会主义的三大基本特征之一。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后,分配方式已呈多元化,但人们仍有所顾虑。十五大报告正式肯定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包括资本、技术、管理、信息、专利等都参与分配),只要对发展经济、对社会有所贡献,都可从中获得合理的报酬。这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出发,得出的一个新的科学结论。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的完善,更有利于发挥生产者、经营者、投资者潜在的积极性,形成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激励机制。这个突破,对全党来说,也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

**作者黄永尧,中共佛山市委宣传部长(528000)**

**责任编辑:董 轩**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公有制应有多种实现形式,并指出股份合作制就是公有制实现形式的一种,“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深刻认识,准确把握股份合作制,有效促进股份合作经济的发展,关系到十五大精神的贯彻与落实。

改革开放以来,股份合作制经历了从80年代至90年代,从农村到城市,从生产力水平较低的乡村企业到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中小型企业的不同时空、不同环境、不同条件下的跨越。这种跨越汇入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整个历史进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蕴涵了实现股份合作制的选择过程的四重行为因素,形成了我国股份合作制的具体内涵。

第一,经营者个人行为——家庭工业兴起,突破作坊生产,衍生股份合作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民有了经营土地的自主权,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并能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一些自然环境较好,乡镇企业有一定基础,有一定商业传统,劳动力素质相对较高的农村地区,相继经营二、三产业,这些在农村被“一大二公”所排斥的经济现象,一旦获得生存条件,便快速增长,并给社会带来新的变化:1.产生适合经营的环境;2.引发商业机会;3.农民能经商的观念兴起;4.出现经营型人才,有了能从事经商的“领头羊”;5.能聚积用于启动生产的少量资金。但这些经济现象绝大部分属于户办、户联办的家庭工业型而囿于家庭作坊式生产。其生产能力、经营方式、技术含量同现代化生产相距甚远。为谋求更多的资金,获得足够的技术力量,首先要求突破限制它的作坊方式,而突破作坊制最直接、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家庭工业经营者寻求合作、合伙经营。当

经营者以相应的资金、实物、技术、场地作为股份,自愿组织起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以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作为分配方式时,这种合作的过程就衍生出一种新的经济形式——股份合作经济。而其财产的组织形式、经营制度,则称为股份合作制。因此,对资金、流通、生产能力等方面的需求而衍生的股份合作制,是生产力的发展对生产关系的必然选择,是生产经营能手谋求致富的一种方式。

第二,市场行为——市场竞争催生股份合作制。

同家庭工业一样,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及地方国有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都属于“弱小动物”。在市场竞争机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一是不规范、不公平竞争行为严重,二是竞争无规律性,竞争激烈的程度难以预料。这对缺乏竞争力的企业来说,是相当不利甚至是灾难性的。上述企业普遍的困惑是:没有市场机制的作用,它们难以生存;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它们又举步维艰难以适应。这些企业总觉得先天不足,后天无力。它们对付竞争的通常做法是:1.增加资产存量,以固定资产和流动资本的增多来扩大竞争规模;2.提高产品竞争质量和竞争档次;3.加大技术投入,以技术改造降低竞争成本。这些做法的共同点是:寻求外力的注入,通过吸收外力扩充本体。但在寻求外来资金的规模投入和国家特殊的扶持

保护政策都不现实即外力有限的情况下,只有本体之间的相互吸收可供选择,而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就成为本体之间相互吸收的主要方式。这是在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尚未发育情况下,内部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作为一种仅可选择的增强竞争能力的方式,这种选择的过程就催生了股份合作制。联合作战、整体作战成为提高竞争实力的实现手段,所谓“市场风高浪急,我们造只大船出海”

## 把握好股份合作制的内涵

□温志明 陈代余

正是切中了这一点。不少乡镇企业、城市集体企业、国有小型企业先后试行股份合作制,原因之一就是联合的力量来扭转不利于竞争的被动局面,而凭借股份合作制本身的优势,它们达到了预期目的,因为联合的结果就是实力的增长。

第三,企业行为——小型企业经营从自发到自觉的经济取向,滋生了股份合作制。

非现代化生产要在现代市场中获得足够的再生产、扩大再生产条件和动力是很艰难的,原因之一是,在小型企业从投入到产出的诸多中介环节上往往被现代市场交换所排斥。现代生产体系与现代交换体系是两个深层渗透的巨大相关系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对此作了合理而简要的诠释:市场规模与交易费用成正比,企业规模与交易费用成反比。小型企业正面临自身规模小、市场规模大的二难境地。企业经营要走出二难境地,必须在两个方面同时努力:一是选择与现代市场相匹配的生产力;二是选择与这种生产力相适应但自身又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然而,不仅这种生产力很难选择,因为在与现代市场相匹配的多层次生产力系统中,许多是小型企业无法承受的,而且这种生产关系的选择更为艰巨,因为不能脱离中国计划经济尚未退出、市场经济尚未成熟的特殊历史条件。这就构成了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选择。小型企业经营者怎样实现这种选择呢?他们从自发到自觉的经济取向做出了回答:“集体太公私营太私,太公了怕统一,太私了怕割尾巴,股份合作经济又公又私,公私结合,最合胃口。”股份合作制正是在这个二重选择的过程中滋生的。尤其在选择生产关系过程中,企业不愿放弃公有制经济的某些好处,例如外部环境明显较私有经济宽松,但又不愿放弃私有经济的灵活运行机制,二者的结合,自然选择了股份合作方式。

第四,政府行为——对合伙、合股、“假集体”企业的改造,助生了股份合作制。

在小型企业群体中,有部分是私人合股、合伙企业,有人认为是非规范的初级形式的股份合作经济。尽管经营者以各种生产要素入股入伙,联合经营,共同劳动、共同管理、参照按劳分配和按股分红形式进行分配。但这些企业的投资者以亲缘、地缘关系为纽带,以约定俗成的口头君子协定

为约束,一是无正式的企业组织形式、经营制度;二是产权界定不清,投资者的责、权、利关系没有明确;三是无必要的公共积累和置留足够的扩大再生产发展基金。所以多是“一年合伙,二年红火,三年散伙”的自生自灭形式,这就同挂着集体牌子,享受集体企业待遇,实质上是私人企业的“假集体”一样。如何对这类企业进行改造?行政部门的政治取向是:一是不能把它们还原为地道的私营企业;二是不能把他们定调为正式的集体企业。正是这种既不能左也不能右的二难选择,迫使政府部门做出新的探索:一是在其“按股共有”形式下,帮助制订章程、协议,界定产权,明确责、权、利关系,以法律形式确立企业财产的法人所有权,这是股份化的改造过程;二是在其“共同共有”形式下,建立归全体职工共同所有的公共积累制度,这是合作化的规范过程;三是完善组织结构,制订经营制度,确立经营目标,这是建制和建制巩固的过程。其结果是把股份制、合作制的合理内核引进合伙、合股、“假集体”企业并且大面积布点试行,最终是政府行为助生了股份合作制。

需要指出的是:1. 由于各地股份合作制企业的个案差异,作为选择行为的四重因素,其作用的方式、程度、侧重点是不同的;2. 股份合作制的产生是四重因素合力的结果,四者可以偏重,但不可偏废;3. 四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互为因果,在企业运行过程中是无法分割的,构成了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的统一体;4. 四重因素既是常量又是变量,是常量与变量的统一。作为常量,决定股份合作制的基本结构、基本特征;作为变量,形成股份合作制企业的众生之相。还必须指出,在发展股份合作制的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失误是:一是不考虑这四重因素,人为设计股份合作制,一哄而上,出新招,搞样板,成了出成绩,败了归试点;二是割断四重因素的有机联系,搞一刀切,要么不顾企业行为全改制,要么不顾个人行为全入股。三是否定四重因素的客观性、有效性,对我国实行股份合作制持怀疑、否定态度;四是常量不“常”,变量不“变”,对股份合作制的基本结构、基本特征缺乏了解,甚至误解。我们只有真正把握好股份合作制的内涵,才能避免这些失误。

作者温志明,陈代余

责任编辑:童 轩

## 顺德改革发展战略的经济学思考

□ 郑年胜

顺德作为一个县级市,在1993年以来的短短几年内,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这里存在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即:与周边县、市相比,同处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环境基本类同,顺德却得以率先建立市场经济框架,两者间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分野?如在微观层面,企业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品牌意识、内部管理、负债状况等方面,与其它地区有很大不同吗?又如在中观层面、政府决策行为、对社会事务和企业管理方面,在建立框架前后与各地又有何不同?这些地区社会现实基础存在什么样和多大的差异,导致了顺德改革进程与发展相对超前局面的出现,这里有必要作一番思考。

### 一、顺德取得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因与推动产权改革的基本因素

同珠三角大部分地区及其它沿海省份经济较发达地区所走的道路基本一样,顺德初步经济发展的取得,也是在少量自有资本的基础上,选择负债经营模式并通过资金和人力的大量投入形成原始工业发展积累,实现生产资本的再投入和无限放大。在资金投入上,顺德在两个“五年计划”(“七五”、“八五”)时期,为什么可以高负债,组织投入了上百亿的资金,促成了今天的发展,这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国家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引发时期,资金的运用有一个很好的空间,吸引了国内外资金向顺德这类高回报地区流动,并且资金使用成本也不高,加上在全国范围的乡村快速城镇化并带动家电市场发展过程中,顺德能够抓住发展契机。

选择了以家电产品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使得产品适销对路、资金回笼情况比较好,银行贷款也较轻松。与此相配套,当时税前还贷的优惠政策(“八五”以前),可以由地方财政掌握,向重点企业倾斜,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促成顺德经济发展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大量人才的涌入。各地特别是一些老国企人才纷纷南下,在顺德较好的生活福利激励下充分释放能量,为顺德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但这部分人还不是顺德人力资源构成的主体,主体是乡镇企业崛起和乡村城镇化后,大批“洗脚上田”的农民。这部分多达几十万的农业劳动人口的再就业(转就业),直接促进了顺德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其所带来的对生产、观念的转型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事实上,在经济发展环境较为宽松的改革开放前期,解决了资金与人力问题,就可以大体保证粗放式生产经营下的经济增长。顺德正是较好地解决了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加上其它一些环节协调得较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问题的症结又归结在资金和人力资源投入在新的发展环境下,没有能够很好地得到协调和解决。

传统国企选择的是产量、产值、销售等指标,引导的是粗放型生产结构,偏重于以生产为中心的指标体系,助长了企业动作架构偏重生产、技术、销售等部门,忽视对投资回报和风险分析的控制,成本核算、财务监控、人事管理、资产管理及资本管理等不能统一在盈利最大化原则下,单纯注重资金的注入与产品的销出,没有把经营盈利放在核

心位置,较少考虑借贷资金的清偿。加之,企业经营管理层同时兼具政府产权代表身分,其在企业与政府任期基本同步,这种状况必然使得他们较少现实地着手促成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方面,任内多没有为企业的长期负债改观作必要的准备,有效监控制度的建立和系统的人才培训更无从谈起。再者,当时企业管理费按照企业的产值或销售额收取的做法,加重了效益意识的淡化。而且对企业作行政定级处理,企业管理人员仍保留干部身分及待遇并与企业拥有的人事权紧密相联,其升迁也同这一链条挂勾。这种企业制度下,企业只可能在短期内达到一时辉煌,而代价通常是遗留下大量的后续发展问题(主要是债务清偿责任),无人负责,加上国民的一团和气特性;也难有人理会清偿核算问题。恰恰顺德在推进初级工业化时,资金投入大量地不是以自有资本,而是靠借贷实现的,这就存在清偿责任和清偿期限、清偿成本问题。而且在企业借贷的清偿问题上,银行市场化运作滞后及契约意识不强,清偿期限和成本控制多流于形式,一般在国家银根紧缩政策下才被动性地加紧追偿。1988年国家进行经济调整、紧缩银根时,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敲响警钟,而且当时国家在对经济进行调控手段及方式的选择上,没有作长期考虑。即使在1992年提出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后,在企业清偿责任方面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引导。直到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向市场转型的“两个转变”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才逐步向明晰企业清偿责任转变。其时,地方政府和企业已积淀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其中相当部分是由“利转贷”形成的),尤其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房地产业的勃兴和疲软造成了企业用于这方面资金的大量沉淀,也为企业拖延清偿留下借口。1992年以后,随着银根的放松,国家经济进入新一轮扩张时期。这一时期,国家一些法律、政策相继出台到位,特别是将银行推向市场并力措实现商业化,促使商业贷款推行抵押担保方式,此举使清偿责任和清偿期限得以逐步迈向清晰,加上国家为抑制新一轮通胀的出现而再次收缩银根,以前在

“七五”、“八五”时期所形成的贷款经多次延期后,已经很难再次在宽松条件下展期。这样,企业在靠自有资金不足以支持生产发展的前提下,为继续得到银行贷款,只能接受选择:一方面转信用贷款为抵押担保贷款,以企业厂房、土地等自有资产作为贷款抵押物;另一方面接受银行提高贷款利息要求及事实。这样,企业的清偿责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迫切,而且这一时期的市场营销也在局部因饱和而趋于平淡;同时市场消费指向也逐步转向品牌化,对企业生产提出了更高要求,企业资金回笼周期和难度加大;再者,同构企业间竞争也加大了企业清偿的压力,使企业运作陷入困顿。这种现实下的一个选择是企业停产、工人下岗;另一个出路就是负起清偿责任,重新取得信用,并通过抓大放小、收缩战线、优化结构来实现可持续发展。清偿途径无非是两条:一是盘活存量资产,二是注入增量资产。这样,企业产权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和制度创新便历史地浮到现实的层面上来。

除资金问题外,顺德在初级工业化时期所依赖的人力资源构成主体,基本上是在70年代末期以后进入工作岗位的,年龄多为20出头、30岁左右,总量有二、三十万。这些人在二、三十年后,即下个世纪前十年,将相继进入退休年龄。由于其全部都是合同工,到时将存在大量的退休养老问题,即是说,这些人力资源的投入,也存在一个“清偿”责任问题。以往企业员工退休后,全部要在企业拿退休金,要解决其住房和医疗等问题。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种把职工全部包起来的做法是包不了也包不好的。企业对用于即期债务清偿的资金支出都已难以承受,遑论远期人力成本支出。所以这方面也必须要实现社会化,通过建立普遍的社会保障机制加以解决,及早考虑人力资源投入的清偿责任问题。

## 二、顺德处理改革问题的几个原则

顺德在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推进产权制度改革,特别是在解决清偿责任问题的



过程中,推行了多项举措。首先是进行综合配套改革,处理好政府责任问题。国家基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考虑,出台了大量法律和经济规范,迫使企业和地方政府必须考虑新的投入的清偿责任和已投入的清偿责任。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仍按原来的承包制,通过放权让利,依靠减免税政策促进经济发展,事实上已经收效不明了。引导和建立起地方长期发展的要素,集中反映在解决投入与回报两者关系上,也即关注点要放在企业经济效益上。而企业经济效益来源于企业运作成本、政府行政效率及市场准入透明度等多个层面。要解决“两大投入”的清偿责任问题,就需要开辟一个与前存模式有本质区分的政府管理模式和企业运作模式。政府内部在社会事务管理者角色同资产所有者角色的区分及定位,企业制度改革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各外部环境的改造已经是浮在层面的必然变革要求。

1992年前后,顺德已确立了一个思想,即对社会经济发展要作系统推进,单纯经济增长不再作为全部工作的考虑内容。由此想法后来演变为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八大系统工程”,确立了顺德五到十年内的经济发展大纲。首先对党政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其管理职能划为党务和政务两大块,政务又按照经济管理部门、社会事务管理部门以及带有服务性的、事业性的部门作进一步划分,并据此职能划分进行相应的部门并转,使政府内部各职能板块轮廓更为凸现。对一些按照上级架构设置延伸下来的管理部门,则按本地发展需求作保留或并转。如把原来的二轻系统改组为市属集团,再改造为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并包装上市这样一个过程。再如将经济管理部门按三大产业并构为四个行业局,即工业、农业、商贸和市政建设四个行业主管局。这些机构并转,为后来推进企业改革减免了多步中间环节,为其在同行业和全市改革一盘棋的统一协调下进行打下了基础。顺德改革从1993年下半年到1995年为一个阶段,主要是推进企业改制工作。其后又在1996年进行了公有资产管理系统的构建和与政府公

务员系统的分离,即推行政府两个系统(公务员系统和资产管理运营系统)的改革目标。现在看来,这些改革收到了初步效果,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预期目的。这里面首先体现出一个基本原则,即:顺德的改革方案是以能够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进行通盘考虑后作出的,顺应了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是以解决顺德再发展问题所作的理性选择,而非盲目的强行推进。这是顺德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效的关键所在,也是顺德改革遵循的首要原则。

顺德改革的第二个基本原则是不将改革的焦点集中到个别问题、个别人身上,不急于清算历史旧帐,而是从各方面充分调动市民的积极性,参与改革、支持改革。这里面有两个前题:一是改革时机问题,二是改革策略问题。顺德先期进行的机构改革,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机构内部利益格局的调整,从而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规范制度与调控手段的真空,所以需要抓住时机,推行各项改革措施和方案。顺德改革所采取的策略:一是抓住历史遗留问题的根本成因来做文章;二是抓住由改革所引发的阻力方面因素的化解来做文章;三是抓住建立一个新的发展机制来做文章。其它一些只要不是对现有改革产生较大阻力的因素,就不急于触动,留待有关的法律、政策明确时再行解决。比如在产权界定上,采取了模糊与明晰相结合的办法,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产权难以划分的情况下,都统一界定为“公有产权”(国有+集体)或政府产权。类似的,对一些一时难作区分特别是理论上有争议的问题,一般是看准了方向作低调处理,不参与理论争辩,尽量减少因争论引起的精力分散(即“多做少说”、“只做不说”)。对于因国家政策调整等因素造成的投资失误所形成的历史债务不花过多精力去追究,接受既成事实,并按现状尽可能做到理顺来龙去脉、分清责任。至于一时没有可能弄得清的,就暂时作为历史问题承接过来,不把它作为改革的绊脚石而阻滞改革进程的推进,也不急于追诉形成这些包袱的责任,注意对改革进程中民心的引导。

顺德改革的第三个原则是正视改革所触动的人的利益调整同补偿,使全体民众将改革作为自觉性行为参与进来,而不是作为旁观者,更不是受害者。对计划经济时代确立的、给予承诺的东西,作为历史事实承担下来。如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对企业经营者和科技人员退休后的福利待遇都给予承认,特别是一些从外地调进、年纪较大的科技干部或企业员工,在计算养老金和医疗保险金问题上,对其在外地的工龄都按连续工龄计算,与在顺德同等情况对待。又如在推行社会保险制度上实行普惠制,即无籍贯属地差别和户口性质差别,员工都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也无职位、级别差别,每个单位在保险险种上只有一个选择,不因职位不同而有所区别。

顺德改革的第四个原则是在具体处理资产、历史债务和权益分配等问题时,做到了高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这些工作不是由来自党委、政府的一个工作部门去完成,而是由地方政府的党政一把手组成的一个特殊的核心机构来全权处理。比如在转制初期,就过渡性地建立了市投资控股总公司这样一个全权的权威机构来具体处理这些工作。这种做法起到了稳定和加强企业承让人对转让合同份量的认识(有市长签字),同时使与企业有利害关系的银行和其他债权人对企业转制持认可和合作态度,有利于处理历史债务以及解决关系人的变更问题,是推进改革的一项不可分割的因素。

顺德改革的第五个原则是在企业转制时机的把握上,选择有利时期将企业全部或部分资产作价转让出去(即“靓女先嫁”),但对一些关系到地方发展的基础产业和瓶颈产业,如基础设施、专营性、高科技导向等产业类企业则抓住不放,仍由政府全资拥有或控股主导。在这个问题上,政府的另一个主导意见是“不与民争利”。民营资本愿意进入并且发展得很好的产业,政府一般就不再介入。而且在转制后,政府不因在已转制民营企业中没有产权而将其完全推出自己的工作范畴,而是尽可能努力创造一个公平的、有利的竞争环境以有利于企业的再发

展,包括从政策上对企业加以引导,鼓励企业到更适宜的外部地区寻求发展。如引导农业拓展至市外近 30 个地区作外延式发展,支持一些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向省外更适宜地区转移。这种做法虽然带去了部分顺德产能,但事实上输出的这部分资金和人力,多是在顺德发展空间已呈饱和的产业。多余产能的输出实际上是顺德生产的超属地外延,是更有效的资本投放和扩大产业优势的有效手段,从根本上促进了顺德经济的发展,是“无限顺德”或“顺德无限市场”观念的直接体现。

在推进企业改革的同时,顺德推行了建立新的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农村改革初看起来是与企业改革两不相干的,但实际上是与同步进行的企业改革紧密相联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改革的联动性是顺德改革的第六个原则。顺德农村改革的核心是对前存的农村政权形式和经济组织形式的改革,具体以管理区(即原来的村民委员会)为基本单位,组建经济合作社,将划入各社的生产资料包括厂房、机器设备以及历年的积累,折股量化到个人,按老人、成年劳动力、未成年人分三个档次,作为经营收益分配的依据(收益分配前要提留公益事业基金和发展基金)。这样,农村基层组织就由原来的村民生产小组(生产队)过渡到以管理区(大队)为核算单位的实体经济组织,并大大缩减了村干部的数量。在管理区、经济合作社里,只保留少量必要的干部,减轻农民负担。这里作一简单核算,光裁减村干部一项,顺德一年就少支出上千万元甚至几千万元,这相当于一些落后地区一个县一年的财政收入。顺德农村改革的另一项主要内容,是对土地资源的再分配。土地资源是农村生产的基本要素,对土地改革是农村发展能否上台阶的主要问题。顺德在土地资源的再分配上,主要是搞“三改”:一是改分包为投包,即改以前按户分土地为竞标;二是改分散为连片,即改变过去一户一小块的土地分布为连片竞标由相对集中的承包人进行规模经营;三是改长期为短期,改变过去一分田到户就长达 15 年、30 年的做法,土地承包使

用期改为三到五年。这项农村土地改革极大地解放了束缚农村经济发展的障碍,为促成土地的充分有效利用、形成大面积开发种、养殖业,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创造了积极有利的条件,也有利于改进农村建设布局,是1978年以来分田到户后的又一项有利于农村发展的重大改革举措,从整体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力地配合了企业制度的改革。因为顺德家庭的构成普遍存在部分成员在乡镇企业工作、部分成员从事农业生产,农业就业人口收入的相对增加,弥补了因企业改革而致使家庭中非农业成员在改革过渡困难时期可能出现的一时收入减少,从而使整个家庭的收入大致相对稳定,不会降低或降低幅度不大,所以顺德企业改革没有出现下岗职工因为维持不了生计而上街示威游行现象,这里除同期进行的企业保障制度解除了职工的后顾之忧外,农村家庭收入的保障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此外,顺德在推进改革过程中,注意了问题处理的连贯性,防止解决前一问题的措施又成为下个问题出现的成因。如要求承让政府企业的发起人组建有限责任公司承让原企业,并用新公司名义进行生产经营,原企业印章、营业执照、经营资质要限期注销或承继、变更,商号则可有偿使用。又如对转制后政府承担的转制企业银行贷款担保,制订了细致的担保管理办法加强管理与监控,要求企业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要首先将企业经营收益用于债务清偿,且政府对其借款担保额度按每年15%的幅度递减,力争用六至七年时间基本解决政府对企业的担保债务的连带责任问题。若企业资额达到一定额度后,企业有关报表、分配方案要经担保人同意。另外,顺德前不久颁发了一个旨在扩大抵押、质押范围的办法,尝试允许企业用动产作为抵押、质押物向银行申请贷款,这对以前抵押只能限于不动产是个突破,为盘活企业存量资产、扩大融资层面提供了可行的途径,也是顺德充分利用国家法律政策宽度进行适度调整的一个方面。

### 三、顺德地方政府公务员系统和公有

## 资产管理系统的构建

经过1993年下半年至1995年的转制工作,政府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产权界限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以所有制和政府产权为标准,可以将转制后企业划分为四个类型:一是政府独资或政府全资企业,主要是一些规模较大的优质企业或因亏损严重而一时转让不出去的企业;二是政府参股、控股的企业;三是政府不参与经营但有物业租赁内容的企业;四是政府已无产权也无租赁内容但政府还负有一定程度连带担保责任的纯民营企业。对这些明晰了产权的政府企业和已无政府权益的民营企业,政府与其应该建立和存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应该通过什么途径和手段对其进行管理与调控?就成为现实的问题。

依照产权改革进行的初始构想,传统的政企关系要在政资分离前提下作完全意义的剥离。新角色定位下,政府与企业承担的社会职能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分。政府职能主要是实现对社会的宏观管理与中观协调,企业职能则集中于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一核心目标。两者应割裂前存的行政层级管理关系,转为围绕产权介点推开管理。在这个主导思想下,就具体的框架构成和制度建立,顺德对深圳等改革开放前沿地区和新加坡等国有企业管理较为先进的国家进行了考察;根据顺德的具体情况,借鉴国内外特别是新加坡的一些先进管理经验与做法,制定了建构两套管理系统即地方政府公务员系统和地方公有资产管理运营系统的方案。地方政府公务员系统中,继续加强和完善党务工作内容,体现党在社会事务中的主导作用,政务职能则集中于贯彻党的政策和进行社会事务管理,这一块的工作重点主要是放在提高各部门的行政效率上。政府的另外一个系统即资产管理系统,也称政府雇员系统。一般而言,企业运作涉及三个方面的事务管理:一是行业事务的归口管理,包括企业投资立项报批、经济指标统计等;二是社会事务的管理,包括企业安全生产、防火防洪、环保、企业员工技术职称的报考、出国

(境)的报批手续、党务、工青妇及对退休员工的管理等;三是资产运营类事务的管理,包括企业生产经营中涉及到的资产变动、经营收益的组织以及投资立项决定等。前两个事项的管理一般由政府的行业主管部门即地方政府公务员系统负责,而第三方面事务管理则由政府的公有资产管理部负责。顺德市公有资产管理部内部按照三个层次架构建立,即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资产运营公司——关联企业。公资委代表市政府行使对市属公有资产的经营管理权,公资委办是公资委的日常办事机构,具体管理和监督公有资产的运行;资产运营公司(包括投资管理公司与集团公司)则对公资委授权经营范围内的公有资产进行具体的经营管理并负有保值增值责任;关联企业是政府产权的微观经济构成主体,按照盈利最大化原则直接进行市场化生产经营与运作。

在建立政府两套系统的过程中,顺德推行了“收支两条线”制度,统一地方政府公务员待遇,实行“六个行政”(依法行政、规范行政、高效行政、透明行政、服务行政、廉洁行政),对党政机关挂靠企业进行脱勾并统一划归公有资产管理系统管理,并且对行政事业性资产特别是房地产等物业类资产进行清查登记,也统一划归公有资产管理部管理,整个资产运营的收益归口市财政。这些措施的推行,对建立政府两套管理系统起了必要的保障作用。

#### 四、今后的发展趋势与思路

顺德在公有资产管理系统的构建与整个政府行政管理系统与资产管理系统的划分架构工作基本完成以后,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如何实现“二次创业”,使整体经济发展上到新的台阶,有些方面的工作仍有待大力

推进和加以完善解决。首先,顺德现有的体制优势、工业优势、品牌优势要想办法保持和进一步发挥,对转制中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则要通过发展去消化和解决;其次,顺德存在一个大的问题是县级市的行政架构与进一步经济发展之间的不相协调(“小市建制”与“大市经济”矛盾),要寻找途径实现迂回突破;第三,顺德的再发展要吸收国内外在保护民族品牌、发展民族工业中的经验教训,要有肩负振兴民族工业、保护民族品牌的历史使命感。顺德今后要在发挥、用好既有优势的基础上寻求发展,通过几方面并举,树立品牌经营观念,寻求资本经营的现实途径。配合这个发展思路,顺德现在的资产管理观念及手段也要作进一步的深化和提高。如在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上,对竞争行业类公有企业而言,基于盈利最大化原则,企业产权结构和管理模式都需要作进一步的规范和引导。政府管理权限及实现途径要有实质层面的变易,政府对公有企业不能再继续全方位的统驭。对有政府产权在内的企业,政府要以规范的法律途径介入企业管理与运作,具体要通过派出的产权代表,以企业所有者身分对企业进行管理,要清除加于企业之上的繁重行政管理链条。出任政府产权代表的董事、监事和财务监理人选,不一定是清一色的原政府官员,可以是一些专家、学者、社会贤达。通过吸收社会公众管理意见与监控力量,有利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规范化资产管理,也有利于推行资本运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税收,而政府产权收益则主要用于促进地方经济持续发展的各项长线投资,使社会经济始终呈良性发展态势。

作者郑年胜,顺德市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528300)

责任编辑:谭湛明

# 论中国资本市场深化的宏观效应

□陈孝兵

分析中国资本市场深化的宏观效应,首先应该从分析资本市场深化程度的表征开始,也就是明确衡量深化程度的指标体系。

## 一、资本市场深化程度的表征

一般来说,资本市场深化的表征,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数量指标来衡量。

1、 $M_2/GNP$ , 货币供应量与国民收入之比

这也是美国经济学家 I·麦金农表示金融深化、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指标。金融深化与资本市场之间有着相关的关系。“如果政府对国内资本市场收税或扭曲,那么从金融的意义上说经济就是被压制了”。①压抑的货币体系就会导致国内资本市场分裂,对实际资本积累的质量和数量都具有不利的影响,这是因为有组织的银行可贷资金减少,从而迫使借贷人更依赖于自我融资,并产生区别贷款利率。当企业的流动性差或通货膨胀高且不稳定时,就不可能进行银行体系外的金融深化,开放股票和债券市场以及由信托和保险公司进行的中介需要货币金融深化,所以,金融深化,特别是非银行体系的金融深化是资本市场发育完善程度的一个重要表征。

从  $M_2/GNP$  而言,中国仅比日本低,而高于其他国家。因  $M_2$  基本上是银行体系的负债,这一指标意味着银行负债与国民经济的依存度高,中国与日本的经济都高度依赖银行贷款。按照麦金农 1973 年对联邦德国和日本同一指标的分析,中国

1993 年数值为 112%,表明它显然不能算是“金融压抑”型经济。这一指标,说明了中国货币化程度已经达到了市场经济国家的平均水平。这里有多方面因素,中国优先推进了产品市场的市场化,而相对严格地控制金融体系各类变化,主要通过货币投放来支持产品市场的各类交易需求,经历了十多年的累积之后,使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受企业产权制度等微观基础变化相对平稳的制约,包括股票等在内的证券资产和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相当有限。一般而言,当一国经济货币化不再提高的阶段,应是具有内在自我均衡机制的市场经济体制建成之时,而中国普遍存在的资金短缺和过度需求的非同步现象,恰恰说明了资本市场发育之滞后。金融机构非平行化发展,使得中国经济中的金融发展具有完全不同于传统金融理论和典型发展方式的一系列独特样式和特征。必须承认,高度的货币化,毕竟构成了金融结构变动及金融资产证券化的动力和条件之一。

2、金融相关比率 FIR 值,即金融资产总值与同期 GNP 之比

这是美国经济学家戈德斯密斯提出来,以衡量一国金融深化和金融改革程度的指标。一般来说,金融相关比率值越大,外源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重越大,金融活动的规模与能力相应越强;金融相关比率值越低,说明经济单位的内部融资比重越大,金融范围小,资金流动较差,金融发展程度低。戈德斯密斯的金融理论主要是通

过一套体现金融结构特征指标的长期观察展开的,综合起来看,不论是金融结构的变化还是金融市场的完善,都是金融发展的构成要素,而且它们两者在实际金融发展过程中往往相互渗透,任何一方的变化都将引起另一方作相应变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结构的扭曲总是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相伴随。所以,金融结构的指标金融相关率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反映资本市场的深化程度。细分之,则有银行资产与 GNP 之比,证券资产与 GNP 之比。另外,针对证券市场而言,可有国际上通用的判断金融脱媒<sup>②</sup>的 3 个指标来判断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1)存款/国民生产总值,判断金融脱媒在现实经济中的现状;(2)存款/国内金融资产,表示脱媒与所有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资金总量之比;(3)存款实质增长率、名义存款增长率扣除通货膨胀率。

从总体上看,1991 年,中国金融相关比率与发达国家 1988 年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但与中等发达国家接近。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的金融相关比率较高。从银行的资产 GNP 之比重看,中国该指标值均高于韩国和马来西亚,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接近,甚至超过 1988 年美国的水平。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中国金融资产总量中银行资产占有很大比重;二是银行资产中几乎全部是贷款形式。日本与中国的金融结构有点相似,就是这两个国家都以间接融资为主,资本市场都受银行的支配。但中国的政府债券、企业债券和股票等证券的金融相关比率很低,它说明中国的初级证券发行量少,从而证券市场发育不足。由此可见,中国金融相关比率值比较高,金融总量增长很快,但由于资产结构具有内在缺陷,所以在二级市场上交易的金融资产比重低,影响了不同种类金融资产之间变换和流动,不利于提高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

在中国全部的证券性金融资产和其他非银行金融资产中,绝大多数都是政府债券和金融证券,股票和企业债券的规模极为有限。1991 年末,股票发行量仅占全部

金融资产的 0.16%,股票市值仅占 0.26%,占 GNP 的 0.38%,这种状况在 1991 年以后有了较明显的变化。至 1993 年末,股票的市值约占全部金融资产的 13.6%,加上其他各类有价证券的数量,占全部金融资产的 9.1%,占 GNP 的 25%。尽管这一比例仍比较小,但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提高,由此也说明中国资本市场已在相当程度上得到深化。

## 二、资本市场的作用机制

在市场经济中,个体的自利行为总是谋求福利最大化。这种个体行为对于存在有利投资机会的情况下的资产选择,将从两个方面给经济带来影响:一是资源配置合理化所带来的效率;二是多元化的金融资产对储蓄的分流和储水池作用,可保持一个稳定的货币需求,避免通货膨胀。

### 1. 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中介

传统的资本形成理论认为资本形成取决于储蓄,资本储蓄总额等同于储蓄总额,往往忽略了资本形成中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忽略了金融中介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在简单的物物交换经济中,储蓄和投资是合二为一的,储蓄主体就是投资主体,储蓄和投资随着收入的变化而出现分离的趋势。储蓄转化为投资并被利用,是要通过中间环节的,中间环节的运作效率直接影响着储蓄向投资的转化。

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方式是与金融发展和资本市场的完善密切联系的,它在经济发展和金融深化过程中呈现出阶段的特征。发展中国家投资分配的中介,一般有两种渠道:一是财政渠道,它与中央集权经济相对应,即政府集中大部分国民储蓄,控制集体储蓄的总额,决定和统一安排最适宜的投资规模。二是金融渠道,即储蓄向投资转化,主要通过资本市场和金融工具来实现,各经济主体自主决定储蓄使用方式和投资方式,储蓄向投资转化通过金融交易来完成。投资者即储蓄的净供应部门如居民通过购买股票、债券、存款等金融工

具,使剩余的货币资金得以运用;筹资者即储蓄的净需求部门通过出售股票、债券、存款等金融工具,筹措投资所需要的资金。在这种金融主导型机制中,资本市场成为储蓄向投资转移的中介,资本市场的市场机制,通过利率市场化,放松金融抑制,主要是通过国民生产总值中投资(储蓄)的比例的增加和通过改进投资的质量来影响经济增长。

## 2. 渠道效应

扩展的资本市场往往是新投资企业和技术创新投资项目出现的相应条件,各种投资主体在资本市场上争夺储蓄流量和储蓄支配权,开辟了优化储蓄分配的道路,储蓄者有更大的资产选择范围,他们的储蓄投放市场扩大了;在更大的范围内选择融资资产的规模、期限和风险成为可能;比较各种投资选择的信息也容易获得;各地的资本市场通过一体化,成为统一的市场。“发达”经济中的资本市场,成功地调节着市场的功能,这种功能推动实质资产和金融资产的收益趋于均等,不调整现有的资本存量,从而大大增加了平均收入。

在扩展的资本市场上,利率这种价格可以用来甄别各种投资机会,通过资本市场配置社会资源主要是通过借助资本的流动和组合来实现的,而资本的流动和组合又是受利率的变化来引导的,利率水平的变化反映了资本市场的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利率水平可引导资金的流向和流量,在实现资金优化配置的基础上,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产出资本率,增大社会总产出。

## 3. 分流效应

资本市场对资本形成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它可以从既定量的国民收入中最大限度地分离出储蓄,同时还在于能迅速而有效地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扩大投资总量。在银行间接融资方式形成和拓展之后,大大拓宽了资本形成的渠道。但由于银行融资的间接性、短期性和可逆性等缺陷,在一定程度上难以满足资本运动的内在要求,于是一种直接的长期的不可逆的

股票融资方式,便应运而生。股票融资方式的诞生,无疑又进一步拓宽了资本形成的渠道,拓展了资源配置的空间。证券市场融资方式的直接性,既有利于各经济主体投资权利的实现,又为具备不同投资能力的经济主体提供了均等的投资机会。

由于资本市场的存在,对储蓄可以通过其替代效应进行分流,像储水池一样吞吐货币,避免因市场机制的不成熟和竞争的不充分所带来的通货膨胀,货币投放在资本市场上要比投在货币市场上更能抵御或消除物价上涨的冲击和商品市场的波动。

## 三、中国资本市场深化的宏观效应

关于中国资本市场深化的宏观效应可以从下述四个方面加以阐述。

第一,资本市场与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是以产权关系明晰化、组织结构合理化、经营目标社会化、融资方式多样化为其特征的。企业制度安排与资本市场的演进密切相关,二者联系在于,企业是资本市场的主要参与者,是资本形成的主体。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具有两个特征:一是企业表现为政府行政体系的延伸,其组织结构与国家的行政结构具有很强的同构性,互相联结交叉;二是企业像是由整个社会生产组成的大工厂中的一个车间,其投入产出不经由契约关系与市场联结,同时资源配置是在存在纵向制度化的上下级关系的组织之间,通过法律支持的行政手段来进行的,其交易关系非货币化,此时的资本市场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市场作用非常微弱。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企业自主权不断扩大,愈来愈成为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存在独立的利益要求和预期,投资决策也相对独立化,新的投资机会和投资渠道不断涌现,作为储蓄向投资转化的中介,资本市场相伴而生。企业原始资本所有额同获得外部投资的相关性也日益减弱;资本市场的高速发展,产生了多样化的金融资产

和金融中介机构,特别是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的出现,使资金融通灵活、高效,给现代企业制度安排奠定了基础。股份制作为国有企业制度安排的选择之一,除了这种制度安排的产权关系明晰等原因之外,资本市场的深化,各种中介机构的出现,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二,资本市场与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运用财政金融政策,调节有效需求规模,从而实现总供给的稳定增长。它表明,建立一个规范、有序、能够成为中央银行进行金融宏观调控的工具并且有效发挥资源合理配置功能的资本市场体系,会增强宏观调控的力度和效果。资本市场的深化给宏观调控带来影响,尤其是资产证券化的发展给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提供了基础。中央银行凭借自己的资金实力,在公开市场上买进或卖出各种有价证券,从而增加或减少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以达到控制货币供给量和市场利率的目的。运用公开市场业务并使其发挥作用所必需的条件,就是资产市场的完善和证券市场的数量和种类适当,而中国目前还不具备进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条件,如证券品种结构单一、证券规模小、企业经营机制还未彻底转移等。

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集资,提供了一个直接融资的场所,它和银行提供的间接融资在宏观上是统一的而在微观上则对立。在现阶段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结构中,银行储蓄和现金所占的比例很大,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育,证券集资的规模会不断扩大,形成同银行信贷分庭抗礼的局面。如果财政金融的宏观调控不力,这部分脱离银行信贷和财政拨款控制的体外循环资金的增加,会导致政府控制国民经济作用的削弱。

第三,资本市场与泡沫经济。以资产证券化为表征的资本市场的深化,可能会产生经济“泡沫效应”,“投资市场之组织愈进步,则投机支配企业之危险性愈大”。<sup>③</sup>如果投机仅仅是企业发展洪流中的一点小波,也许没有什么害处,但如果企业陷入投

机漩涡而不能自拔,以致一国之资本发展成游戏或赌博的副产品,那么情形就严重了。资本市场固然有时阻挠新投资,但多数情况下是便利新投资的。

考虑到目前中国资本市场还是一个处在起步阶段的新兴市场,投资者总的来说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因此,具有适当的投机性,是股市吸引投资者加入的重要手段。但又要注意到目前中国老百姓的投资意识尚未完全觉醒,资本市场尚处在蹒跚起步的发展阶段,或过于片面提倡投资,或一味抑制投机,过早地迫使个人投资者退出市场,均对资本市场的长远发展不利。

第四,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一个较完善的资本市场,是建立资产存量和增量调整的市场机制不可缺少的条件。一方面,在资产存量和增量证券化以后,产业结构的调整实际上就是通过证券资产和实际资产的相互转化替代实现的。小型企业的资产兼并和购买,也许可以由独家企业或个人承担,但大中型企业的资产交易只能通过众多的企业或个人的共同参与才能完成,这就需要对大中型企业的资产实行股份化、证券化,通过证券的交易才能实现产权的流动。另一方面,资产交易行为的规范性要求资产评估的公正合理,在缺乏证券市场的前提下,资产的评估是困难的,只有证券市场上大量参与者的共同交易行为才能保证资产评估的准确性和资产交易的合理性。可见,证券市场的开放对于资产存量调整机制的确立是绝对必要的。

---

①罗纳德·麦金农:《经济自由化的顺序——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金融控制》,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中译本,第13页。

②所谓金融脱媒,是指融资行为不经由中介机构转手而直接发生于投资者与筹资者之间,或者说直接融资代替间接融资。

③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中译本,第136页。

作者陈孝兵,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江汉论坛》杂志社经济室主任(430077)

责任编辑:谭湛明



# 技术改造与集约经营

□陈学工

推动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由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有许多具体途径,企业的技术改造是重要途径之一。当前企业的技术改造面临着许多体制性障碍,必须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同时入手,调整有关政策,强化企业技术改造的内在机制。本文以工业企业为考察对象,对此进行初步的探讨。

## 一、企业技术改造面临的体制性障碍

在体制转轨时期,由于宏观和微观方面存在的缺陷造成了企业技术改造面临许多障碍,具体表现在:

第一,资金投入过大,企业背不动而被压垮。技改项目无论大小,都需要资金投入,资金无可置疑地成为制约企业技改的首位因素。是否量力而行,也就成为技改项目能否奏效的重要前提。企业要一只眼睛盯住高新技术,一只眼睛看自己的“腰包”,量体裁衣,看菜吃饭。如果眼高手低,一味追求高技术大规模,投入过大,超过负债的极限,即使技改项目其它方面都很理想,光债务一项就可能会把企业压垮。

第二,利息支出加大企业负担,影响其经济效益。由于历史原因,国有企业自有资本不足,资产负债率偏高。1995年末国有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65.8%,高于工业化国家企业的平均水平。在资本市场尚不发达的条件下,企业技改资金的缺口,绝大部分是通过银行贷款解决的。如果缺乏适当的贷款利率优惠政策的支持,还本付息就成为企业沉重的负担。即使能够按期还本付息,也必将大大增加企业的产品成本,降低了企业的盈利水平,过高的产品成本

也势必削弱产品和企业的竞争力。

第三,某些优惠政策的调整,影响到企业技改的积极性。实行拨改贷,这是走向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本身无可非议。问题在于,拨改贷之后,能够享受技改利息优惠的毕竟是少数,企业觉得把资金用于技改与用在其它方面并无区别,挪作它用也无所谓。企业靠贷款搞技改,形成的固定资产是国家的,而债务却由企业独担,在责权利上不对称,况且经常连贷款也贷不到。又如税前还贷政策,原来曾实行过一段时间并确实起到鼓励的作用,后来说它“不规范”,给取消了。利息加上税负,超过了企业的承受能力。

第四,折旧基金提取不足,致使企业技改严重“贫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提取的折旧基金全部或大部分上交回家,现在,折旧基金管理办法已改革,提取的折旧基金可以全部留给企业自行安排使用。按理讲,企业比过去有了更大的支配权,但由于折旧率偏低,无法抵补因无形损耗和通货膨胀所造成的贬值,企业使用技改资金时依然力不从心。1992年实施新的财务制度后,允许企业采用固定资产折旧的弹性年限,准许部分企业经批准实行快速折旧,但事实上很少有企业这样做。因为加速折旧会增大成本,成本增加意味着利润减少,而利润又是衡量和考核经营者的重要指标,经营者在决策时往往会迁就于短期行为。在实行承包制的条件下,少提或不提折旧以追求所谓的利润最大化的做法就更常见。

第五,企业决策失误或管理不善,造成技改项目失败。一些企业搞技改的积极性很高,却缺乏科学冷静的态度,上马之前没有经过充分的谁,上马之后又疏于管理,使

技改项目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如有的项目技术确属先进,却不适用,投产后无法打开市场;有的项目预算不足,上马后不断追加投资,实际投资额大大超过计划投资额,使预测能盈利的产品变成亏损;有的项目错过上马的最佳时机,上马时利率、汇率变动或市场价格急剧变化,企业没有及时作出调整,从而付出惨重的代价……以上种种说明,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必须从项目内容、技术水平、产出能力、资金预算到筹资能力、时机选择、市场前景、配套条件等方面反复论证,科学决策,严格管理,否则,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出现漏洞,都会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失,严重时甚至会置企业于死地。

## 二、建立推动企业技术改造的内在机制

既然当前存在着妨碍企业技术改造的体制性障碍,我们就应当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目标出发,按照“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要求,着力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建立起推动企业技术改造的内在机制。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竞争是市场竞争的焦点,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企业,必须成为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的坚实的微观基础,而政府则积极为推动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和必要的外部条件。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我国尚处于新旧体制转轨的现阶段,更应当双管齐下合力推进。

从政府行为看,主要应建立和完善以下宏观机制:

1. 财税优惠机制。市场经济要求公平税负、平等竞争,同时又鼓励技术进步,保护先进,鞭策落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基础性作用,政府的政策调节也对资源配置施以重要影响。在企业技术改造的资源配置中,政府的政策调节尤其是财税调节发挥着重大甚至是主导的作用。如美国政府对企业技术改造实施多项优惠的财税政策,包括:(1)1962年开始颁布并一

直沿用至今的《技术改造投资抵免所得税法》,其性质类似于“税前还贷”;(2)1981年颁布的《经济复兴法》,允许企业把应课税的盈利拨出一部分,用于建立企业投资储备金,由企业用于更新改造等特殊投资;(3)企业开发新产品,政府给予低息贷款,比一般利息要低6—8个百分点;(4)州政府发行工业开发债券,其收入用低息贷给企业使用;(5)有些州规定,企业购置新设备,州政府给予设备款7%的补贴;企业购置新技术的设备,州政府补贴30%,等等。我们应适当借鉴国外的经验,综合运用财政补贴、贷款贴息、税收减免、投资优惠等经济杠杆,为企业技术改造提供较宽松的环境。对以前过滥的税收减免确有必要加以清理,纠正不规范的行为,但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不仅应继续推行,而且还要有更多新的优惠措施出台。对先进科技在企业的应用和发展给予更有效的扶持、鼓励,这与公平竞争毫不矛盾,相反,限制先进、保护落后才是真正的不公平竞争。

2. 资金倾斜机制。企业技改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逐年下降,是不正常的;政府和企业投入的资金有限而且分散,不能集中投入和使用,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因此,要制订和完善有关政策,保障资金投入能向技术改造项目倾斜。首先,要拓宽资金来源,引导各类资金包括国内外银行贷款、股票债券、民间闲散资金、外商投资等投向技改方面,形成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资金投入体系;其次,大幅度增加技改的信贷规模,在信贷计划中增大对技术更新改造贷款的比例,并根据具体项目给予不同幅度的优惠利率;再次,投入企业技改的财政资金,其增长幅度要高于每年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并硬化约束手段保障资金到位,不得挪用于基本建设,也不得用于一般的生产经营项目;最后,建议设立工业发展基金,由财政、银行、企业加上向职工或社会集资,各按一定比例出资形成稳定而雄厚的资金来源,重点用于企业重大的技改项目,项目产生的效益或风险与出资额对称挂钩,形成利益共同体,让

基金在动作中滚动增值。

3. 相关的配套政策。除了直接投入外,政府还应重视相关的配套措施,努力为企业真正成为企业技术改造的主体创造有利条件:在利益导向上,灵活运用各种经济手段,保障企业能够从技改活动中实实在在获得利益而不是相反,有了利益企业才会有更大的劲头去搞技改;在评价考核企业的指标体系方面,要将主要体现为外延扩大再生产的指标,如产值、销售收入、利税额、增长速度等数量速度型指标,改为主要反映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指标,如全员劳动生产率、成本费用利润率、产品销售率、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收益率等质量效益型指标,客观评价和反映企业因技术改造带来的变化;在实施过程中,要注意三个结合:一是技术改造与结构调整相结合,对重点产业的技改项目重点扶持,使技改与产业结构优化过程统一起来;二是技改与“抓大”战略有机结合,对优势企业的优势产品重点倾斜,帮助企业解决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经营所遇到的困难;三是产、学、研相结合,为密切企业与科研单位的联系穿针引线,提高科技与经济活动的关联度,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研究院所、高等院校、技术服务机构共同推进企业技术改造的新局面。

从企业行为看,主要应在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

1. 眼睛向内,自觉坚持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的发展战略。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政策扶持,最终只有经过企业才能起作用,企业自始至终都是技术改造的出发点、落脚点和归宿点。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政府职能已逐步转变,现在,企业自主权基本到位,而如何真正用好企业自主权就成为突出问题了。走外延扩张还是内涵发展之路,是带方向性的战略大事,企业必须摆脱依靠争投资上新项目求发展的传统思维定势,转到靠技改拉动企业增长的新路子上来,否则有了自主权之后的企业,未必真能把企业搞活办好。北京燕山石化公司,从1993年至1996年4年间,没上一个新项

目,眼睛向内,大力采用新技术改造老装置,成功地将原年产30万吨乙烯装置改扩建为年产45万吨,比新建一套年产15万吨乙烯装置节省投资一半,项目投产后,公司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全面刷新了历史记录。燕化等许多企业的成功实践证明,企业的命运就掌握在企业手上,企业建立自主改造机制,走内涵发展的道路,是完全走得通的。

2. 建立科学的投资决策机制,选准项目。技改投资与其它投资一样,存在着一定的风险。高新技术可以产生高效益,也会带来高风险。将科技进步与投资活动融为一体的技改过程,必须力求效益,规避风险。为此,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建立科学的投资决策机制,选准技改项目。要坚持科学论证,多方案分析比较、筛选,既要维护企业领导层的决策权威,又要广泛吸纳专家、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有关人士的意见;既要突出技术水平的提高。也要全面考虑财务、销售、环保、盈利水平等因素,综合研究项目的可行性,避免草率决策。

3. 滚动改造、滚动发展。技改是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科技在不断进步中,技改的目标是无限的,而一定时期内企业的财力是有限的,这对矛盾决定了企业在技改过程中,一般来说只能采取“整体规划,分步实施,小步快跑,滚动发展”的策略,即将整个技改目标分解成若干个部分,制订出阶段性的目标,再一个个地实施,分阶段去完成,这样,既可以推动技术进步,又不致于陷入财务危机;既能渐进发展,又不背离登上科技制高点的总目标。事实证明,滚动改造、滚动发展是企业技改成功的有效途径,在当前多数企业技术落后而又负债较多的情况下,尤其应采取这种策略。

4. 完善技改的监督约束机制,强化管理。项目上马之后,管理有没有跟上,效果大不一样。在立项之后,要制定出稳妥的改造方案,明确量化的考核指标,同时,层层落实技改项目的责任人、监理人制度;在

建设施工过程中,要严格控制工程的进度、质量和投资,对投资实行切块包干和限额设计,保证不突破预算,按时达产达效;项目竣工之后,要严把审查验收程序,确保技术指标达到设计要求,投产后还要建立质量跟踪制度,真正做到改造一项,成功一项,收效一项,切实使企业因此而受益。

### 三、技术改造也要集约经营

我们说,技术改造是集约经营的重要途径,是从整体而言、与上新项目比较而言的。这不意味着所有的技改活动都属于集约经营,或者说,技改本身不存在提高集约经营水平的问题。恰恰相反,提高技改的经营集约度,是当前企业技改活动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笔者认为,当前企业技改存在着不同程度粗放的经营倾向,主要表现在:

第一,借技改之名行基建之实。挪用、挤占技改资金,变换手法搞基建、上新项目,是多年来存在的痼疾。企业一方面抱怨折旧率低、技改资金不足,另一方面,有了加快折旧的政策却不去主动利用,连已提的折旧费用也想方设法挪作它用。1992年起,国家取消了对企业更新改造基金专款专用、专户管理的限制,旨在克服资金管理过死的弊端,让企业能更灵活地营运改造更新资金。然而,许多企业误以为可以不为技改专门准备资金了,把本应用于技改的资金调走,用到其它方面。结果,折旧基金成了机动财力,成了基本建设的补充来源。有些企业只看到国家对技改的优惠政策,把技改项目变为争投资、争优惠的幌子,而有关部门在安排技改资金时,为了“摆平”只好用“撒胡椒面”方式,方方面面都给上一点点,无法按产业政策的要求,使技改资金发挥内涵扩大再生产的功效。

第二,技改项目体现不了技术进步。技改的目的是科技进步,但是,许多企业搞技改只是随大流,没有严格把好技术进步这一关,上马的项目不过是原有设备、工艺的简单复制和扩大。或者,上马时虽略有

领先,但投产之后已变成陈旧落后,老跟不上产品更新换代的节奏,技改反而成了“复制古董”的手段。

第三,管理粗放,效益低下。集约经营与粗放经营的区别,最终要体现在投入产出比率的高低上。目前,技改每投入1元,可产出2元,创税利0.4—0.6元,虽然高于基建投资,但这个比率水平也不高,与发达国家技改的投入产出率相比,差距就更大。效率、效益不高与管理粗放直接有关。许多企业为改造而改造,重硬件轻软件,重引进轻自我开发,重“跑步(部)前(钱)进”轻后续管理,不可避免地带来广种薄收的结果。

为了提高企业技改的集约经营水平,必须加快转换企业的经营机制,把技改与国企改革紧密联系起来。因为,技改毕竟只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一个部分,其经营水平要受企业总体水平的制约。企业只有在公司制改造、建立法人治理结构、降低资产负债率及产权界定、责权明确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才能真正确立企业技改投资主体的地位,技改的集约水平才会相应提高。在此前提下,建议采取三项具体的对策措施:一是通过立法,确保技改资金的用途不被随意改变,凡将技改资金挪作它用者,不论是企业、个人还是政府部门,都将追究其责任并依法惩处。二是采用技术进步贡献率指标,作为考核企业领导班子实绩的一项重要指标,只顾上技改项目而没有相应提高技术进步贡献率的,企业负责人应负担相应的责任,反之,如果贡献率有明显提高,则应予以奖励。三是对重大的技改项目,由政府牵头组织有关专家成立评审小组,投产后对项目进行评审,主要从技术水平、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三方面进行评审,不合格者应限期整改;一般的技改项目,由企业参照以上办法自行组织评审,力求提高技改项目的成功率。

作者陈学工,广州日报理论部副主任  
(510121)

责任编辑:谭湛明

# 从信息经济学论及市场激励机制

## ——兼谈 1996 年诺贝尔学奖得主米尔利斯和维克里的贡献

□陈抬顺

信息是一个相当广泛的概念,指的是各类信息源所发出的各种信号和消息,经过释放、传递和转换而被人们所感知、接受、认识、理解和利用的内容的总称。有关信息的研究,最初只是在通讯理论、应用数理统计方法上寻求信息处理和传递过程中的一般规律,以及探讨如何提高各类信息传输系统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当研究超越了通讯领域,渗入到其他各个学科,如与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概念交融并加以改造则发展成信息经济学,它研究信息的经济作用和效果、信息的成本和价值、信息系统的经济评价标准和方法以及信息经济理论包括信息经济学的对象、特点和基本内容等。

有关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文献最早见于本世纪 60 年代初。1961 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Stigler)在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信息经济学的论文,首次提出了信息的经济问题,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重视和关注。此后,他在信息经济领域继续探索,并撰写成多篇论文,于 1982 年以书名《信息经济学》结集出版。在此同时,其他西方经济学家如马克卢普、阿罗等人也先后对经济学特有的信息范畴进行研究,他们也都成了信息经济学的奠基人。

在《信息经济学》一书中,斯蒂格勒研究了信息在市场活动中的作用,以及消费者与生产者是如何根据他们所了解到的信息的多少去购买尽可能廉价的商品的。在他看来,传统经济理论忽视了与信息有关的广告行为这类信息的传播问题,认为消费者和生产者在他们决定自己的行动之前已完全获得了有关销售市场的信息的看

法,实际上是错误的。这是因为,搜集信息是困难的和需要花费代价的,人们只能得到他们所需要的部分信息,而其中不免得到的错误信息往往会引起物价的坚挺和资源配置的不合理配置。但这都是销售市场上不可避免的基本现象,靠政府干预是不可能解决的,必须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第一,斯蒂格勒认为信息经济学的重点是探讨信息的提供与信息搜集间的关系,信息的取得和所付出的成本实际上影响到厂商的生产和投资决策、研究开发等等。对消费来说,即牵涉到对产品质量是否有充分的了解而不致发生所得不及所付的情形。对此,在《价格与非价格竞争》一文中,他特别以百货公司为例,认为其功能就在于确保商品的质量,以减轻消费者购买的风险。他说,一旦百货公司取得消费者的信任后,商誉就成为经营者的无形资产。因此,一个类似很单纯的提供零售劳务的行为,实际上还包括了提供正确信息的功能。对生产者来说,如何确保产品的质量是一个重点。厂商强调产品质量本身就说明市场上的产品不是同质的,于是厂商间的竞争就不是价格的竞争,非价格的竞争可能更为重要。非价格竞争的特性之一,就是产品质量的认定,其本质仍与信息的传播有关。

第二,斯蒂格勒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对厂商的价格行为进行了考察。他认为,由于信息成本的存在,面对市场风险,厂商并不仅仅调整产品的价格,有的产品数量的调整比价格的调整更为频繁。斯蒂格勒还基于对“短期”范畴的精确化,深入地考察了短期与长期中价格调整与产品数量调整

的特点。按他的观点,所谓“短期”,可以定义为这样一种时期,在该时期中,某些投入是自由变量,而另一些投入则是固定不变的常量。前者无须价格变动的影响就可以变化,而后者的变化则必须以价格的变动为代价。由此便可以看出,短期内企业主要实行产量调整,即调整劳动力、原材料的投入和存货量,而对于短期内的固定常量,像资本设备、稀缺原料以及生产周期较长的固定投入量,则需要相应的价格刺激为基础才能进行调整。

第三,斯蒂格勒专门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劳动经济问题。在《劳动市场上的信息》一文中,他指出,在劳动市场上,企业主找工人,工人找工作;更具体地说,企业主是在找合适的工人,而工人则是在找有较高工资的工作。假定在劳动市场上工资并非只有一个水准,因而工人找到更高工资的工作机会受到寻找次数的影响。工人只要去找工作,就有可能找到比现职工资为高的工作机会而给自己带来较高的收益。但工人找工作也要有成本,于是在成本与收益之间就会决定寻找的次数;对厂商来说,雇佣新工人既要支出雇佣费还要花费训练成本。因此如果信息的传递不健全,工人常更换工作,而厂商经常在找人,则对整个社会可能有不良的影响。但是,如果从另一角度看,只要工人能找到比现职的工资为高的工作机会,工人离职他就,是表示劳动力向生产力水平较高处的流动,这意味着资源的合理再分配。

自80年代初斯蒂格勒的多篇论文结集出版成《信息经济学》以来,有关信息经济学的论著大量出版,它们从各个角度特别是在不对称信息和不确定条件下所展开的理论探讨和对实证性案例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使得信息经济学成为微观经济学中最为活跃和成果最为丰富的领域。199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两位在信息经济学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经济学家——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 A·Mirrlees)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廉·维克里(William Vickrey),便

是这一成就得到公认的明证。

当前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信息经济学是研究在不对称信息情况下,交易当事人如何制订契约或制度及其行为规范问题,就是说研究的核心是在各种信息条件下的决策问题。它沿用信息论关于信息是有序性度量的观点,将信息定义为“不确定性的负测度”,认为信息的增加意味着不确定性的减少。基于此,经济主体要作出最优决策,必须搜集有关市场信息,以尽量减少不确定性。但是,搜集信息并不轻而易举,而且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因而获取所有市场信息既无可能,也无必要。这就存在着信息搜集的某种适度,换句话说,经济主体不应追求目标的最优化,而应追求目标的适度优化。由于经济主体行为的约束条件不是既定的,而是可变的,所以,经济决策所依据的市场信息不是一个恒量,而是一个变量。例如,消费者选择商品组合时,不仅可以依据该商品及其替代品价格的信息,还可以依据该商品过去的价格走势、销售数量的变动信息,以及政府有关政策对该商品未来的价格、销售数量造成影响的信息。有时,这些信息本身也许没有多大的经济重要性,但它却有助于减少经济主体在预测其他难以掌握或无法掌握的经济变量时的不确定性。这样,信息经济学就确定了非价格信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两大支柱——经济主体最优化行为理论和市场均衡理论——中的地位,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仅仅考虑价格信息而舍弃非价格信息的不足。

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市场经济主体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按照某种目标作出最优选择。例如:消费者在既定的商品价格和收入水平的约束下,按照其偏好目标选择最优商品组合;生产者在既定的生产要素价格和生产因变量的约束下,按照其利润最大化目标选择最优的投入和产出组合。在这当中显然隐含着“完全信息假定”,即市场上的买卖双方对任何一段时间内某种商品的供求情况都了如指掌,因而市场均衡价格(商品的需求价格与供给价

格相一致时的价格)的实现成为当然的结果。信息经济学对此不以为然,其理由是,这种“完全信息假定”脱离了经济现实,是一种想象中的理想化状态。在信息经济学看来,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倒是市场经济普遍存在的现象,必须以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代替“完全信息假定”,来修正经济主体最优化行为理论和市场均衡理论。应该说,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完全信息假定”相比较,信息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普遍存在的是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的观点,无疑更接近于现实经济活动。

由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侧重于在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情况下,分析经济运行中个人和组织的行为及其互为前提的对策,因此派生出诸如最优契约理论、最优税收理论和资本的委托——代理理论等等。

根据信息经济学的观点,在市场上,交易双方都拥有一些只有自己知晓而不为对方或其他人知晓的能够影响彼此交易利益的私人信息。换句话说,有关交易的信息在交易双方之间的分布是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信息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外生性信息,例如当事人的能力、偏好、身体健康状况;另一类是内生性信息,取决于当事人的行为表现。由于市场上普遍存在不对称信息,光凭竞争性的价格体系难以实现有效率的交易。有鉴于此,米尔利斯和维克里各自在分析不完全相同的具体经济问题中,完成对不对称信息条件下激励问题的经济学分析,设计出能够产生激励效益的契约和制度,使当事人有可能吐露私人信息,以实现有效率的交易。信息经济学常举企业主雇佣员工的例子来说明:企业主事先并不确切了解应雇员工的实际能力,需要设计出一种如何促其吐露私人外生性信息的激励机制,以达到最好的契约安排。在企业主和应雇员工签订雇佣合同后,企业主对雇佣员工的行为如果无法监督、约束,那就难以知道雇佣员工是努力工作还是偷懒塞责,即无法观察到雇佣员工的某些私人信息。在这种情况下,雇佣员工可

能会利用其独占性的私人信息,采取损害企业利益的行为。因此,企业主为了保证雇佣员工努力工作而不是偷懒塞责,还需要设计出一种如何让其披露私人内生性信息的激励机制,使签订的契约项目得以高效率 and 高质量地完成。

维克里在1961年发表的《反投机、拍卖和竞争性密封投标》一文中,对传统经济学认为如果交易对方所掌握信息是不对称的,那么市场上产生的均衡结果将是一种无效率状态的观点提出异议。他分析了几种不同的拍卖类型,如英式拍卖法、荷式拍卖法、“第一价格拍卖法”等,认为拍卖有一系列以市场参与者的出价为明确的明确规则,不同类型的拍卖制度具有不同的交易规则,只要这些规则符合激励机制的要求,能够有效地诱导市场参与者主动说出他们真正愿意支付的价格,拍卖市场就是有效率的。维克里深入研究了拍卖中竞买价格作为私人信息时的对策问题,引入一种给参与者以充分的激励去显示他们对物品偏好的机制,概括出使拍卖行的操作变得简单而有效的“第二价格拍卖法”。在这种拍卖法中,物品以密封投标的方式进行拍卖,获得拍卖物品的最高价竞买者,只需支付第二高的竞买价。这种拍卖机制会诱使当事人吐露他愿意支付的真实价格。在以往,竞买者为了获得拍卖物品,如果出价高于其真正愿意支付的价格,结果可能以某一损失为代价买下拍卖物品;相反,如果出价低于其愿意支付的价格,结果又可能失去原本可以买到的拍卖物品。而采用“第二价格拍卖法”,竞买者不管对手如何行事,出价是其一种最佳策略(通常认为,一个人对某物品所愿付的价格,决不会超过、而且也很少达到他宁愿支付而不愿得不到此物品的价格)。拍卖物品将归于愿意出最高价格的竞买者,而这个中标者支付的只是第二个最高出的价格。因此,中标者得到了愿意为买到拍卖物品付出的价格与实际付出价格的差额,或者说从购买中得到一种满足的剩余,即马歇尔所说的消费者剩余。在这种意义上说,“第二价格

拍卖法”是有效率的。维克里的这一方法解决了在不对称信息情况下,如何让当事人如拍卖行的竞买人说实话,真实说出拍卖物品在他心目中值多少钱的难题。

维克里还致力于研究最优所得税制。据认为,如果政府能够了解或观察到各个纳税人的能力差别,那么,它就可以对不同的人征收不同的税率,使人们的消费边际收入均等化,实现社会福利(指所有个人获得的效用总和)的最大化;同时,使能力较强的人做较多的工作,以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但事实上,政府无法知道每个人的实际能力,只能了解他们的收入;而人们当然都清楚自己的能力状况,但面对以收入为基础的累进税制,却常会隐瞒自己的实际能力。在这种不对称信息情况下,政府只有设计出一种具有激励效应的最优所得税制,才能在效率和平等之间找到某种最佳平衡点。然而,维克里未能阐明最优所得税结构中的累进程度及一些相关问题。这些问题留给了米尔利斯来解决。

米尔利斯在1971年发表的《最优所得税的理论探讨》一文,是在维克里建立的所得税制模式的基础上,探讨政府在不对称信息情况下,如何设计最优税制,即在不损害效率的前提下既保证社会公平又保证政府的税收。但在现实生活中,正如前面谈到的政府对每个人的实际能力是不清楚的,因此,这一税制的设计同样必须是能够诱导人们说实话。

在研究最优所得税制的开初,米尔利斯想证明对能力强的应该多征税,这在完全信息的条件下是能够成立的。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存在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有些人为了少交税,假装能力差,因而政府就要少征税。然而,米尔利斯经过论

证得到的结论表明,与其开初的设想恰恰相反。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最优税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边际税率递减,以致于最高收入的边际税率应该为零,就是说,对能力最强的人的边际收入应该不征税。这样,可使获得高收入的能力强的人去做更多的工作,因为他们不必为多工作的高收入去纳税。尽管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对所有高收入的人的边际收入制定一个为零的边际税率要花费大量的信息成本和管理成本,并且要受到实现“平等”这一目标的约束而难以做到,但米尔利斯论证的对能力最强的人的边际收入应该不征税的结论,后来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有很深远的影响。后来的研究认为,要给拥有私人信息的人以一定的“信息租金”;否则,他就会隐藏私人信息,降低市场运行的效率,致使整个社会的福利都降低。

总之,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由于存在着不对称信息和不完全信息,光凭市场竞争性的价格体系还不能达到资源最优配置所需要的条件,因而需要建立非价格制度以有助于提高市场的运行效率。为此,米尔利斯和维克里这两位经济学家分别独自完成了一些相关问题的研究。其主要贡献就在于说明,如何设计出具有市场激励作用的契约和制度,使之能够产生激励效应,让当事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主动披露私人信息,从而实现高效率的交易。所以说,他们的研究成果深化了人们对市场体制的认识,加深了对诸如拍卖市场、税收制度等许多现实经济问题的理解,确实是值得称道的。

作者陈拾顺,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200020)

责任编辑:谭湛明



# 改革开放与广东依法治省实践

□张富强

18年前,中共中央同意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进行综合性试验,为广东成为“第一条社会主义小龙”和“社会主义改革浪峰上的地区”<sup>①</sup>奠定了基础。18年来,广东不仅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而且在加快地方性立法,实行依法治省方面,也走在全国各地的前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 一

在全国范围内,广东是率先提出“依法治省”战略方针、并且采取具体步骤加以实施的一个省分。1992年初,中山大学吴世宦教授向广东省委提出《在全国率先推行依法治省的建议》。2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同志在该《建议》书上批示:“广东应在法治方面有所突破”,并要求分管政法工作的负责同志,“指定合适的人牵头研究这方面的问题”。1993年5月,谢非同志代表中共广东省委在省委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为广东二十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报告。提出在全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廉政监督三个机制”,并强调指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认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民主政治,实行依法治省”。不久,根据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的建议,中共广东省委正式批准深圳市作为“以法治市”的试点,使之不仅成为全国率先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窗口”和“试验场”,同时也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先行官”和“火车头”。1996年7月,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依法治省工作

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省,在步骤上分两步走,第一步,先“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初步形成依法治省的良好政治和社会环境。第二步,再用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即到2010年,建立起比较完备的依法治省体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法制省。”<sup>②</sup>从此,广东省早些年确定的依法治省省政原则进入了全面实施阶段。

观念更新,特别是领导同志的观念更新,这是实现依法治省、由人治向法治转变的根本所在。只有领导干部带头学好法用好法,摒弃长官意志,牢固树立法律至上观念,权利与义务统一观念,在领导方法和决策方式上真正做到民主化、法制化,是完全能自觉领导、组织和动员全省干部群众,努力推进依法治省工作的。广东省委围绕依法治省工作,主要通过以下三方面来统一思想,更新观念:

首先,以中央领导同志关于依法治国的讲话来统一思想,坚持党委对依法治省工作的统一领导,把依法治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项头等重要大事来抓。为此,成立以省委书记谢非任组长、省长卢瑞华、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朱森林、省政协主席郭荣昌等任副组长的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并专门拨出编制,专门经费,配备专职干部,设立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并明确提出加快经济立法,注意精神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开展普法,搞好执法和法律监督,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反腐倡廉,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实现依法治省的八大任务。

其次,对广东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

依法治省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达成一种共识,即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在依法治省、依法监督方面要起主导作用。

最后,就是达成共识,将依法治省的工作重点放在从严执法上,充分发挥“一府两院”在执法、司法中的主体作用,并注意发挥政协的民主监督的职能作用。

## 二

建设民主法制,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任务。近几年来,广东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地方法制建设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加快地方立法的步伐,加大法律监督的力度,依法协调权力机关、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在依法治理工作中的关系,在依法治省中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

人大的首要任务是立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自1993年以来,广东遵照全国人大常委会乔石委员长关于广东在制定地方性法规方面可以先行一步,成为全国立法工作试验田的要求,更是加快了立法的步伐。在1993—1996年的4年时间里,广东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和批准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达120项,超过了1979—1992年13年制定和批准97项法规的总和。加上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布的400多项政府规章,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主要方面,基本上达到“有法可依”的目标。特别是广东始终把经济立法放在首位,在现行有效的157项地方性法规中,经济法规达85项,内容涉及规范公司、企业的市场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规范土地有偿使用、推动国有土地管理体制、规范技术市场管理,抵押贷款,利用内资外资等多个方面。

18年来,广东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法制统一”的原则下,从解决本地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出发,使地方立法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地方特色,这主要表现在立法的先行性和首创性、实践性和开拓性。所谓先行性和首创性,就是针对改革开放中本行政区的一些新问题

和新情况,而国家尚未立法,或立法条件尚不成熟的条件下,制定地方性法规,为全国制定法律、法规提供经验。例如,1986年颁布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涉外公司条例》,是我国第一部地方性公司立法,系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并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公司立法的经验以及国际惯例制定的。又如1987年7月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涉外公司破产条例》,对涉外公司破产的申请、管辖、清算、和解以及破产处理程序等作了详尽的规定,补充了国家法律法规的不足。所谓实践性和开拓性,就是根据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实践中遇到一些应兴应革的问题,急需要运用法规加以规范和引导的,敢于大胆探索和实践,拓展地方性立法的新领域,发挥地方性法规保障和促进改革开放的功能和作用,同时,对于以实践检验证明较为成熟且行之有效的重大决策或政策,通过立法程序,将它们上升为地方性法规。例如,在国家房地产法出台之前,广东省根据房地产发展的需要,制定了房地产登记、开发经营、转让、租赁、评估等五个单行法规,形成一个配套的法规体系,将房地产管理纳入法制的轨道。又如,社会保险的立法,涉及面极广,在全省范围内实施的条件尚不成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于是选择经济较为发达、固定式和老年人较少的珠海经济特区进行试验,制定《珠海经济特区职工社会保险条例》,为制定全省性的社会保险法规先行探路。

加强法律监督,监督各级地方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也是地方人大的一项重要职责。近年来,广东省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设立内务司法委员会,进一步探索和抓好评议“一府两院”的工作,加强个案监督和执法检查,落实执法责任制,保证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94年起,广东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湛江、肇庆、汕头和雷州等十几个市、县开展了对“一府两院”及公安部门部分负责干部的述职评议。1996年,全省的评议工作进一步纳入规范化轨道,共评议了3000多个单位或人员,其中对18个地级市151

名由人大选举和任命的干部进行了述职评议。同时,省人大及其常委会除了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的年度工作报告外,还审议了省政府关于开展“严打”、法制宣传教育、清理整顿行政执法队伍及其“三乱”执法情况的汇报。同时,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社会综合治理的决定》实施五周年,在汕头、揭阳等地进行抽查或调查研究,并对《警察法》《法官法》、《检察官法》和《监狱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了执法检查,有力地督促公安司法机关建立起健全的执法责任制。

广东省人大及其常委会还通过受理人民群众的申诉、控告,加强个案监督工作。1994-1996年,共受理申诉、控告案件1882宗。同时,注意抓住典型个案监督,督促公安、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事,纠正了一些违法的办案行为。1996年,纠正公安司法机关办理的违法案件216宗,其中属错判案件132宗。

### 三

近些年来,广东愈来愈注重发挥“一府两院”在依法治省、依法行政、依法司法中的主体作用。并十分注意加强执法队伍法律素质建设,严肃法纪、惩治腐败,努力提高执法和司法工作的水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对各级政府工作如何依法行政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正是在此背景下,广东省政府工作逐渐转到依法行政的轨道上来,改变了省政府常务会议过去主要讨论行政事务,很少讨论法规规章的做法,将办理法规、规章列为政府工作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1996年,广东省政府拟定了《广东省1996年度地方性法规立法计划(草案)》报送省人大常委会,印发了《广东省人民政府1996年规章制定计划》。在这一年中,广东省政府常务会议共审议法规草案20多件,其中报送省人大常委会的有17件,获通过的14件,审议的规章34件,通过的25件。这些法规规章对规范当前市场经

济条件下所出现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它们的制定和实施,有助于促进广东省经济建设,维护广东社会稳定,推动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执行。此外,广东省政府法制局还完成国务院法制局及国家部委、省人大常委会等有关法律法规征求意见稿73件,办理地方和部门有关地方立法、地方法制问题的咨询、请示139件。为推进依法行政的步伐,省政府专门成立行政执法督察办公室,与法制局合署办公。在完善监督检查制度方面,拟定了《广东省各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草案)》,审查了5个与法律法规有抵触的规范性文件,并已办结2个,依法协调了有关部门的行政执法矛盾6宗。在执法检查方面,先后组织参与了对药品管理法、劳动法等18个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检查,对全省行政执法队伍在行政执法中“三乱”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清理整顿,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为了规范政府行为,减轻企业负担,广东省政府发出《关于规范政府行为简化国有企业办事程序的通知》,由广东省法制局接受企业投诉,监督各级政府简化办事程序,落实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

“两院”在依法司法方面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展。广东各级检察院坚持“严格执法、狠抓办案”的工作方针,突出查办贪污贿赂、徇私舞弊等犯罪要案,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和加强执法监督三项重点工作,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1996年,全省检察机关共接受群众举报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线索19330件,经初查后受理4555件,其中立案侦查2125件2551人,提起公诉的1443件1844人,追缴赃款赃物价值人民币4.4亿多元。重点查处了一批重特大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例如工商银行珠海湾仔支行副行长黄仲棠涉嫌挪用公款1.2亿元);突出查办了发生在党政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中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贪污贿赂案件(例如原省民政厅副厅长苏凤娟涉嫌受贿37万元案、原韶关市副市长张建良、吴承建分别涉嫌受贿24万元和23万元);深挖了一

批窝案、串案;追捕了一批携款潜逃的涉嫌犯罪人员。同时,广东省各级检察机关把查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犯罪和渎职犯罪工作纳入反腐败斗争的总体部署,切实加强了法纪检察办案工作。1996年,全省共受理此类案件1823件,立案侦查469件682人,其中重特大案件92件。此外,还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各种手段,全方位地开展法律监督工作。③广东省各级人民法院坚持“保障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的工作方针,进一步强化审判管理,严肃执法,狠抓队伍建设,推动法院各项工作的全面发展。全年共审结案件320405件,比上年增加30.2%。同时,法院从完善审判管理制度、落实案件检查制度、加强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个案监督以及健全接受人大监督和群众监督制度等四个方面着手,加强了审判监督工作,其中在个案监督方面,共受理当事人不服历年生效裁判而提起的申诉和申请再审案件4554件,审结3503件,纠正原判错误的556件,做到有错必纠,执法必严,有力地维护司法公正和法的权威,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④

#### 四

在积极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方面,广东省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自1983年党中央提出法制宣传要大抓普及与提高,1985年党中央发出全民普及法律常识的通知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此作出决议以来,广东省也和全国其他省市一样,掀起了一场全民学法的高潮,1991—1995年的“二五普法”教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五年来,全省共发行各类法制宣传资料2750万份,录像带1万多盒,制作播放法制电视节目4038个,举办培训班19076期,上法制课54523次、1752万人次接受了辅导教育,300多万人次参加了各类法律知识竞赛。至1995年年底,全省已有101个市县(区)政府和450个乡镇政府聘请常年法律顾问,使法律走上各级政府的决策层,不断提高领导干部依法办事、依

法管理的水平和能力。1996年,是“三五普法”的第一年。中共广东省委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明确提出“反腐保廉,依法治省”,成为广东深入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新的起点,掀起学法、普法、依法办事的新高潮。这一年,中共广东省委、省人大、省政府共举办四期省五套班子领导及省直领导干部法律知识讲座,全省各市、县(区)相继举办了领导干部法制讲座和领导干部法律培训班,为全省干部群众学法作了表率。广东省普法办公室还配合“二五普法”总结表彰大会,及时报道了广东省司法行政工作,对于普及法律知识、增进群众对司法行政机关的了解,起到积极促进作用。⑤

在普法工作中,广东十分注意弘扬社会主义新道德,并妥善地将弘扬新时期道德与推进法制建设结合起来,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宣传道德法制观念,构建社会主义道德新秩序。广东自改革开放以来,十分注意运用社会主义法的形式肯定、支持、促进公民树立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兼顾的社会主义公共道德;先后制定和批准颁布了关于社会文化市场管理,保护消费者利益、城市卫生、市容和环境管理、禁止贩毒、吸毒,禁止嫖宿、卖淫活动,查禁淫秽物品,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电子游戏机室管理,营业演出管理,书刊市场管理、劳动安全卫生管理等地方性法规,为抵制个人私欲膨胀,清除文化垃圾、克服地方(部门)保护主义,改良社会风气,为规范新时期新道德提供法律依据,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新风尚和新型社会公德的形成。同时,广东相当重视运用社会主义法保障建设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的社会主义家庭伦理道德。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先后制定和批准颁布了有关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实行社会保险,青少年保护,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计划生育等地方性法规,为规范社会主义家庭伦理道德,取缔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等邪恶现象,提高妇女的地位、维护儿童和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促进婚姻家庭道德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此外,广东还

十分注意通过社会主义法来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职业道德。为此,广东除了认真执行国家有关公务员、法官、检察官、警察、律师等有关法律、法规外,还先后制定和批准颁布了有关规范律师执业,禁止生产和经销假冒伪劣商品,食品商贩和城乡食品经营者食品卫生管理、产品质量监督等地方性法规,同时,全省各行各业,也根据职业的不同,逐步制定了职业道德守则,作为社会公德在特殊职业内的补充,为尽快建立社会主义新型职业道德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促进公平、效率、正义、敬业、尊师重教、助人为乐、诚实守信等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职业道德新观念的确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实现依法治省,建设以人民参政议政的民主制度为基础的法治省,是广东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必然之路。过去的几年里,广东在开展依法治省方面,取得了一些经验。但广东依法治省毕竟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有一段很长的路途要走,更何况目前又正处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从“人治”到“法治”的过渡时期,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严重危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问题,例如,党政、司法干部队伍出现腐败现象、官商合一、有法不依、乱批条子、以权压法、以言代法、法律实施机制严重失灵,机关、单位以

权敛财、地方和部门主义盛行、国有资产流失和失控、社会治安问题突出、犯罪剧增、现有一些地方性法规已呈现与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不相适应等一系列问题,若不能加以妥善的解决,将会严重影响广东依法治省的顺利开展,阻碍广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尽快建立。

因此,广东的依法治省工作,与全国各地一样,任重而道远,可以相信,在中央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战略决策指引下,在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下,各级领导干部带头示范下,全省人民共同努力下,是完全有可能在下世纪初把广东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法治省的。

①[美]傅高义:《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后记。

②中共广东省委文件(粤发[1996年]14号):《关于进一步加强依法治省工作的决定》,第2页。

③王骏:《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1997年2月21日,第2-9页。

④麦崇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1997年2月21日,第1-12页。

⑤参见广东省普法办公室1994-1996年工作总结报告。

作者张富强,广东省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510620)

责任编辑:罗 苹

## 一、信用危机的治理呼唤着现代企业信用法律制度的完善

信用,一是指人们在社会及经济活动中诚实不欺、恪守诺言,即遵守诚实信用的道德和法律准则;二是指人们从事社会及经济活动的声望与名誉,即信誉;三是指以合同为形式,以偿还为条件,以借贷为特征的经济法律行为,即信用活动。在现代经济生活中,信用的概念已经从原本属于诚实信用的精神领域走向了信用活动这一经济法律领域,它明确地表达了一种以诚信和信誉为基础的约定的合法的负债状态的概念,使信用这三层内涵紧密地结合于信用活动之中。目前,由于我国正处于体制转型时

期,信用活动所必须的企业信誉约束机制和法律约束机制还远远没有形成。因此,在我国企业信用活动繁荣的表象下,潜伏着巨大的隐患——企业信用危机:

### (一)企业信用失度

信用的规模、范围必须适度,即同自身的偿债能力、经济增长状况相适应。如果不适度负债,就可能使信用债务转化为经济运行的严重包袱,甚至成为企业自取灭亡的催化剂。当前,我国企业过度负债已经相当突出。1994年底,国有资产管理局对2万户国有企业清产核资的结果表明,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已高达79%。①企业的过度负债不仅给企业经济、国家经济背上沉重的负担,而且成为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乃至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重大障碍。

### (二)企业信用低效

信用负债的根本好处在于借鸡生蛋,但如果企业用债不当,效益不好,这个蛋不仅生不出来,

# 现代企业信用的法律思考

□黎学玲 邢翔

反而要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因此,企业信用经营的关键是讲求效益。目前我国国有企业营运信用资金的效益极差。据统计,目前国有资产盈利率为6%—7%,贷款平均利息率为12%,国有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为79%,②在资产盈利率低迷不前,负债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企业要支付12%的利息是非常困难的。国有企业的这种低效益,是摆在国人面前十分严峻的事实。

### (三)企业信用无序

利用他人资金通过有效经营和科学管理,实现自有资本的增殖,是信用活动的要旨。如果由此而建立的信用关系得不到法律切实的约束和保障,就极可能造

成经济的混乱。目前,我国整个信用法律秩序没有建立起来,而信用失度、信用低效又加剧了信用秩序的混乱,我国企业在信用活动上存在着严重的失信行为,表现在: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货款、借款;拖欠银行贷款本息;拖欠个人、职工到期债券和集资款;挪用流动资金贷款搞固定资产投资,支付消费资金或者摊派费用;挪用技改贷款用于生产周转等等。当巨额信用资金无法偿还时,有些企业就利用破产、分立、合资等各种方式逃避债务。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普遍而广泛的企业信用危机,是我国新旧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是市场交易秩序混乱,银行结算纪律松弛,经济法制薄弱的结果。它加剧了资金供求矛盾,导致企业效益不断滑坡,威胁银行信用安全,阻碍我国整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可以说,企业的信用危机能否治理直接关系到改革的

成败与国家的兴衰。信用危机的治理,呼唤着企业信用法律制度的完善。

## 二、完善物权法律制度,奠定现代企业信用法的基础

物权法是规范财产归属关系的法律,没有稳定的财产归属秩序,财产流通秩序难以维持,信用这样一种经济交易行为也不具备可靠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当前制定和完善物权法,确立以下法律原则,对于规范和保障企业信用秩序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物权法定原则。这是各国物权立法的共同准则,是指物权的种类、效力、变动要件、保护方法等都只能由法律规定,不允许当事人自行创设。实行物权法定原则,明确规定国家财产权、法人等社会组织和自然人的财产权等各种物权及其客体,使物权归属明晰化,既有利于防止国家财产被侵犯,又保护了法人和自然人的财产不受非法干预,从而使信用交易在产权明晰的条件下,走上规范化的轨道。

(二)一物一权原则。一个物权之客体,应以一个物为限,在一个物上只能存在一个所有权。确立一物一权原则,可以明确物权客体的外部范围,使之易于公示,有利于交易安全。

(三)公示和公信原则。由于物权具有排它性,如果物权的得丧变更没有使公众周知的外部表象,就容易造成对第三人的损害,并危及交易安全。因此,各国物权法大都要求,物权的转移需要有法定的公示办法,如动产的让渡以交付为公示方式、不动产则以登记为公示方式,未采用法定方式变更物权的,不发生法律上的效力。物权以公示原则发生变更,则产生公信力,即使物的转让人事实上并无处分权,但善意第三人基于对公示的信赖仍能获得物权。公示原则,树立了市场交易的基本规则,有效地防止了市场交易主体一物二卖等失信行为的发生,保障了交易的安全;同时由于公信原则的补充,确保了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从而能够有力地促进商品的流通,繁荣市场交易。信用作为市场交易行为的一种,比之商品交易更增添了风险性,尤其需要确立物权法上的公示和公信原则来全面保护信用交易全过程。

在我国物权法的完善过程中,《担保法》的颁行,为企业信用在法律上确立了有效的风险保障

机制,尤其对于解决企业债务链等严重信用问题是一个积极有效的措施。但是,从同时发挥动产的经济效用和担保功能的角度出发,适应经济发展中融通资金的需要,我国还应当设立动产抵押制度,由抵押权人对不转移占有的动产设立抵押权。这样,债务人或第三人既可以继续占有抵押物,发挥其使用价值,债务人又能够就抵押物获取信用,融通资金。债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可以占有动产抵押物,并就其卖得价金优先于其他债权而受清偿。因此,我国可以考虑制定一部《动产担保交易法》,其中规定动产抵押、所有权保留等动产担保法律制度,以充实我国的信用担保法律手段。

## 三、完善债权法律制度,严格规范企业信用交易行为

债权法是规范财产流转关系的。通过债权法律制度的强制性,约束着当事人依法行使债权和履行债务,在当事人之间建立起可期待的信用关系。因此,企业信用有赖于债权法的完善。

(一)修改、充实《民法通则》中的有关债权的内容。信用关系本质上是债权债务关系,《民法通则》所确立的债权制度是其基本的法律规范。但是,《民法通则》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了债权制度的基本结构,亟待修改完善。在债权法制中,债权保全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债权保全是指在特殊情况下,债权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有权直接对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采取一定的措施,通过保全债务人的财产而间接保全自己的债权。其内容包括债权人代位权和撤销权。当前,我国企业信用交往中广泛存在着“债务链”等非正常情况,有的负债企业“蚕多不痒”,怠于行使债务;有的甚至相互勾结起来,通过“转让”、“赠予”等办法架空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如果赋予债权人代位权,当债务人怠于行使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债务人的权利,那么就能增加债务人的财产,实现债权;赋予债权人撤销权,当债务人行使加害债权的行为时,债权人有权申请法院撤销之,就能恢复债务人之责任财产,保障债权实现。可见,债权保全制度对维护社会信用交往秩序实有裨益,尤其能够针对我国企业信用普遍低下的状况,使债权人全面监督债务之履行,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因此,我国民事立法之完善,应考虑增加此项内容。

(二)完善合同法制。信用是契约化的经济交易行为,合同制度的完善是现代企业信用法律制度建立和发展的重要保障。与企业信用相联系,笔者认为合同法在以下方面应有突破:

1.完善合同履行制度。现行经济合同法强调实际履行原则,这对于保证商品的有效让渡是必要的。但片面强调实际履行原则,同样阻碍了货畅其流,不利于取得最佳的宏观效益。合同履行制度的完善,应当而且必须促进市场的发育和成长,有利于供需衔接,便捷交易。所以,应当为合同转让正名。只要具备良好的信用秩序,合同转让能使合同履行变得更为可能和现实。例如,以合同倒卖为主要特征的期货合同是现代市场交易的主要形态之一,它是信用与契约充分结合的一种交易方式,对促进商品流通、规避风险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完善合同履行制度,应当保障合同转让及期货交易的依法进行。

2.增加对具体合同及合同行为的法律规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目前出现了一些欠缺法律规范的行为,如赊销、代销、分期付款等等。(1)赊销。赊销是商业信用的一种。确保赊购者按约定期限付清货款,是赊销活动顺利进行的核心理念。为此,立法需明确规定赊购方的付款及保证付款的义务。(2)代销。目前,有些代销企业仅以一纸凭条,甚至口头承诺而告成代销关系,既无结算期限,又无违约责任。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因代销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规定,建立对代销关系当事人必要的制约机制。如应明确代销关系的代理法律性质,明确代销的方式、代销商品的保险责任,代销人的忠实义务等。(3)分期付款。分期付款是约定分期支付所购商品价款的买卖方式。在实践中已经被广泛运用,急需加以规范。例如规定买方妥善保管标的物之义务,买方承担标的物之风险责任,所有权保留的担保方式等等。与此相适应,在《动产交易担保法》中确立所有权保留制度。所有权保留是国内外司法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分期付款的一种担保形式,它是指在分期付款买卖中,卖方对标的物在买方尚未全部支付货款之前仍保留该标的物的所有权,从而加强对卖方收回各期货款的法律保护。

#### 四、建立信用法律责任制度,保障授信人的权益

责任是权利的保障,是全部法律关系的归宿,也是执法严肃性的灵魂。信用法律责任是指信用主体违反信用义务如履行合约、返还贷款、尊重竞争对手的信誉等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目前,我国信用问题上的违法行为主要表现为四种:(1)在市场竞争中,采用不正当手段,盗用或诋毁他人商业信誉;(2)在合同交往中,不守诚信义务,任意撕毁合同、变更合同、故意不履行合约;(3)故意破坏商业信用的行为,如开具空头支票,或没有资金保证的汇票、本票;又如公司股东虚假出资、抽逃资本使注册资本不实;再如债务人抽逃资金,故意不履行债务以及非法集资等等。(4)出具虚假的资产负债表或资信评估情况,骗取资金的行为。对于这些行为,立法中都应该明确详尽地规定严格的经济、行政及刑事责任。

在责任承担机制上,笔者认为应确立以下原则:

(一)确立信用法律责任自负原则。责任自负是指任何自然人或法人违法或侵犯他人权利都必须追究他应承担的经济、行政、刑事责任。目前,国有企业出现的广泛的信用危机应当主要归咎于它们能够逃脱信用活动的经济和法律的责任。所以,确立责任自负原则,严肃追究法人、主要负责人和其他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包括刑事责任,做到有过必究,执法必严,是治理企业信用危机的重要途径。

(二)建立和完善损害信用的经济赔偿制度。经济责任是信用法律责任中最典型的的责任形式,它包括经济赔偿制度。现行的经济赔偿制度偏软,往往不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所以应当加重失信的经济赔偿责任,赔偿数额既应包括财产的减少,还应包括预期利益的损失。

(三)建立严厉的损害信用的经济处罚制度。对严重违约,故意拖欠贷款等失信行为,情节严重的,不仅要令其赔偿全部损失,还要给予严厉的经济性处罚,如令其承担对方当事人经济损失一至五倍的罚款等。

#### 五、加强对企业信用的宏观法律调控与建立社会资信监督体系

信用膨胀是企业信用中一个突出问题,有必要强化宏观经济法律手段来约束企业信用。

(一)计划法律手段。国民经济计划以及由



此而制定的国家投资计划和信贷计划是企业信用活动的依据和导向。虽然计划体制改革要求通过市场机制来发挥作用,但单纯的市场活动带有盲目性和短期性,容易造成企业举债资金的浪费。因此,应当加强对企业信贷资金及其用途的法律监管,令其符合国家的投资计划和财政政策。

(二)财政法律手段。首先,可以利用税收法律手段调控企业信用活动,通过依法对企业开征、减免、停止某种税收,提高(或降低)税率及起征点等形式,调节企业信用的规模和结构。其次,运用财政补贴的法律手段调控企业信用活动。如对企业依法进行生产性补贴,便可降低企业信贷规模。

(三)金融法律调控手段。完善利率制度、贷款制度、储蓄制度这些与企业信用活动直接相关的金融法制。坚持货币的正常发行,依法健全存款准备金制度和再贴现制度。当企业信用规模膨胀时,中央银行通过提高法定准备金收缩货币供应量,或提高再贴现利率来控制银行向企业的放款。

(四)加强对金融市场的法律监管。应完善金融市场管理机构的组织,强化其职能和责任,改善管理方法,实现科学、多方位的监管手段,加强执法力度。

此外,条件成熟时,应加快与信用相关的经济立法的进程,如《信贷法》、《信托法》、《期货交易法》等。总之,我国现代企业信用法律制度的全面构筑,有赖于方方面面的市场经济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

由全社会成员对企业资信实行监督,是减少信用纠纷,防范信用问题上的违法、犯罪现象的有效措施。社会资信监督体系包括企业资信评估制度,投资者、交易对象及消费者的监督,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通过发挥这个体系监督机制的作用,营造一个企业共同守信的社会环境。

(一)规范发展我国的企业资信评估制度。企业资信评估是指对企业在一一般性的商业往来、投资合作及信贷活动中的信用度的评价。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建立一批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的企业资信评估机构,采用科学的指标体系公正

地评判企业的资信等级,能够有力地促进现代企业信用法律制度的建立。我国的资信评估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产物,在80年代后才逐渐兴起,存在着很不规范的问题。当前,迫切需要规范资信评估机构的设置,建立独立的中介性评估机构和与国际规则相通的评估指标体系,统一机构管理,制定《投资顾问条例》、《资信评估条例》等有关企业资信评估的法规,真正发挥资信评估的作用。

(二)形成投资者、交易对象、消费者的监督。在利益上,与企业信用密切相关的对象就是投资者、交易对象及消费者,他们对企业信用的监督,不仅能够有效保障自己的权益,还对社会中普遍的信誉树立具有积极意义。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企业必须强化信用风险意识,建立信用管理机构,加强对信用风险的防范。

(三)注重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新闻媒介的有效监督作用无数次地被历史和现实、国外和国内的经验所证明。我们应积极倡导新闻界发挥其监督作用,在其披露、评论中使失信企业无地自容,使全社会都逐步提高信用法律意识,最终形成诚信守法的良好社会风气。

富兰克林1748年在《给一个年轻商人的忠告》中指出:“信用就是金钱。”200年前,它表现的是资本主义精神,在当代则已发展成为一项完备的经济法律制度。历经岁月的跌宕沉浮,这项制度——现代企业信用法律制度,终于被中国的经济改革实践所认可和召唤,并已初现端倪。它的建立和完善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从经济体制、法律制度、市场文化等方面共同发挥作用。“路漫漫其修远兮”,但是,可以预见,伴随中国经济改革全过程的现代企业信用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必将为企业的效率和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添无穷的动力。

---

①② 参见薛小和:《企业债务沉重根源何在》,《经济日报》,1995年8月8日第一版。

作者黎学玲,中山大学法律学系教授(510275);邢翔,广州市城市规划局硕士(510030)

责任编辑:罗 苹

# 从族谱看珠江三角洲的宗族伦理与宗族制的特点

## 一、宗族伦理与商品意识

在以农立国的中国农村宗法社会中,对众多的农民发生最大影响的,与其说是儒、释、道等,不如说是正统文化本土化了的宗族伦理。宗族伦理不仅支配着农民的思想,而且规范农民的行动。宗族伦理,或记载于族规、家法、家训、家箴;或因世代相传,约定成俗,变成农民的自觉行动。宗族伦理习俗,对农村宗法社会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在一度流行的学术分析模式中,认为商品经济的发达导致资本主义萌芽;宗族组织是一种落后的阻碍社会进步的保守力量。但是,在珠江三角洲,宗法制与商品经济这两种似应互相冲突、矛盾的事物,却表现出相遇而安,互相适应,甚至有时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显然同已经本土化了的宗族伦理有关。

珠江三角洲的宗族组织,是因商业化的出现而推行的,并随商业化的加深而日益庶民化、普及化。宗族制与商业化,有互相依存的关系。宗族制的盛行,既表示边陲地区对正统文化的认同,又是新兴的士绅阶层将正统文化与自己带有商品意识的价值观相揉合的结果。我们从族规、家训中,可以看出商品意识已经渗入宗族伦理之中。明中叶,以酿酒生意发迹的南海“太原霍氏”晚节公把“酿酒之法”写入“家箴”,告诫子孙世代遵守。到了清代,这一家族又将有关手工业和商业的注意事项,如关于所谓“工有百艺之当为”、“商有百物之当货”等的具体规定,写进家训,以规范子孙的行为。<sup>①</sup>这不仅表现了其对工商业的关注和支持,也意味着把工商业作为家族的传统行业。

珠江三角洲宗族伦理的商品意识,表现在职业观的变化。“士农工商”本是传统社会职业构成的次序。《岭南冼氏宗谱》中却提出“四民皆本”的职业伦理。<sup>②</sup>职业观的变化,显然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有关。最引人注目的是作为商品构成部分的日用百货的流通日益广阔,使商品经济的发展显示出与以前不同的特点。加之五代之后,“取士不问家世”,而以科举为晋身之阶。清人沈尧对此曾感叹道:“古者士之子恒为

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之大较也。”为何“商之子方能为士”?非营商者,“子弟无由读书以致通显”。<sup>③</sup>很显然,缺乏经济作基础,欲读书仕宦是不可能的。求富便捷之途莫过于营商。商业的成功关系着家族的荣耀及其绵延不衰,提高商人地位的新职业观因而出现。珠江三角洲和徽州一样宗奉家族主义。在浸渍家族本位的宗族理念中,个人的升迁荣辱,是同家族联在一起的,即个人的身分地位取决于所在的等差次序的伦理构架中的位置,取决于所属社会集团的势力。唯有提高本宗族的社会地位,方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追求家族荣耀的终极价值观念,成为驱动族人经商的精神力量。但是,在珠江三角洲,并不坚持“官本位”的观念,而是以经商致富求缙绅化作为实现家族荣耀的唯一途径。他们在缙绅化的同时,也直接用货币经济的力量以通显。他们有的通过捐资举办公益事业,诸如善堂、医院、育婴堂,以及修桥、补路、筑堤,等等,而取得地方上与士绅并列的名流地位。因捐资于公益慈善事业而谋得的“善董”头衔,被视之为一种“社会地位”。<sup>④</sup>自晚清以后,这些慈善机构和商会,开始参预对地方的控制,甚至与商业机构(如商会、商行会)一道干预时政;或充当官、民之间的中介。广州的商会和慈善机构(如广州的九善堂<sup>⑤</sup>)在当地的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尤其令人刮目。有报纸称赞广州的九善堂、总商会和七十二行的善举说:“公益同举,公害同驱,公愤同伸。而总商会、九善堂、七十二行之名,遂轰轰烈烈于五岭之南,妇人孺子,皆啧啧称道不置。……盖自政界以及上下流社会,莫不注视于总商会、九善堂、七十二行矣”。<sup>⑥</sup>善董、商董的作用与士绅几同,出现绅商合流的趋势。<sup>⑦</sup>

到了晚清,尤其出现了“以商立国”的职业观。香山县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中关于“商务”的论述,无不贯穿这一观点。他指出:“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舒畅其血脉也。”又说:“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畅。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sup>⑧</sup>

宗族伦理中的商品意识,在宗族组织的各种活动中都有明显的表现。诸如:承垦沙田、开办宗族实业、操纵地方市镇的某一行业,都以谋利

为目的,视为商业行为,并作利益均沾,按股分红。在宗族内部出现利益均沾,宗族日益趋向以谋利为目的的经济实体的同时,宗族内部也出现了投资与借贷的关系。凡不能偿还本宗族债务的族员,要变卖家产抵足。“产业尽变仍不足抵偿之数”,将其本人,及其子孙“革祭”。<sup>⑨</sup>温情脉脉的宗亲道义不见了,有的是不论宗亲的商业关系。又如修建祠堂本是为了实现尊祖、敬宗、收族的宗族制原则。有的宗族却采取“合股”修建的方法。其商品意识,不仅在于取商业上“合股”的用语,而且意味着把此举视为商业投资。以祠堂作为身分的一种标志,投入祠堂的股份愈大,其在商场上的信用度便愈高。

从当地志书关于风俗的记载中看,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据万历《新会县志》记载:“正、嘉之前,仕之空囊而归者,闾里相慰劳,啧啧高之;反之则不相过。嘉、隆以后,仕之归也,不问人品,第问怀金多寡为轻重。相与嬉笑为痴牧者,必其清白无长物也。”<sup>⑩</sup>以贪赃之多寡,作判断其能痴的标准,意味着商品意识浸透官场。它同当地的宗族伦理也是有关系的。

注入商品意识的宗族伦理,引发了珠江三角洲人营商的动机,并在商业行为中发挥了作用,从而成为导致当地的宗族制在社会、经济功能等方面发生变异,而与传统的宗族制有所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 二、宗族制经济功能的扩大及其他特点

宗族组织是与传统的家族主义文化相适应的。它具有社会、经济、文化等功能。作为传统宗法制,其主要功能在于谋求并维护本宗族的社会地位和特权。因此,选拔精英,以科举仕途求高官,和以经商致富,以捐输捐纳而得官衔,便成为其取得宗族社会地位和特权的途径。通过祭祖、分胙、读谱、宣约(即宗规家法,有的还读“圣谕”)等活动,培养对家族本位理念的认同,以加强族内的凝聚力。所以,这些宗族经历千余年而“未尝散处”。通过贍济贫穷族员,培养族众对宗族依赖的情感。有的族田较多的宗族,“节妇孤儿与出嫁守志,以及贫乏无依者,生有月粮,寒有冬衣,死有棺衾,葬有义冢,嫁有赠,娶有助,莫不

一均沾其惠。”<sup>①</sup>宗族内部,还可“有无得以相通”,“吉凶有以相及”,<sup>②</sup>具有道义经济的功能。

珠江三角洲是因明代以后得益于商业化而引起宗族制的普及化,又由于生态环境、文化背景的特点,其宗族制已发生了变异。它虽然具备传统宗族制的一般功能,但又有其特点。经济功能的扩大,便是其特点之一。

珠江三角洲的族产丰厚而且多样。这同珠江三角洲特有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其宗族的发展,以及经济实力的增强,是同沙田的开发连系在一起的。清朝政府规定:占地10顷以上者,“不得再种沙田”,“小民围筑沙滩亦不得过五顷之数”。<sup>③</sup>用宗族的名义承垦,则不受此限。而且“工筑浩繁”,“有沙田十亩者,其家必有百亩之资,有百亩者必有千亩之资而始能致之也”。<sup>④</sup>唯名宗大族,或得益于商业化的寒门宗族,才有足够的资金向政府申报承垦。因此,围垦沙田成为增强宗族经济实力的重要途径。有的宗族也因经营沙田和其他族产而日益向经济实体转化。在本世纪30年代,80%的农户生活在宗族组织之中;族田约占土地总面积的50%,<sup>⑤</sup>中山等地的沙区族田高达80%,族田所占比例之高,为全国之冠。<sup>⑥</sup>私人土地所有制在向宗族集团土地所有制转化,似是清中叶以后东南地区出现的一种趋势。但是,这种转化如此之迅速,则珠江三角洲的耕作系统使然。沙田的开发、基围的修筑、沟渠的开凿、水窦的排灌,都需要统一组织和管理。在难以监督的个体耕作情况下,小规模的家庭经营,其优势远胜于大规模的农场经营。这种适合于大面积的土地占有和小规模的田场经营的生态环境,正是宗族集团土地所有制盛行的重要原因。

珠江三角洲沙田的承垦与管理,也因而成为宗族的重要功能。明中叶以降,农业商业化的日益发展,并由此而赚取的愈来愈多的利润,是沙田开发的资金来源。飘荡在河面上的贱民——疍家(又称疍民),又为之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据笔者的实地调查,顺德县大良镇东门外的云路(原称海沥沙),就是在大族的组织下,由胼手胝足的疍民开发出来的。在宗族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则采取合股的形式来筹集。例如,东莞县张梯云馆、邓荫兰堂、何醉经堂、何修德堂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合伴出银建筑海心洲沙田;民

国三年(1914年),张如见堂集股领照筑堤以保护太和洲沙田等。<sup>⑦</sup>连沙田的田场管理、割禾、收租,乃至谷物储所、平抑米价等,有的宗族也下公文、出告示,作出规定,行使司法权。<sup>⑧</sup>

除拥有族田外,宗族还有族墟、族店、码头、族窑,等等。一些有政治特权的宗族甚至竞相控制重要的经济行业。例如,作为佛山的经济支柱、享有官准专利的铁冶业,就为洗、霍、李、陈等巨族所竞相争夺。明人陈子升曾经指出:“佛山地接省会,向来二三巨族为愚民率其利,唯铸铁而已。”<sup>⑨</sup>可见控制这一行业,即可掌握佛山的经济命脉。因霍韬的发迹而显赫起来的霍氏家族,就控制有铁、炭、陶瓷、木植等,以及其他“便民同利”的产业,诸如墟场、市肆、码头、店铺,等等。石头霍氏宗族设有纲领田事一人,司货一人。司货之下又设司窑冶一人,司炭铁一人,司木植一人,各司其职,以适应经济管理的需要。<sup>⑩</sup>

珠江三角洲的族产,不只作为宗族的活动经费和恤族之用,而且具有营利性质。族店、族窑等,本是商业行为,以赢利为目的,固不待言,就是族田的收入,除去宗族活动经费,“留存备用”(主要用以追加,或新的投资)外,余者“均分”、“均荫”。<sup>⑪</sup>集股开发,或集股购置的沙田收入,有的明文规定:“按股均派,一宿不延”,<sup>⑫</sup>显示出其分益的商业行为。有的宗族还出现向经济实体转化的趋向。据康熙年间的《沙湾何氏留耕堂尝租簿》“序”记载:“至嘉、隆之朝,沙田积税日增,租赋倍于先代。递年租尝所入,除纳粮饷、供祭祀各项外,有余分作甲田,以荫子孙之有室者,谄谋不亦善乎。初编为十甲,以十年为一周;继联为五甲,以五年为一周;继联为三甲,以三年为一周。”这里将族田的收入,按编甲轮流收用。从十年轮一次,至三年轮一次,说明族田的不断增殖。到民国初年,留耕堂拥有的族田已增至近六万亩。据实地调查,其族人自豪地说:“我们关起门来也不会饿死”。<sup>⑬</sup>三水县芦苞欧阳村欧阳氏“载德堂”,于民国初年甚至组织起“永发公司”来管理族产。<sup>⑭</sup>

在明中叶以后的商品性农业的扩张中,在近代建立以出口贸易带动本地区手工业、农业发展的“贸工农”经济体系和建立一系列的商业企业过程中,<sup>⑮</sup>尤其在举世熟知的、着中国民族工业近代化先鞭的机器缫丝取代手工缫丝的带有产

业革命精神的壮举中,宗族组织都发挥了作用。在引进侨资、集聚零散的资金以建置机器缫丝厂,利用一些祠堂、庙宇作为厂房等等举措中,宗族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组织者的作用。可以说,珠江三角洲的宗族组织充当了农业商业化、乡村工业近代化、商业企业化的推动者,乃至组织者的角色。

珠江三角洲宗法组织的经济功能,还表现在通过族规家法限制、禁止,或规范族众的某些经济行为。例如,石湾《霍氏崇本堂族谱》中,就有“农有百谷之当布”、“工有百艺之当做”、“商有百物之当货”等作为家训,要族众“能依此嘱,永为福人”。还有“商贾三十六善”、“农家三十六善”等规范族众从事商贾、农业等经济行为。<sup>⑳</sup>

由于受到商业功利性的宗族伦理的支配,没有严格按照以父系为中心的血缘关系组织宗族制,也是珠江三角洲宗族组织的一个特点。

珠江三角洲的开发,始于宋代。据文献记载,在宋代集团性的移民中,未曾发现显赫的官宦世家。因官,或因流徙,而卜居当地者,也曾“蝉连而居”,<sup>㉑</sup>并有在宋元建祠堂、置族田的记载,<sup>㉒</sup>但这些家族并不能世代相承地保持其官宦名门的地位。宗族制在珠江三角洲没有普遍推行。未见以恪守中原宗族制自诩者,却有士族与土人合流的先例。世为罗州刺史的新会冯融,本是燕主冯弘之裔,以其子高凉太守冯宝,婚于俚(后改黎)族首领冼氏女。后来冼冯氏家族成为独霸一方,历梁、陈、隋、唐四代而未衰的大族。唐初冼冯氏之孙冯盎“所有地方二千余里,奴婢万余人,珍玩充积”。<sup>㉓</sup>珠江三角洲各大族以中原高贵血统相标榜,是明代以后的事。明中叶,得益于商业化的单寒小姓,在当地经济普遍增长中所起的作用,使他们感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于是也仿效大族建立起宗族组织来。这就冲破了传统的宗族制与庶民隔绝的藩篱,使原为名门大姓所垄断的宗族制走向民间,成为庶民的组织。庶民的子弟通过入学、科举而仕宦的道路,跻入统治集团。明中后期活跃于政坛上的珠江三角洲籍官僚,如伦文叙和伦以训、以谅、以洗父子,霍韬、李待问等,就分别从农民、鸭户、冶铁户等社会底层出身而出任朝廷大臣,或地方高级官僚。顺德梁储更是入居正德朝宰相。他们相互援引、互相攀附。例如,正德九年(1514年)梁储

充会试考官,擢霍韬为第一;<sup>㉔</sup>礼部尚书霍韬倚重佛山梁焯和番禺王用仪。这一新兴的官僚士绅集团大倡宗法制,竞相叙谱追宗寻祖。且都自称源于中原名宗大族,迁自南雄珠玑巷。如伦氏,望出京兆,皇帝臣伶伦之后;霍氏,望出太原,周文王之叔虔(因封于霍,亦称霍叔)之后等。据实地调查,民国年间,三水县芦苞独树岗蔡氏大宗祠门联即写道:“珠玑宦裔;鎬洛宗璜”,以此标榜自属名门贵胄。各大族迁自珠玑巷之传说,更编演成美丽动人的故事。从明代起,盛传不衰,妇孺皆知。新贵宗族附会的族谱,敷张成故事传说,传说又成为后来编写族谱的依据。有谱牒以尊祖,自可立祠堂以敬宗、置族产以睦族了。在建构谱系中,其着眼点与目的在于攀附官宦势族,或为了联族,统合族众,以壮大宗族势力,加强本宗族在地方上的竞争力。在谱写世系时,并非着力于考究其准确,事实上正如屈大均所指出的:“大率有族而无宗。”<sup>㉕</sup>世系已多失传,也不可能如实重建。例如,当地的名族番禺沙湾何氏,始祖何人鉴,据说在南宋绍定六年(1233年)由广州迁居沙湾。生有四子,皆得功名。尔后子孙出任州县地方官者,代不乏人,成为官宦之家。传至第五代何子海,登洪武四年(1371年)进士。此时,这一家族的人口已增殖至一定的规模,家谱的撰修因而被重视起来,由何子海编写《谱图》。何子海在其书序言中说“余观诗礼之家,文献之后,莫不有族谱传焉。然或舍其祖而宗人之祖,或求其前代名贤以为祖者,皆妄也。”可见当时攀附显贵为祖,是受鄙视的。此书已佚。后来该族在撰写《继述堂谱》中引述这篇序文之后,加按云:“子海公此序,当时我族止数十人,故未修谱,而推四世府判公为积德祖。”府判公,即何人鉴。他字德明,府判即其号。从此可推知《图谱》只将祖宗追溯至何人鉴,记叙了由之而下的世系。自明中叶以后,因商业化而兴起的士绅集团,如梁、霍等名族皆自称迁自南雄珠玑巷,中原望族之裔。珠玑巷的传说愈加盛行。珠玑巷人成为正统文化的代称,又是认同于新兴的士绅群体的标志。也正自此时起,各大族在开发沙田和控制地域社会等方面,争夺愈加激烈。为了认同于正统文化、认同于当地士绅集团,为了增强在地域社会中的竞争力,何氏竟请出一位在南雄受尊崇的神化了的人物——何昶为其始祖。而真正的始

祖何人鉴,因其子孙出自功利的考虑,反而屈居为四世祖。<sup>⑳</sup>

对始祖的附会、对祖宗的粉饰,几乎成为修谱的通病,非珠江三角洲所独然。唯同姓不同宗者,采取虚立名号,联宗通谱,建立共同的宗桃继承关系的作法,独在珠江三角洲,是公然盛行的。更甚者,一些居住相邻近的寒姓单家,也以抽签、占卜方式来确定共同的姓氏,并且虚拟共同祖先,合同组成一宗族。虚拟宗族的流行成为珠江三角洲宗族制的一个特点。

聚居性本是宗族制的一个特点。地缘是血缘的投影。<sup>㉑</sup>但是,卜居珠江三角洲的宦宦之家,虽曾“蝉连而居”,但并非一味追求单姓村。例如,“族属之蕃,甲于一郡”<sup>㉒</sup>的名族沙湾何氏,是在13世纪来到由泥沙淤积形成的名为“沙湾”的冲积平原的。与何氏先后陆续移住于此的还有李、王、黎和赵等四姓。今天聚居沙湾的大姓,即这五个姓氏。据口碑相传,在何氏来此之前,已有张、劳、曹、康、麦和朱等姓,但今已亡绝无遗。<sup>㉓</sup>据笔者披阅近年出版的有关珠江三角洲地名志的资料,有的村落,是由数姓共建的。宋代立村的东莞李屋(原由李、黄、胡三姓立村,因李姓人多,以李名村)、麦屋、朱屋(此二村也因麦、朱人多而以其姓名之)等即是。<sup>㉔</sup>有的古老村落,兴废无常,村名是随着移住者的嬗替而不断改变的。例如,增城县新村,唐代由江西迁来,名为四门村。元代有林、郑、张、赖等姓移住,取名新村。后因郑姓取得对该村的控制权,又叫郑新村。<sup>㉕</sup>之所以各姓先后迭住一村,是因为三角洲的丘陵、台地有限,为了就近垦辟沙田,受生态特点的局限,自不能以堪舆风水术卜定。晚清以后,随着大片沙田的垦辟,居民沿着河涌搭茅棚,村落形成线状型。番禺冲决三角洲上的鱼窝头镇的大涌村、良角村等即是。这些所谓村落,有的绵延数里。居住于此的或为属贱民等级的民,或为被大族役使的称作“水流柴”的“耕仔”(又称“开边人”,意为“外边人”)。除有的耕仔系离宗主村别居的族员外,一般地说,南沙区的线状(或带状)村落,都没有宗族组织。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缺乏地域的聚居性。

祠堂作为判定血缘群体是否形成宗族的重要标志,在珠江三角洲尤其受到重视。清初,屈大均曾经指出:“其大小宗祖祧皆有祠,代为堂

构,以壮丽相高。每千人之族,祠数十所,小姓单家,族人不满百者,亦有祠数所。”<sup>㉖</sup>顺德“俗重祠堂,大族祠至二、三十区。其宏丽者费数百金,而莫盛于望江、龙津。古楼大族亦有二、三十座,一楼费数千金,以铁为门,下有基,高一丈,中有板阁”。<sup>㉗</sup>“莞(即东莞)之有祖祠者以千计”。<sup>㉘</sup>在广州等大中城市,联姓祠甚多。据统计,光绪元年广州城内便有联姓祠宇85处。<sup>㉙</sup>对于缺乏血缘和地缘关系的虚拟宗族,祠堂更成为加强凝聚力的法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祠堂也采取股份制合同兴建。民国年间,就有由国民党军长黄国梁倡首,增城、龙门、惠州和从化等地黄姓集资,分5股出资兴建者。<sup>㉚</sup>祠堂是宗族身份的标志,番禺沙湾就以是否有祠堂作为判定“埋边人”(意为里边人,指大族)和“开边人”(指被役使的小姓)的根据,而且可以提高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增强商业上的信誉。可见在珠江三角洲,祠堂之特别被重视是同虚拟宗族之盛行和商业化有关。凡此种种,都可看出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制是一种已经变异的亚种形态。

(本文研究得霍英东基金会资助。)

①南海石湾《霍氏崇本堂族谱》卷三。

②《岭南冼氏宗谱》卷五之一,艺文上。

③沈尧:《落帆楼文集》卷二四,《费席山先生七十寿序》。

④陆羽:《广州的方便医院》,《广东文史资料》第八期。

⑤关于广州的九善堂,中山大学历史系熊燕的硕士论文《九善堂与清末民初广州社会》(未刊稿),作了研究,可资参考。

⑥金炎:《上总商会九善堂七十二行书》,广州:《总商会报》,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7月26日)。

⑦参见贺跃夫:《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第四章《绅与商——清末绅商透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⑧郑观应:《盛世危言》三编卷一,“商务一”、“商务二”;又,关百康:《粤商自治会函件初编》:“序”:“迨文明进步,出产丰富,器用繁多,万国交通,因利生利。而商人居中控御,侵侵乎握一国之财政权,而农工之有大销场,政界之有大举动,遂悉唯商人是赖。”

⑨南海《潘式典堂族谱》卷一，“家规”。

⑩万历《新会县志》卷二，“风俗纪”。

⑪《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首，《许氏总阖族公撰观察公蓬园公事实》。

⑫苏大：《大宗小宗说》，见《新安苏氏族谱》。

⑬《广东省例新纂》卷二，“户例”上。

⑭陈在谦：《与曾勉士论沙田书》，《广东文征》第2册、第23卷，香港珠海书院出版委员会印行，1973年。

⑮陈翰笙：《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P3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又，《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P14-17。

⑯关于中国各地族田的分布及所占比例情况，请参阅张研：《清代族田与基层社会结构》PP. 38-9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⑰参见《许舒博士所辑广东宗族契据汇录》主编黄永豪写的“序言”，东洋学文献セソタ-丛刊第49辑，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セソタ-，1987年。

⑱见番禺县沙湾镇乡族组织处理乡族事务的文件：《辛亥壬子年经理乡族文件草部》。

⑲史澄：《广州府志》卷一五，“舆地略”七，“风俗”。

⑳《霍渭崖家训》“田圃第一”、“货殖第三”。

㉑《佛山梁氏家庙世守书》第三，“经产”，光绪十四年刻本；韩锋：《番禺县古霸王乡志》，民国刊本。

㉒见前揭《许舒博士所辑广东宗族契据汇录》，P170。

㉓刘志伟：《祖先谱系的重建及其意义——沙湾何氏宗族的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2期。

㉔陈忠烈：《芦苞地方史考察研究文辑》，刊于三水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三水文史》，1995年第20期。

㉕关于商品性农业的扩张；“农工贸”经济体系和近代商业企业的建立等问题，限于篇幅，不能展开讨论，请参阅拙作《略论珠江三角洲的农

业商业化》（刊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PP. 16-29，1986年第2期），和《地利、传统市场与珠江三角洲的海外贸易》，《珠江三角洲的历史、地理、经济情况及南洋华侨发展史》，PP. 47-80，香港第二次世界华商大会1993年11月出版（指定为会议参考书）。

㉖霍春洲：《家训》，见《霍氏族谱》（佛山），道光刻本。

㉗⑳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七，“宫语”，“祖祠”条。

㉘见叶显恩、谭棣华：《论珠江三角洲的族田》，《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PP. 144-164，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

㉙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贞观五年十二月”条。

㉚万历《广东通志》卷六，“藩省志”六，“事纪”五。

㉛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七，“祖祠”条。

㉜见前揭：《祖先谱系的重建及意义——沙湾何氏宗族的个案研究》。

㉝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

㉞龙廷槐：《敬学轩文集》卷七，《书外海陈氏家谱后》。

㉟参见前揭：《祖先谱系的重构及其意义》一文。

㊱《东莞地名志》。

㊲⑳《广州地名志》P. 544、P542。

㊳同治《重修广州府志》卷一五引，《顺德县志》。

㊴宣统《东莞县志》卷三八“古迹”，印光任：《重修金鳌洲塔碑记》。

㊵光绪《嘉应州志》卷二三，“禁联姓祠”。

作者叶显恩，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510620)

韦庆远，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100872)

责任编辑：郭秀文

# 清代广东沿海地区会馆分布考

□刘正刚

会馆肇始于明代,兴盛于清代,是明清时期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特定产物。一般认为,会馆主要有士人会馆、移民会馆和工商会馆三种形式。清代广东作为我国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之一,工商会馆不仅数量多,而且分布也十分广泛。然而,有关广东境内工商会馆的分布情况,至今尚无专文著述。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广东沿海地区的工商会馆分布,作一大致考察。

## 一、潮惠地区的会馆

潮惠两府位于广东东部,与福建相邻。明清时期,随着海上私人贸易和商业的不断发展,潮惠两府已成为省内外客商的重要聚集地。乾隆《潮州府志》卷五称府治所在地的海阳县,“韩江承汀赣之水,如高屋建瓴,庵埠集百货之舟,若蜂屯蚁聚”。在治城内,兴建了众多的商业会馆,“如两浙、嘉应州、镇平、汀龙各会馆……俱为塑像立庙,皆民间私建。”<sup>①</sup>据此可知,海阳县境的会馆主要是地域性的商人组织,既有省内嘉应州、镇平商人会馆,也有省外两浙、(福建)汀龙会馆。据现今仍寓居潮州的汀龙会馆最后一位董事长康晓峰先生收藏的孤本同治《汀龙会馆志》载,汀龙会馆建成于乾隆二十八年,由篓纸纲、龙岩纲、履泰纲、福纸纲、九州纲、运河纲、武平纲、上杭纲、莲峰纲、永定纲、白沙纲等十多个商帮联合建成。上述商纲,以纸业实力最为雄厚,闽西自宋代以来就以盛产土纸著称。“篓纸纲为倡建会馆之首”,会馆建成后的日常开支,也主要由篓纸纲和福纸纲承担。据该志记载,汀龙会馆各纲每年于春秋二季,祭祀天后妈祖,邀请地方官员、士绅、知名人士、商界巨子观戏、饮宴,其饮福演戏活动达25日之多。伴随着工商会馆的兴建和

商人的活动,乾隆时潮州已是“商贾辐辏,海船云集”的重要港口,乾隆《新会县志》卷三称“粤东城之大者,自省会外,潮郡为大”。

澄海是潮州府属的另一沿海大县,也是粤东商业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其商业繁忙程度不亚于海阳。嘉庆《澄海县志》卷六载:“自展复以来,海不扬波,富商巨贾卒操奇赢,兴贩他省,上溯津门,下通台厦,象犀金玉与夫锦绣皮币之属,千艘万舶悉由澄分达诸邑。其自海南诸郡转输米石者,尤为全潮所仰给,每当春秋风信,东西两港以及溪东南关沙汕头东陇港之间,扬帆捆载而来者,不下千百计……为海隅一大都会”。特别是到晚清,隶属该县的汕头港迅速崛起,商人会馆林立。据1952年统计,汕头市有广州、大埔、嘉应等21个会馆和同乡会,<sup>②</sup>其中绝大部分是工商会馆。新修《澄海四百年大事记》载:“咸丰四年潮州和福建两地商人联合于沙汕头建立漳潮会馆……同治六年海阳、澄海、饶平、潮阳、普宁、揭阳六县人士和商人于汕头埠建六邑会馆,作为集会和商业活动场所”。美国学者韩格理指出,清代广东兴宁、长乐、平远、嘉应州、镇平、大埔、丰顺和福建永定等商人在汕头共建了“八邑会馆”,广州地区商人则在汕头成立了广州会馆。<sup>③</sup>众多商业会馆的建立,无疑推动了汕头地区经济的发展。

惠州府属的海丰县濒临大海,据史料记载,光绪初年,潮郡九县商人以“永成顺”布业出面购置房地,作为建潮郡会馆的基址。后因会馆门前狭窄,又以“万和兴”商号的名义向何克勋、何克高买房地一幅,扩大会馆门前埕地。清末民初潮郡会馆成为



潮属九县商贾在海丰从事商业贸易的主要联络机关。<sup>④</sup>

## 二、广州地区的会馆

广州作为广东的省会所在地,是全省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又一直是我国重要的外贸中心基地。因此,广州的会馆性质尽管不尽是工商会馆,但也往往具有浓厚的商业气息。如位于广州长堤的潮州会馆,今人修纂的《中国文物地图集·广东分册》和《广州市文物志》均认为是清代潮州籍人士来省城应试的住所,即试馆,称八邑会馆。但周昭京先生在《潮州会馆史话》一书中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清同治年间旅居广州和香港的潮商在广州成立聚和堂,经营南北行生意。光绪二年为了商业上的需要和维护旅穗潮人的利益,广州“潮州八邑会馆”便在聚和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潮州会馆的遗迹至今尚存,但有关文字记载已佚。因此上述两种说法孰是孰非,尚难断定,但是商馆与试馆合一的多功能活动场所应是较为可信的。

广州会馆的数量到底有多少?现存史料说法不一。《粤海关十年报告之二, 1819-1901年》记载,广州当时有23家会馆。有一家为旗人会馆,其余为各省或各府的同乡会馆。旗人会馆建于1890年……其他会馆,几乎各省都有,创建时间更久远。可惜该文献并未能具体开列各家会馆的名称。据载各会馆的宗旨都一样,即为会员提供集会地点、救济贫困同乡,促进和保护同乡的生意……。<sup>⑤</sup>由会馆的宗旨可知,这些会馆均具有商业性质。另据喻守真等编著的《全国都会商埠旅行指南》记载,广州有会馆共25所,分别为奉直、山陕、江西、江苏、福建、四川、云贵、云南、广西、湖北、湖南、安徽、杭嘉湖、浙绍、宁波、金陵、漳州、湄州、新安及本省之肇庆、八邑(潮属八邑)、嘉应州、惠州、钦廉、西湖等。而1934年广州市政府刊印的《广州指南》一书,则仅罗列会馆18所,其中云浮、增城两会馆又是上述25所会馆中所无的。<sup>⑥</sup>这说明广州的会馆至少在25所以上。美国学者韩格理认为,在广州,广东商人分成

许多与周围地区不同的群体,每个群体各有其专长的生意。除不下于18个从外省来的商人所组成的会馆组织外,广东省内以正式“会馆”组织出现者最少包括17个不同的地区。会馆之外,尚有100个以上的行会,分别代表各种特定的行业。<sup>⑦</sup>韩氏的研究表明,清代广州各类地域性会馆至少在35所以上,且这些会馆都具有强烈的商业色彩,此与清代乾隆以降实行的广州一口通商关系极大。广州商业会馆的兴盛可以看作是沿海城市商业化的重要标志。

清代广州除了大量的地域性会馆组织外,还出现了同业会馆组织。颇具代表性的是康熙十四年成立的金融同业组织——银行会馆。据广州市博物馆保存的同治《重建银行会馆碑记》称:“粤东省垣银行会馆……祀其先师赵公,肇建自康熙十四年,重修于五十年。厥后六十一年及雍正九年、十二年,乾隆十三年、三十四年屡次重修”。乾隆三十四年参加重修会馆的银号为34家,到同治十二年重修时出资的银号增至64家。银行会馆的建立及屡屡重修,表明了清代广州商业经济的繁荣,需要以强大的金融组织作为后盾。

清代广州府属的新安、三水和东莞等县也有商业会馆的出现。史载:同治七年东莞商人在新安县建立东莞会馆。<sup>⑧</sup>三水县的西南镇,清中叶因商业发展,形成了“商贾辐辏,帆樯云集”之繁盛状况,该镇西马头左右先后建起了广宁会馆、怀阳会馆、连山会馆、冈州会馆和新会会馆等。东莞石龙则出现了布行会馆,民国《东莞县志》卷15称:“乾嘉而后,蚕桑业废,树艺日稀,不特棉纺织为生计,观石龙有布行会馆之设,其业之盛可知,逮洋纱出而纺事渐疏。”石龙布行会馆的建立,说明乾嘉以降东莞的棉纺织业一度十分兴旺。

广州府属南海县的佛山镇,明清时期号称“天下四聚”和“天下四大镇”之一,是南方著名的工商业城镇,汇集了省内外众多的商人团体,是清代广东境内会馆数量最多的地区。乾隆时佛山人陈炎宗在为当

地炒铁行会馆立碑时曾说：“佛山镇之会馆，盖不知凡几矣……今诸商皆有会馆，而炒铁反缺，可乎哉？庚午冬，计炒炉四十余所，始鉴谋会馆之建，诚急务也”。<sup>⑨</sup>依陈氏之言，在佛山的商家均建有会馆，不建会馆，反而被认为是怪事。据罗一星先生在《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一书中统计，佛山的地域性会馆有8所，商业行会会馆有28所，手工业行会会馆有49所，总计达85所，且以同业会馆占绝对多数。在同业会馆中，手工业会馆又占60%以上，充分反映了佛山作为手工业生产城镇的特点。而且从同业会馆的区域分布来看，商业行会会馆主要集中在佛山南部的汾水、富文、大基和丰宁等铺，手工业会馆则分布在中北部的潘涌、鹤园、福德、社亭、祖庙、栅下、山柴等铺，这说明佛山的商业中心和手工业生产中心，在清代已经走向分离，这是对中国传统工商一体的反叛。<sup>⑩</sup>美国学者何炳棣先生则认为，作为工商都市的佛山镇，尽管多数会馆的名称是根据行业而不是根据地缘来命名，但有些会馆表面上是业缘性会馆和公所，实际上是异乡人建立的地缘会馆。如制墨一行，“业此者多徽州人”；染纸一行，“业此者多侨居本乡之新会、鹤山等县人”；京布一行是南京、苏州和松江人的天下；苏裱行和酒席茶点两行中的“姑苏行”，也反映苏州商人在此经营者的人数相当可观。想象中表面上业缘性的会馆公所中，必有不少兼具地缘性，为异乡人所建。<sup>⑪</sup>何氏之言，是颇有道理的。

### 三、粤西沿海地区的会馆

粤西沿海地区包括肇庆、高州、雷州、廉州和琼州五个府。除肇庆府外，其余四府均有会馆史料的发现。兹分述如下：

高州府：素有“襟巨海而带三江，接雷廉而引浔梧……南曰吴川，东南曰电白，两邑临海巨浸重洋”。其中吴川的梅菪墟是清代广东西部沿海地区的重要市镇，商业发展十分兴旺，方志称“梅菪登高颡颡，京戏洋灯争妍斗靡”。<sup>⑫</sup>清乾隆年间，广府商人在此建立了广州会馆。据广州会馆碑记云：“梅菪当雷、廉、琼孔道，吾广人寓居众

□□□□，十居八九，使不有会集之所，居者无与言欢，行者无以节劳，众咸曰非便。乾隆辛亥岁，择爽□地建公馆，迄嘉庆壬戌孟春月告成”。乾隆以降，每年有近千名广州府商人在梅菪贸易经商，甚至有些客死梅菪。《梅菪墟义冢碑》刻于道光十年二月。从碑文中广氓贸易者常近千人以及“自有墟以来，遂积无数坟穴”<sup>⑬</sup>可看出广府商人在梅菪经商历史之久远、商人数量之庞大。而乾嘉时期，广州会馆和义冢的建购，对广府商人在梅菪凝聚同乡力量，参与市场竞争创造了条件。

雷州府：这是清代广东西部沿海对外贸易的重要基地。商业会馆主要分布在府内的赤坎、海安两个商业繁华地带。其中赤坎有会馆五所，分别为：1. 潮州会馆。位于今赤坎福建街30号内，乾隆中期由在赤坎贸易经商的潮籍商人建。该会馆的“瓷雕、砖雕、木雕有的采自佛山石湾，有的专门从潮州雇请工匠来制作”。会馆现存文物仅见乾隆四十八年和五十八年扩建碑和包鼓石及100市斤石秤砣等。另据乾隆四十八年《题建正座碑记》统计，在赤坎捐题银数的潮州籍商号商行船户共192户。2. 高州会馆。系高州六属化州、茂名、电白、信宜、吴川、石城等商贾行帮建于清咸丰三年，位于赤坎高州街25号，馆额“高州会馆”，民国12年重修，会馆门联为“旅馆盍簪同敬梓，海波澄镜到搏桑”。门联反映了高州商人经常出海贸易之事实。3. 闽浙会馆，又称福建会馆，由清乾嘉年间福建、浙江两省到赤坎贸易经商的士绅、商贾、船户们所建。嘉庆二十一年《韶安港客商船户出海次开列碑记》记载了在赤坎经商的闽浙商人共45户以及船户出海人姓名。韶安港是闽浙商人到赤坎以后用福建地名命名的一个停船出海小港，码头在闽浙会馆左侧。此外，在闽浙会馆内还存有福建商人于嘉庆二十四年在赤坎购地以福建地名建立的云霄港、漳浦港等碑刻。4. 雷阳会馆。清嘉庆年间雷州三属遂溪、海康、徐闻贸易经商者在赤坎建立，位于赤坎关庙街6号。5. 广州会馆。此会馆文献材料不

详,但光绪六年《乐善堂碑记》和光绪二十一年《乐善堂石碑记》中均有“广州会馆”捐款人名单。从排名次序看,广州会馆亦为第一。<sup>⑭</sup>另据1942年《大广州湾》记载:“赤坎初为一僻静小镇,甚少船只驶至。清康熙末年,有福建商人方某载货到此贸易,颇与土人相得,寻且陆续招致其同乡到赤坎经营”。乾隆年间,闽浙商民纷纷到此定居经商,出现福建村、福建街等居民点。接着,潮州、广州及高、雷地区商民向此云集,赤坎出现“商船蚁集,懋迁者多”和“商旅攘熙,舟车辐辏”之繁旺景象,导致上述五大会馆的陆续建立。<sup>⑮</sup>

雷州府属徐闻、海康两地,扼琼州海峡之门户,隔海与琼州府的海口港相望。徐闻境内的会馆有:广府会馆,又称广州会馆,建于乾隆五十二年,位于今徐城镇民主路43号,馆前系山货贸易场地。会馆内置有砚石刻制的《广州会馆碑》和《徐闻县新建广州会馆题名碑》共三块。据碑刻记载,广府会馆共有296个商号、商行和商店以及370人捐款题名,款额高达3429两余白银。潮州会馆,建于清代,共有三所,具体时间不详,分别座落于徐城镇民主路120号、海安港和曲界。<sup>⑯</sup>海康县的仙城会馆由广州商人建立,<sup>⑰</sup>但资料未详。不过,广州商人以仙城来命名会馆,康熙年间北京已经出现。据北京《创建仙城会馆记》称,广州商人之所以用仙城来命名会馆,目的就是为区别于广州士大夫在京创设的广州会馆,这显示了广州商人独特的个性。<sup>⑱</sup>

琼州府:隔海与雷州府相望,府治海口扼琼州海峡门户,是重要的贸易港口。早在明朝天启年间,广州府的南海、番禺、东莞、顺德、新会等五县商人已在海口建立“五邑会馆”。进入清代,随着广州商人到琼州府贸易经商的不断扩大,“日以众,不止五县之人”。于是道光七年“爰经爰营,爰球爰度,易其名曰广州会馆。庶合郡之人于此,联萍水而订苔岭焉”。南海吴荣光为此作《重修琼郡海口广州会馆记》称:“今

乡人挟厚货走千里,为近利市三倍而居处共嗜欲同者,初惟此五邑之人,继复得此合郡之人,则此役也,众擎而举,不胫而来……是以交益广而谊益笃也”。<sup>⑲</sup>潮州商人于乾隆二十二年也在海口建立了潮州会馆。<sup>⑳</sup>另据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话》称:琼州府有会馆四,分别为广州、潮州、高州和福建。此外,广州商人还于清初在琼州府的儋县建立了广府会馆。<sup>㉑</sup>

廉州府:在府属合浦县的沿海地区,即今北海市分别建有高州会馆和广州会馆。据研究,北海的广州会馆已制定有严格的会馆规章。<sup>㉒</sup>

①光绪《海阳县志》卷二十。

②广东省档案馆,全宗号235,案卷号91。

③⑦《中国社会与经济》,台湾,1980年版。

④《海丰县文物志》,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

⑤《广州现代化历程》,广州出版社,1993年。

⑥⑩《中国会馆史话》,台湾,1966年。

⑧《中国文物地图集·广东分册》,广东地图出版社,1989年。

⑨《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⑩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⑫光绪《高州府志》,卷六《风俗》。

⑬《吴川县文物志》,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

⑭⑮《湛江市文物志稿》,1986年油印本。

⑯《徐闻县文物志》,1986年油印本。

⑰《海康县文物志》,1985年油印本。

⑱《北京的会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

⑲《石云山人文集》卷三。

⑳(日)小叶田淳《海南岛史》,转引《广东航运史》。

㉑光绪《儋县志》卷四《祠祀》。

㉒参见何炳棣前揭书46页,韩格理前揭书250页。

作者刘正刚,暨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510632)

责任编辑:郭秀文

# 十年来有关南昌起义若干问题研究综述

□张晓冬

10年来,史学界围绕南昌起义的有关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在起义的贡献与地位、国民党左派旗帜的选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评价、与土地革命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现综述如下:

## 一、关于南昌起义的贡献与地位问题

南昌起义在中国革命历程中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其贡献与地位历来是史学工作者研究的热点。在近十年的研究中,大致形成了三种观点:

(一)南昌起义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起点。

朱慈华认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南昌起义对此作了最早的探索。具体表现为:第一,我党成立初期对军事问题认识不足,尽管已直接掌握一部分武装力量,但还不懂得武装斗争和组织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从而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南昌起义标志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和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始,“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历史便打开了新的一页”。第二,起义把开展土地革命作为目的,从认识上把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联系起来,同时起义领导人多次讨论制订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并在起义部队南下途中对土地革命活动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第三,南昌起义把土地革命作为目的,在指导思想必然把很大注意力转向农村,起义前夕,已明确提出了建立广东东江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后来,起义部队一部分退到海陆丰,建立了海陆丰农村革命根据地,另一部分则与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巩固和发展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因而南昌起义事

实上已揭开了从城市转向农村的序幕。<sup>①</sup>

(二)南昌起义对创建人民军队进行了伟大的探索。

张秀英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举行南昌起义,在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同时,也肩负起了创建人民军队的光荣使命,提出了建军方面的宝贵思想和主张。体现在:第一,南昌起义初步提出了党对人民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基本思想。起义前,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组织一个前敌委员会,在军中指导一切”。前委作出的“我党站在领导地位”从而使起义军“完全在党的领导下”的决定及为此而建立的组织制度,为我党如何实现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积累了经验。第二,起义规定了人民军队所担负的重大任务。党中央指出,南昌起义“以推翻新旧军阀政权,建立民众的工农政权为目的,以实行土地革命为目的。”把是否为这两个目的而战斗作为区别人民军队与国民党新军阀的标志。第三,起义提出了人民军队的革命纪律的重要内容。起义规定了起义军的行动准则,并要求官兵“守纪不扰民”、“秋毫无犯”“不拉夫,不抽饷,不住民房,不住商店,要公开交易,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产生了我军革命纪律的雏形。<sup>②</sup>

(三)南昌起义对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策略的转变做出了重要贡献。

刘松茂认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旧的统一战线已经破裂,新的统一战线亟待建立,南昌起义在党内外合作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旗帜及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等方面对大革命时期的统战策略有所继承,同时在新形势下又有所发展。后来起义军抛弃国民党旗帜而代之以中共的苏维埃红旗,标志着新旧统一战线过渡时期的完成,是中共统一战线走向新时期的显著标志,

产生了一个从名到实都是中共独立领导的、以工农为主体并团结其他革命力量的新的统一战线的雏形。<sup>③</sup>

## 二、关于南昌起义选择国民党左派旗帜的问题

南昌起义胜利后,起义军打出了国民党左派旗帜。十年来,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主要观点有:

(一)对选择国民党左派旗帜应予以充分肯定。

胡松认为,这是革命策略的需要。选择国民党左派旗帜是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及对国民党的认识决定的。理由是:第一,这是由于我党对蒋汪叛变革命后的国民党性质及其革命力量的估计失误而采取的措施。第二,这是为了争取“左派”张发奎作为起义领袖,发动回粤运动。第三,这是为了团结起义部队中的中下层官兵和争取国民党内的真正左派。第四,这是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总策略决定的。<sup>④</sup>

刘松茂则认为,这是坚持革命统一战线的需要。南昌起义对大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策略有所继承,在新形势下又有所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使用国民党左派旗帜是共产党人坚持第一次国共合作,坚持孙中山革命旗帜的具体表现。<sup>⑤</sup>

(二)对选择国民党左派旗帜应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

罗检有认为,对选择国民党左派旗帜不能采取全盘肯定或否定的态度,要对其进行具体分析。首先,这一做法适应了过渡性的历史特点。这面旗帜的使用是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共产党人创造革命政权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其认识水平也不可能超越这一特定历史条件。其次,从战略和全局上看,这面旗帜的确没有起到积极的号召作用,但从策略和局部上看却能起到暂时的缓冲作用。<sup>⑥</sup>

金再及、王俊杰也指出,中共中央这一做法正确性在于,它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划清了界限,“在坚持统一战线的领

导权的问题上,认识有了质的飞跃。同时有利于团结革命力量,组织对敌人的反击”。其错误则表现为,对武汉政府反共后形势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而且中共中央不放弃国民党旗帜,也是“错误地沿用了大革命时期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的经验”。<sup>⑦</sup>

## 三、关于对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评价问题

起义部队占领南昌后,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围绕这一革命政权的评价问题,史学工作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以下观点:

(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南昌起义的产物,它开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尝试。

罗检有指出,从政治上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行动纲领和口号是我党提出的,纲领内容虽以国民党左派《中央委员会宣言》的名义发表,但其实质是我党当时的纲领性主张,实际上起到了“八一”起义宣言书的作用。从组织上看,这个革命政权是在我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建立起来的,它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国民党右派和新军阀的政权组织,共产党处于领导核心地位。南昌起义第一次开始把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同建立革命军队、革命政权和革命统一战线联系起来,为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国家政权和政党制度,开始了最初的尝试。<sup>⑧</sup>

(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新的统一战线探索过程中的一种创造。

刘松茂指出,中国共产党重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光荣历史,珍视与孙中山共同创建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规定:“中国共产党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继承国民党正统”。这一革命政权表明了共产党人坚持孙中山革命旗帜的坚定决心,是我党在十分严峻的形势下坚持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最后努力。同时这一革命政权是一个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的革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所独立领导的统一

战线的开始。<sup>⑨</sup>

#### 四、关于南昌起义与土地革命的关系问题

十年来,就南昌起义中的土地革命问题,史学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归纳起来有以下两种不同观点:

##### (一)南昌起义是土地革命的开始。

王贵安认为,南昌起义前,土地革命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并未开始。南昌起义作为实行土地革命的第一步实际行动,一开始就高举土地革命的大旗,以军事力量来推动土地革命的实现。对于土地革命的纲领和具体政策,中央和起义领导人都作了多次有益的探索,为后来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以及土地革命路线的形成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尽管战事频繁、流动不定,没有条件大规模开展土地革命工作,但南下途中起义军仍在一些地方小规模进行了建立革命政权和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成为土地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sup>⑩</sup>

朱慈华指出,南昌起义既是土地革命的开始,也和中国革命历史的阶段划分相一致。南昌起义揭开了土地革命的序幕,成为划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不朽界碑。从此开始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土地革命的新时期。<sup>⑪</sup>

##### (二)土地革命并未付诸实践。

胡绳认为,中国共产党只有过参加北伐战争那种以占领重要城市为目标的正规军作战经验,广大农村的革命武装只被看作是配合的力量,因而南昌起义“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sup>⑫</sup>

林雄辉认为,南昌起义虽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号,而且对此集中进行过三次讨论,但组织者意见不统一,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对土地革命不仅仅是执行不坚决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执行。<sup>⑬</sup>

#### 五、关于起义军南征失利的原因

南昌起义胜利后,起义军撤离南昌,南征广东潮汕地区,结果受挫失利。失利的

客观原因是敌强我弱,这一点史学界已达成共识,但在主观原因方面尚有分歧,主要观点有:

(一)南征失利主要原因是指挥机关策略上的失误。

巩健芳指出,尽管从当时客观情势看,起义军南征广东在思想上是实际、积极的,本身也是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可贵探索,但南征失利的原因乃是指挥机关策略上的失误所致。具体表现为:第一,没有明确的政纲;第二,对土地革命不坚决;第三,没有与农民运动联系起来,没有武装群众;第四,没有摧毁旧的政权机关,而代以劳动者的政权。<sup>⑭</sup>

(二)南征失利主要原因是我党在思想认识上的失误。

郑传云认为,南征失利关键是当时我党对武装斗争缺乏足够认识,包括领导、经验的不足,也有对形势估计的不足。我党未能清楚地认识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南下广东会给敌人许多围堵的机会,从而造成起义军边走边打的被动局面。<sup>⑮</sup>

郭文亮还指出,南征失利的原因不是选错了战略方向,而是急于攻打广州、重新北伐的思想。我党发动武装起义后,为保存发展这一革命力量,虽然正确选择了广东东江为根据地,但并未有在农村长期立足的打算,而是急于攻打广州以求重新北伐,这实质是“城市中心论”的表现。<sup>⑯</sup>

#### 六、关于南昌起义的几个具体问题

(一)关于参加南昌起义的人数问题。

过去认为,参加南昌起义的总人数约3万余人。近年来,不少学者经过认真的考证,对此提出了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参加南昌起义的总人数为21000人或概称20000余人。据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记载,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叶挺部5500人,周士第部3000人,蔡廷锴部4500人,贺龙部7500人,共计20500人。加上朱德领导的第3军军官教育团学员也只有21000余人。另据叶挺《南昌暴动到潮汕失败》中记载,起义部队

共十四团。如按当时编制每团 1500 人计算,也是 21000 人左右。因此起义人数应是 21000 余人,或概称 20000 余人。<sup>①⑦</sup>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起义人数约 15580 人。据刘伯承报告记载,参加起义部队人数共约 22000 余人。但刘伯承所列只是起义前各部队人数,事实上有一部分并未参加起义。从资料考证看,叶挺所率部队 5500 人全部参加起义,第 4 军第 25 师 3 个团共参加 3000 人。蔡廷锴本人在起义打响后才到达,其所率第 11 军第 10 师并未参加起义发起时的战斗。贺龙部 6500 人参加起义。除此以外,还有朱德领导的第 3 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警察队共 500 人,另外中央农讲所 500 人中亦有 80 余人参加起义,所以参加起义共约 15580 人。<sup>①⑧</sup>

### (二)关于南昌起义歼敌人数问题。

大多数学者认为,南昌起义共歼敌一万余人。近年来,有的学者提出,南昌起义歼敌不超过 8000 人。

关于敌军在南昌的兵力,据叶挺在《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报告中记载:“在南昌之敌军有三、六、九军各军共五个团”,其番号是第 3 军的 23、24 团,第 6 军的 57 团,第 9 军的 69、80 团。此外,还有国民党地方政府的警卫部队的宪兵营。按每团 15000 人计,五个团兵力不超过 7500 人,实际上有的团人数不足,即使再加上警卫部队和宪兵营,敌人在南昌的总兵力也不会超过 8000 人。因此,起义军歼敌不超过 8000 人。<sup>①⑨</sup>

(三)关于起义部队总指挥是谁的问题。

对于南昌起义部队总指挥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史学界历来观点不一。有人认为是周恩来;有人认为起义前是周恩来,起义发动后任命了贺龙。近年来的研究认为总指挥是贺龙。

当时起义部队仍沿用了国民革命军的名称与建制,仍打着第二方面军的旗号,而贺龙以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身份所指挥的实际上就是在南昌起义的全部部队。周

逸群在报告中说,南昌起义的作战命令是由叶挺起草,“用贺龙之名(代总指挥)发表”的。说明贺龙在南昌起义时,就开始行使总指挥的职权了。因此,尽管贺龙当时还没有入党,但他的确始终担任了起义部队的总指挥。<sup>②⑩</sup>

①①朱慈华:《南昌起义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起点》,《史学月刊》1988 年第 3 期。

②张秀英:《试论南昌起义对创建人民军队的探索与贡献》,《河南大学学报》1987 年第 6 期。

③⑤⑨刘松茂:《南昌起义与统一战线》,《江汉论坛》1988 年第 6 期。

④胡松:《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为何打出不同的旗帜?》,《江西大学学报》1988 年第 3 期。

⑥⑧罗检有:《评南昌起义中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争鸣》1987 年第 4 期。

⑦金再及、王俊杰:《大革命失败后党对革命旗帜的选择问题》,《党史研究》1987 年第 3 期。

⑩王贵安:《试论南昌起义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贡献》,《山西师大学报》1988 年第 3 期。

⑫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出版,第 80 页。

⑬林雄辉:《“土地革命”口号始起南昌起义说不能成立》,《争鸣》1989 年第 6 期。

⑭⑮巩健芳:《南昌起义再探》,《史学月刊》1989 年第 6 期。

⑯郑传云:《南昌起义军南下行动评述》,《江西社会科学》1987 年第 2 期。

⑰郭文亮:《对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战略决策的两点看法》,《教学与研究》1987 年第 5 期。

⑱⑲夏道汉:《对“八一”南昌起义和井冈山根据地几个争议问题的看法》,《求实》1987 年第 1 期。

⑳曾祥健:《南昌起义参战人数考》,《军事历史》1997 年第 1 期。

㉑南昌八一纪念馆编:《南昌起义》1987 年第 1 版,第 567 页。

作者张晓冬,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历史系(210003)

责任编辑:郭秀文

# 香港回归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 郑 群

香港的回归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英国在亚洲殖民统治的终结。从此,香港回到祖国怀抱,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从一定的角度上说,香港回归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历史必然。

## 一、中国综合国力增强为香港顺利回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840年,对于每一位中国人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罪恶的鸦片战争彻底地改

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一个经历了数千年沧桑的文明古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香港,被置于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之下。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从那以后的整部中国近代史向人们沉重地诉说着这样一个事实:落后就要挨打。在近代,中国落后,决不只是军事的落后,而是综合国力的落后,民族凝聚力的衰微。为此,才使中国在历次对外战争中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确切地说,近代中外之间的较量,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军事对抗,更多地显示出涵盖着物质技术层面、政治制度层面以及文化思想层面的力量对比。

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弱往往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状况。民国以后,旧中国历届政府虽然多次提出要收回香港,但都没有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上受制于人。经济命脉为外国资本所控制,导致了民生的凋蔽、国力的衰弱和中华民族的离散。

今天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终于找到了一条符合自己国情和世界潮流的改革开放之路。这是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挨打受辱教训反思的总结,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升华。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日益改善,政治昌明,社会安定,文化繁荣,全国各族人民空前团结,中华民族凝聚力大大增强。这些充分表明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带来了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香港与中国内地在经济上的互利、互惠及良性互动关系,更是为香港的顺利回归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民族生存永恒的根本条件与决定因素,共同的经济生活是中华民族及其凝聚力根植的土壤。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是: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力的增强,是香港回归的重要因素之一。100多年的历史昭



示人们,要掌握决定民族前途命运的自主权,就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走改革开放、发展民族经济之路,增强综合国力。诚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发展才是硬道理”。

## 二、“一国两制”为香港顺利回归提供了具有重大价值的原则和理论

“一国两制”是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用以凝聚全民族、实现祖国统一的强力凝聚剂。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与增强,总是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社会政治。社会政治对民族凝聚力的作用,往往要通过领导者集团所实行的政策来表现。“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就是我国党和政府用以影响和凝聚香港同胞以及中华各族儿女,推动中华民族凝聚力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的方针政策。首先,它丰富了爱国主义的内涵。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文中,邓小平同志指出:“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求爱国之同,存不同社会制度之异,就使“一国两制”的理论和政策对香港同胞发挥出极大的吸引力与凝聚力。97香港回归之后,香港移民的大量回流,便是广大香港同胞对未来中国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信心日益增强的生动表现。众所周知,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凝聚的主旋律和基石。“一国两制”对爱国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就使它成为激发香港同胞的爱国情感,增强对祖国向心力的重要精神力量。其次,它为祖国统一事业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历史,尊重现实,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提出的具有重大价值的原则与理论。随着“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贯彻实施,“一国两制”对祖国统一大业所起的作用将是难以估量的。事实上,充分体现求同存异原则

的“一国两制”构想,不仅在政治上有利于香港的平稳过渡,而且在情感上更有利于香港人心的回归。同时,香港问题的解决,率先垂范,又将为解决澳门问题和台湾问题,提供范式。可以这样说:“一国两制”的实施开辟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新前景;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进一步增强,又将极大地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伟业。

在此,我们还必须深深记取的是,近代中国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一个腐败无能的政府是无法指挥战争取得胜利,更无法领导国家和民族走上独立、自强之路的。今天,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必定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能振兴的根本保证。香港的回归及回归后的长期繁荣与稳定也必将获得更加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 三、香港回归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功能使然

所谓中华民族凝聚力,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赖以统一、独立和生存、发展的内在动力。具体包括:民族整体对民族成员的吸引力,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的向心力以及民族成员之间的亲和力。如果没有这种吸引力、向心力和亲和力合成的强大动力,香港的顺利回归是无法实现的。

应该说民族整体的吸引力与民族成员的向心力、亲和力是互动相生、相辅相成的。从近代以来港人的斗争史看,香港同胞坚韧的民族斗争意志与强烈的爱国精神是香港回归的重要驱动力。尽管100多年来,港英政府千方百计地压抑港人的民族意识,淡化港人的民族感情,但是香港同胞始终心向祖国,情系中华,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感及对祖国的向心力。从辛亥革命到解放战争,香港不仅是港人与英国殖民者进行占领与反占领的长期斗争的战场,而且也是革命者集结力量策动进攻的据点,同时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地之一。这些表明,广大香港同胞对祖国是一往情深的。

正因为香港同胞对祖国、对中华民族有如此强大的向心力,香港的回归才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从香港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来看,香港文化与中华文化是一脉相承的。香港同胞与内地同胞有着割不断的历史与文化联系以及血浓于水的亲情关系,特别是两地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与千古认同的民族精神,这为两地同胞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寻求共识,建立共信,提供了前提。

从香港腾飞的历史看,“中国因素”始终是香港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祖国对香港同胞具有强大吸引力的重要基础。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内地都为香港提供了发展与繁荣的重要条件和保证,一直以来,中国内地的副食品供应,东江水调港,保证着香港同胞起码的生活条件。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为香港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劳动力和资源,进一步提高了香港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香港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努力中,不仅为内地提供了资金、技术、设备、人才和信息,而且成为内地与国际接轨的枢纽。在这种互补互利的合作中,民族亲和力的日渐增强,为香港的回归奠定了物质的与精神的基础。

需要提及的是,香港回归后,继续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与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一方面,香港的稳定与繁荣将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将进一步促使香港更加繁荣。

总而言之,正由于中华民族具有千百年来不断发展、壮大的民族整体对民族成员的吸引力、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的向心力、各民族成员之间的亲和力及其所具有的确保民族团结、统一功能,才使香港回归祖国成为任何外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必然。我们坚信,香港回归后,这颗“X 东方之珠”将会创造出新的奇迹,并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作出自己更加辉煌的贡献。

作者郑群,广东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会(510400)

## 新的探索

## 新的建树

——《当代中华凝聚力》序

□张磊

广东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研究开发较早,也陆续出版了一些论文集或专著。现由范英同志主编、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华凝聚力》这部近百万字的新著,则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和拓展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探索,为新时期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给予许多有益的启示。

《当代中华凝聚力》一书,首先是选题上见功夫。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文明而悠久的历史,每个时代都有其凝聚力的问题,都需要分别进行研究,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我认为,最紧迫、最需要、最具直接作用的,就是要对中华民族凝聚力在当代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作出重点的探讨;同时以这种探讨为主线,把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凝聚力问题有机地带入其中,力求古为今用,以利于发展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而且,在以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为主线的研究中,也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未来走向加以预见,力求放眼前程,以推动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不断提升。本书的选题正是体现了这样一种思路。这个思路

无疑是精当的。而且这一选题更说明,它不是单纯为学术而学术,为理论而理论,而是紧紧地抓住了学术理论研究为现实服务的根本宗旨,因之产生为振兴中华而贡献智慧和力量的直接效应。

《当代中华凝聚力》一书,不仅选题好,而且构架本身全面、系统和新颖。研究中华民族凝聚力,在论著上可以有各式各样的构架。这些构架总的要求应该比较全面、系统。我认为本书在这一点上也做得比较好。它从总论中阐释当前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的概况,到提出“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相关的8个重要概念,再到正文关于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内涵——包括物力内涵、智力内涵、引力内涵和活力内涵;成因——包括历史成因、阶级成因、社会成因和现实成因;主体——包括民族主体、群众主体、阶级主体和政党主体;客体——包括自然客体、社会客体、硬件客体和软件客体;属性——包括民本主义属性、爱族主义属性、爱国主义属性和社会主义属性;特征——包括大一统特征、大联合特征、大团圆特征和大开化特征;功能——包括内部功能、外部功能、上层功能和基层功能;发展——包括对比发展、内部发展、外部发展和全面发展等8大编32章的整体布局和逐层展开,不仅充分地表明其构架的全面、系统,更难得的是这种构架所具有的新颖性。这种新颖性主要表现在构架中的许多命题,虽然有待进一步考察,但它是当前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领域,或所未提炼过,或所未触及过,或所未引进过,或

所未论证过的,都作为一家之言,被一一加以展示与剖析。此外,书中还有大批新的命题及其论述,也往往可以看到闪光的思想火花。综观全书,我之所以认为它深化和拓展了中华民族凝聚力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主要依据就在这里。

《当代中华凝聚力》一书,不仅在该领域的学术理论上有了新的建树,而且于新时期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也是一本观点鲜明、内容丰富、行文通俗的好书。作者们注意融学术性、理论性、实践性、操作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并以平等的姿态而不是说教的姿态与读者们交流,这也是我愿意将此书介绍给广大读者的又一个原因。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强调指出:“爱国主义教育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要贯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我们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同志,应当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不断发扬研究工作中的特长优势,不断改进薄弱环节,不断提供好的精神产品,这是义务和责任。同时,也希望能有更多的热心读者都来支持我们的工作。因为观众的掌声对于“运动员”来说,有时比金子还宝贵。就本书而论,由于它具有新的探索和新的建树,我认为给予鼓励是应该的。所以不揣浅陋,写了以上看法聊作序记。

作者张磊,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  
(510620)

\*\*\*\*\*

# “一国两制”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章权才

\*\*\*\*\*

从1997年7月1日起,香港彻底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的枷锁,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彪炳中华史册的大事,是中华民族自尊自强的新胜利。

随着香港的回归,“一国两制”开始从构想变为现实。“一国两制”与民族凝聚力是一种什么关系?在“一国两制”条件下,中华民族凝聚力能否实现和怎样实现新发展?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新课题。

## 一

什么是“一国两制”?1984年6月22日和23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人时说:“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sup>①</sup>1992年10月,党的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对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从9个方面进行概括,其中关于祖国统一的问题,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作了这样的阐述:“在统一祖国的问题上,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这就是“一国两制”基本内容的概述。

实施“一国两制”,有个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就是“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而实现和维护祖国的统一,则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业已形成的心理定势,也是当今亿万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固有的思想。自西周以来,这一思想作为一种理性自觉,便深深扎根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心中。春秋

战国时期,虽然许多学派在理论体系方面千差万别,可是在追求和维护国家统一这个重大问题上,各家各派却有着共通的认识。西汉时期,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在《天人三策》强调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这种把大一统看作是天经地义、古今通则的理论,对后世影响极大。以国家统一为乐,以江山分裂为忧,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政治准则,成为中国各族人民代代相传的价值取向。

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发展演变的历史,就是以大一统为主导、各族人民在大一统的版图内和衷共济以至融合发展的历史。“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秦始皇击灭六国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封建专制统一国家。从此,这种政治统一局面就在矛盾运动中一代接一代地延续下去。东汉末年由于军阀混战分为三国;唐末由于藩镇割据而导致五代十国的出现。但从历史发展的总体和流势上看,这两次分裂割据是短暂的、变态的;而统一则是长期的、正常的。

孙中山说:“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民之所欲,天地从之”。邓小平同志说:“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sup>②</sup>统一是中华民族团结凝聚的重要表征,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得以积累和发展的重要政治条件。提出“一国两制”以此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正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

“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个新事物。邓小平同志说:“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sup>③</sup>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究竟“特”在什么地方呢?我

们认为,特就特在这个理论扎根于中国的实际。这个实际就是:第一,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台湾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第二,香港、澳门和台湾,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努力,经济上有了较大的发展。香港和台湾,同属亚洲“四小龙”。在国际金融经济中,香港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那里的人民已习惯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他们希望在祖国统一的基础上能保持本地区的稳定和繁荣;第三,中国内地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稳定的政治局面和中华民族的大团结,香港、澳门、台湾同内地可以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共同为祖国的繁荣作贡献;第四,作为炎黄子孙的港澳、台同胞和内地人民,都存在一个共同愿望,都强烈希望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正是在尊重历史、面对现实的基础上,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提出来的,因而也是完全正确的。

纵观古今中外,实现国家的统一,不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的;一种是武力的。究竟采用哪一种方式?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取舍,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两相比较,如果能通过和平协商实现统一,那是最为理想的。因为动用武力,势必带来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甚至国力耗尽,玉石俱焚,还会给后代人留下深深的仇恨。“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所力争的是和平的统一。和平的统一可以化敌意为祥和,化干戈为玉帛,变分裂对峙为统一合作,这正是国家民族根本利益之所在,也是一国四地人民长远福祉之所在。这个政策得到全国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的一致拥护,是理所当然的。

## 二

在“一国两制”条件下,中华民族凝聚力无疑能够实现新发展。这是因为,“一国两制”是以“一国”为前提的;“一国两制”存在着文化认同问题;“一国两制”内涵着合作和竞争。这些,正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新发展的前提、基础和动力。

必须指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是由“一

个国家”和“两种制度”有机组合而成的。其中,“一国”是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也就根本谈不上和平统一和两种制度的问题。

“一国”,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国”,意味着主权的回归。“一国”是指在“一个中国”的旗帜下开展活动,判断是非,这意味着对各种形式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等论调的坚决否定。以“一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前提,全国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的政治生活就有了一个基本的准则,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就能发展和高扬自身的亲和力和向心力。这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乐于为全国人民普遍接受的原则问题。

无可置疑的事实是:一国四地的居民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既然这样,就毫无例外地存在着一个文化认同问题。文化认同,至广至大,它可以大到超越具体的时空。从纵的方面说,它可以由今及古;从横的方面说,它可以由此及彼,由内及外,中国内地的人民固然存在文化认同问题;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同样存在文化认同问题。香港回归后,“一国两制”开始从构想变为现实。内地与香港,虽然实施两种不同的制度,但文化认同问题却客观地存在,它并不受到具体制度制约和人为羁绊。因此,文化认同问题也就成了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前发展的深厚基础。

民族是一个共同体。民族文化是历史地形成的;民族文化一旦形成,又给本民族的历史发展以巨大影响。相对来说,民族文化的自守性是比较顽强的,它主要导源于民族文化的个性。许多富有民族特色的精神产品,是该民族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的智慧结晶,久而久之,它便成了民族成员之间联系感情的纽带,成了民族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文化,始终内现着该民族灵魂的搏动,以巨大的向心力吸引着该民族的各类成员。这就是民族文化认同的机制。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是具有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民族。中华民族文化光辉灿烂,它源远流长;它博大

精深；它绚丽多姿；它影响长远。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领域，在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文学、史学、哲学、教育学、道德伦理学等方面，我们祖先的研究成果，都足以使它的祖孙后代引以自豪，都足以使世界各国叹为观止。这也正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比世界各国尤为强烈的深厚根由。

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大群体。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内涵着不同民族内部的文化认同。但主要是汉民族内部的文化认同。作为一个整体，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在如下几方面存在共识：第一，中国各族人民都以“中华民族”作为自己的种族。第二，中国境内各民族都以炎帝和黄帝作为自己的祖根。第三，中国各族人民都以“中华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这三个问题，也就是“同种”、“同根”、“同文”的问题。

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其内容无比丰富，但有一点是主要的，是举世瞩目的，这就是认爱国主义之同。爱国主义作为一种理想信念、一种道德规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但各个时期的爱国主义毫无例外地都内含如下两方面内容：一是对自己的祖国、民族、人民、山河和历史文化无比热爱；一是对祖国、对本民族深怀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前者是偏于感性的，后者是偏于理性的。对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认识，造成民族的自觉，促进民族的凝聚，使民族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不断转化为现实。事实表明，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既内涵着丰富饱满的爱国主义理论，又内涵着许多百折不挠的爱国主义实践。这种爱国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把中华民族紧紧团结在一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谱出一曲又一曲威武壮丽的凯歌。

香港、澳门和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都是炎黄子孙。从文化表现形态看，这三个地区跟中原文化，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以香港地区为例，根据考古发现，香港地区的史前文化同广东以至中原地区的史前文化同属一个大系统。早在五六千年前，香港地区已像中原地区那样形成了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文化。秦汉以后，香港地区一直处在

中国历代王朝有效管治之下，中原文化和广东文化的影响，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加深。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香港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汇点，这里既有中国传统文化，又有西方文化。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多元文化杂处中，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是基本的，心系祖国的文化认同心理永远是强劲和不可遏止的。

在香港的近现代文化中，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得十分突出。百多年来，中国内地的社会政治巨变，香港都程度不同地被卷入其中。从19世纪反抗西方列强的斗争到20世纪的海员大罢工、省港大罢工；从支援辛亥革命到抗日救亡……，香港地区反帝反殖民、反封建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爱国主义思想意识通过斗争实践愈来愈深入人心。1991年，华东地区遭受百年未遇的水灾，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不计政治立场、不分内地和港澳，一起站在“血浓于水”的横额下，募捐赈灾。上至工商名流，下至黎民稚童，无不慷慨解囊，共赴艰难。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既是文化认同的又一次展示，又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提升，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焕发出耀眼的光辉。

### 三

“一国两制”无疑是矛盾统一体。“两制”是指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从本质和理论体系上说，这两种制度是互相矛盾、互相排斥的；但同时又是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存的。它们之间既对立，又统一。它们又共存于“一国”之中。这种政治架构，这种特定的矛盾统一体，使矛盾运动有了新的规定性，也给中华民族凝聚力在当代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涵和新的活力。

在认识和处理此类矛盾当中，在促成矛盾的转化以造福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伟大事业当中，我们要着眼全局，着眼未来。有几个观点特别需要强调：

第一，要高扬振兴中华、实现四化这面共同理想的大旗。这是爱国主义在当代的具体体现。必须指出，民族凝聚力的产生和发展，向来跟特定时期民族发展的总体

目标息息相关,换句话说,向来跟特定时期特定民族的共同理想息息相关。共同理想是民族的精神脊梁。对共同理想的认同,必然导致民族内部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强化,巨大的民族力量也会因此喷薄而出。在当代,在“一国两制”条件下,什么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呢?一言以蔽之,这个共同理想就是振兴中华!具体而言,就是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本世纪末,要使我国经济达到小康水平;到下世纪中叶,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这个共同理想,集中了我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爱国者的利益和愿望。高扬这个共同理想,就能保证全国各族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和精神上的团结一致,克服任何困难,不断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这也正是当今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

第二,强调和谐、求同存异。可以预料,按“一国两制”方式实现统一后,港、澳、台和内地四个地区实施两种不同的制度,必然是和谐与冲突并存。两种制度、四个地区固然存在着许多共同需要、共同利益,形成唇齿相依的关系;但是,彼此之间也确实存在着多种性质不同的矛盾,存在各个领域的相互竞争。我们无疑要正视这个客观存在的矛盾;但更重要的是要采取正确的方法解决各种矛盾。在一个国家内部,整体与部分之间,部分与部分之间,强调和谐,淡化冲突,无疑是解决矛盾的重要方法。强调和谐,就是强调目标的一致性;就是强调整体利益高于一切;就是强调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求同”。一国四地,同一性是广泛存在的、层层贯通的;“求同”是大有可为的。比如,在经济领域,内地与港、澳、台,本来就同属于一个自然经济区,经济上的互补性是历史形成的。但是在过去,在殖民统治时代,四地的经济联系和发展受到政治和人为的诸多限制。实现统一后,这些限制的藩篱将被拆除。通过协调,可以在发挥各自优势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大的中华经济区,全国资源可以更好地配置和利用,彼

此经济联系将大大强化,新的生产力将大大地被发掘出来,到时,不仅内地,而且港、澳、台经济,无疑也将跨上一个新台阶。

第三,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同一切破坏“一国两制”落实的国内外反动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香港的回归,“一国两制”的逐步落实,对中国人民是一件大好事;但对世界上一切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势力,则无疑是个坏消息。110年的中国近代史,其实就是西方列强瓜分中国和中国人民反瓜分、反占领的历史。新中国的成立,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是国内外反动势力并不甘心于它们的失败。西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不让中国团结统一,破坏中国人民奋发自强,可谓处心积虑,无所不用其极。它们不愿看到统一富强的中国屹立于东方。而中国人民则始终把推进祖国的统一视为神圣的职责,坚定不移,百折不挠。于是,斗争便不可避免。近十数年来,尤其是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西方殖民主义者眼看无可奈何花落去,它们所使用的手段更加卑鄙无耻。它们热衷于打这个“牌”、那个“牌”,甚至明目张胆,赤膊上阵,横加干预。在西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卵羽下的各种反动势力、反动论调,也一时甚嚣尘上。这,集中表现为分裂主义的猖獗。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所作所为,目的非常明显,就是妄图破坏“一国两制”的落实。当然,形形色色的分裂主义、卖国主义,其阴谋是逆时代潮流而动,是违背中国的国情、民情,到头来终究会彻底失败。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众所周知,民族凝聚力与民族离散力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同种种民族离散力的斗争不可避免,这也正是民族凝聚力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我们坚信,正义和理性终将战胜。“一国两制”从构想变为现实之日,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谱写新篇章之时。

---

①②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8页、第59页、第218页。

作者章权才,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510620)

# 增强凝聚力

# 克服离散力

——香港回归后长期繁荣稳定的保证

□陈剑安

在海内外炎黄子孙的欢呼声中,香港回归祖国,已由百年梦想化为感人的现实。然而,回归后的香港,如何才能在祖国的怀抱中保持长期的繁荣稳定,仍是每一个中国人备加关注的问题。我们认为,大力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克服民族的离散力,是回归后的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重要保证。

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我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民风、民俗等方方面面。在我们按“一国两制”的政治方针收回香港之后,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在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保证香港繁荣稳定方面,仍居有核心和灵魂的地位。

当前,要坚持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就必须“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因为这一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当代中国,只有这个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sup>①</sup>这个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只有认真地学习这个理论,并把握其精髓,才能正确地认识当代中国的国情,才能正确地理解脱胎于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尚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方略,来解决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加强综合国力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保证香港稳定繁荣等重大问题。

不言而喻,“一国两制”是这个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通过《宪法》业已铁定的基本国策,因而更是香港在祖国怀抱中长期繁荣

稳定发展的基本保证。所以,我们要力谋香港的进一步辉煌,就尤其要领会“一国两制”的内涵,尤其要把握其注重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真髓。事实上,只要我们对照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就可以发现,“一国两制”的理论,确实渗透着注重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精神。其中包括洞察国情的理念,海纳百川的胸襟,爱国为本的品格等。

鉴于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已达百余年之久,鉴于港人因长期隔绝而对祖国的发展不甚了解,鉴于香港的资本主义体制、自由港地位及其所创造的“奇迹”,同时也鉴于武力收回香港并非最佳方案,所以,邓小平提出了中、英双方和港人都可以接受的“一国两制”的构想。他强调:这一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sup>②</sup>今天,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导下,香港回归祖国已成为令人感奋的现实,这充分说明,这一方针具有凝聚港人、增强中华民族内聚力的巨大功能。这也是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英两国政府举行的香港交接仪式上,重申“中国政府将坚定不移地执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针”的一个重要原因。<sup>③</sup>

鉴于“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sup>④</sup>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sup>⑤</sup>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具有超强的稳定性;鉴于我们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sup>⑥</sup>鉴于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也是一个好办法”,<sup>⑦</sup>搞“一国两制”,人民既拥护,港人又称心,所以,邓小平先是智慧地指出,允许香港以及台湾、澳门等小范围的资本主义的存在,非但没有



什么可怕之处,而且“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sup>⑧</sup>继之又慨然宣称,要“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均“五十年不变”,<sup>⑨</sup>又说,五十年政策不变,“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五十年后也不会变”。<sup>⑩</sup>可见,邓小平所展示的,不仅是中华民族传承至今、极富凝聚力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襟怀,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共产党“求同存异”的统战理论。过去,人们常常概括那种理论是“求大同、存小异”的理论,而“一国两制”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崭新的“求大同、存大异”理论。这里的“大同”,就是中华民族追求祖国统一之大同,这里的“大异”,就是在一国之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并存的大异。今天,我们实践这个崭新的理论,已实现了香港平稳交接,已增强了600万港人与祖国人民的凝聚力。今后,我们要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就要在具体工作的实践中,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理论的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功能。

鉴于中华民族是一个有56个兄弟民族的复合民族,除12亿同胞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外,尚有港、澳、台同胞以及海外侨胞数千万人,与中华民族一脉相通的外籍华人、华裔也不在少数;鉴于“振兴中华”和促进香港繁荣稳定,是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关注的事业,而他们之中又存在着诸如地区、国别、党派、宗教、信仰等差别,要使他们“和而不同”地释放出民族的凝聚力,就必须凸现出方方面面共同取向的政治核心和共同接受的政治基础。正因为此,邓小平以总设计师的超人智慧和注目全民族整体利益的气度,赋予了“一国两制”理论以吸引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的政治内涵,这就是,“一国两制”以统一祖国为政治核心,以爱国主义为政治基础。这就把中华民族传承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当代的爱国主义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值得注意的是,为使各方面“和而不同”地释放民族的凝聚力,邓小平对现时中华民族的爱国者,还作了宽泛而又准确的诠释。他在谈到香港问题时曾这样说:“什

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sup>⑪</sup>显然,制定这个实际是以拥护“统一祖国”为主要内容的爱国者或爱国主义的标准,对于海内外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互相凝聚,共谋香港的繁荣稳定之道,是极富建设性的。在香港回归祖国后的今天,我们要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就一定要发扬“一国两制”理论的爱国主义精神,并本着这种精神,不断地为香港再造辉煌。

我们强调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的重要性,是因为它具有统一认识、把握前途的穿透力;我们强调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一国两制”理论的重要性,是因为它能解决凝聚民心、香港回归以及香港回归后不断繁荣稳定发展的重大问题。当然我们一刻也不应忽视经济、文化等建设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香港繁荣稳定的巨大作用,尤其不应忽视经济建设的基础性作用。邓小平在谈到这方面问题时就曾指出:“其他许多事情都要搞好,但是主要是必须把经济建设搞好”,“经济发展了,我们实现统一的力量就不同了”。<sup>⑫</sup>实际上,以江泽民为首的共和国新一代领导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领导们,都对经济建设之于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香港繁荣稳定的重要性,获得了高度一致的共识。正因为此,江泽民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庆典上强调:“我们将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政府一贯支持香港的社会稳定 and 经济发展”,香港回归后,内地与香港的经济联系不仅“将更为密切”,而且将为香港的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更大的动力”。<sup>⑬</sup>正因为此,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特区成立庆典上的演辞中说:“任何社会都需要有自己的价值观,这样整个社会才有凝聚力,才

会有共同目标”，“在‘一国两制’的新环境下，我们将会有许多机会和充分条件，去认识国家，认识民族；去热爱国家，热爱民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重新接上中华民族的根，‘一国两制’的事业才能成功”。进而强调，“提高香港经济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是我们的首要任务”。<sup>⑭</sup>

## 二

为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我们在致力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同时，还必须聚精会神地克服民族内部的离散力，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同样是我们克服离散力的锐利思想武器。

所谓离散力，简言之，是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消极因素而成的一种负面力量，是民族内部的涣散剂，因而也是妨碍香港繁荣稳定的障碍。其主要表现，有民族分裂主义、民族投降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四种。

我国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像东欧和前苏联那样，存在着严重的民族问题，加之我们有鉴于历史上民族问题，实行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sup>⑮</sup>民族分裂主义并没有什么市场。至于香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是中国人，其中的大多数又是广东人，他们和内地同胞有不可分割的血缘、地缘等关系，因而民族分裂主义，不大可能是威胁香港繁荣稳定的主要危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现时台湾的“台独”分子，仍倒行逆施，试图把台湾从祖国版图中分裂出去，所以我们在迎击“台独”势力的同时，也要警惕这股势力向香港蔓延。

民族投降主义与卖国主义名异而实同，都是为了保全和扩大个人、小集团或狭隘的民族利益，不惜出卖全民族整体利益的现象。当年的香港，正是在英帝国主义的武力胁迫下，断送在清朝大小投降主义者的手中。今天，大英帝国已今非昔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综合国力，已远不可和当年的清朝等量齐观。我们民族内部的投降主义已日

渐式微。但是我们还不能说，投降主义已与我们的民族完全绝缘。那些秉承西方敌对势力意旨破坏香港回归、攻击共和国这也不行那也不妙者，其实都是当代的投降主义表现。他们虽然不是在外来武力的胁迫下走向堕落，却完全可能是倒在外来势力的“糖弹”或“意识形态”之弹面前的败类。作为英国经营了150多年的香港，显然更需要清除投降主义的土壤。为此，我们有必要以史为鉴，将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为宣扬爱国主义和反对投降主义的生动教材，警惕并回击外来敌对势力在我们民族内部培养代理人或投降分子的阴谋。

在我国历史上，我们民族内部曾存在的沙文主义，反映在对内、对外两个方面。对内，集中表现为轻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正统观念；对外，集中表现为闭关自守和盲目自大。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已从根本上抛弃了落后的大汉族正统观念，已把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的问题，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旧中国传承的那种对内的沙文主义已不复存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从根本上认识了闭关自守和盲目自大的弊端，并焕发了前所未有的面向世界、追赶潮流的精神，古代曾表现出来的那种对外的沙文主义也不复存在。尽管如此，我们仍有必要谨防新形势下的沙文主义或散发着沙文主义气味的思想，因此，认清国情，居安思危，仍是我们振兴中华，促进香港繁荣稳定的应有动力。江泽民同志强调，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sup>⑯</sup>董建华认为，经过将近30年的发展，香港已取得了足以自豪的成就，但是，自回归之日起，“我们必须居安思危”，“我们正面对强劲的对手，以及高通胀对香港竞争力的威胁，因此必须保持警觉，不能有丝毫松懈”。<sup>⑰</sup>显然，他们的见解和忧患意识，反映了我们民族对香港和全中国前途的责任心。如果我们炎黄子孙永远保持着这种理性的忧患意识，那么，历史上的沙文主义就不可能回潮，香港乃至全国的繁荣稳定，就有了

更加可靠的保证。

民族虚无主义,是与民族沙文主义相对的另一端涣散剂,是在反思本民族文化、吸收他民族文化时,产生出来的一种谬误。其基本特征是,在思想上陷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本位的中华民族,不能正确认识本位民族的能力和业绩。它极易伤害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妨碍人们焕发出中华民族奋发向上、再造辉煌的精神。由于我国曾在近代备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有一段“落后挨打”的历史;由于香港刚告别港英殖民统治,有一个长达150余年的蒙羞的昨天,所以,在我们的民族中,还不能在某个早晨,就把民族虚无主义清除干净,还会有人妄自菲薄,总以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还会有人为港英殖民统治套上漂亮的花环。因此,我们还必须下一番认识自我和认识他人的功夫,下一番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功夫。我们宣传“四大发明”、长城、丝绸之路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大力宣传当代中华民族的能力与业绩,共和国骄人的发展速度,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对于港人,要充分认识到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要树立信心,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差,“香港人是能治理好香港的”。<sup>⑬</sup>如此,我们才能充满自信和自豪,把香港乃至全中国建设得更美好。当然,我们在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的同时,决不能流于盲目排外,而应该吸收世界其他民族文化之所长,在特别行政区香港,尤其要“兼收中西文化所长,保持多元化特色”,<sup>⑭</sup>既为香港自身的繁荣稳定,也为祖国改革开放和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贡献出自己应有的力量。

综上所述,在香港回归后的今天,我们要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这样的理性认识:因为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应该以“一国两制”的方针收回香港;因为香港已回归祖国,所以她实行的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我们的事业是艰巨的,前无古人的,它将考验着我们中华民族的能力、决心和勇气;我们要成就壮丽辉煌的事业,保证香港的繁荣稳定,就必须大力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迎击各种离散力,使我们中华民族与时俱进,长盛不衰,永保无往不胜的巨大力量。

---

①江泽民:《高举伟大旗帜 踏上新的征途》,《人民日报》1997年5月30日。

②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⑬⑭《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9-60、59、373、217、96、103、215、267、61、257、6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③《在中英两国政府举行的香港交接仪式上江泽民的讲话》,《人民日报》,1997年7月1日。

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0-241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庆典上江泽民主席的讲话》,《光明日报》,1997年7月2日。

⑱⑲董建华:《追求卓越 共享繁荣》,《光明日报》,1997年7月2日。

⑳江泽民:《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中央纪委第八次全会上讲话的摘要),《南方日报》,1997年5月16日。

作者陈剑安,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510400)

本栏责任编辑:冯 生

—

文的评点是在宋代出现的。其基本精神与诗话如出一辙,但是,诗可以有诗话形式,文却不可以有文话形式,这是因为诗的体制规模有限,无论品评声律、对偶、用典、意象、遣词都可以透过引用,汇为小段而铸成一说。但文却不能透过引用而品评有关文的细部问题,它为文的篇幅所限。有关文气、段落、句式、论点、语文修辞等,必须依附文本才可以表达出论者的论文的宗旨。正是在这种基本相同的批评取向下,论诗就产生了诗话的形式,而论文就产生了评点的形式。文章评点的出现与文本读解、品评的精细化,启示后学方便法门是很有关系的。当然,文章的评点还存在很实用的目的,这就是应付科举之用,它的“教科书”性质是很明显的。而诗话不同,就它只关评论者对诗学的悟性与心得。读宋诗话,一股闲雅之气扑面而来,感受到士大夫沉浸在文学的想象天地。而读宋代的文章评点则感受不到士大夫的闲雅高致,更多的是书匠教训之气。所以,当我们考察文章评点起源的时候,一方面应当注意到文学批评在唐宋以来基本取向发生的转变,另一方面应注意宋以来古文、经义的教育。宋太祖偃武修文,科举兴盛。经义是科举考试的文体,文人士子为了仕宦前途致力于古文、经义,这完全是题中应有之义。正是这种人生的实用之学,促使了评点之学在宋代的出现和兴盛。现今看到少数宋代流传的古文选评点本,就是

出于古文、经义教育的目的而编选的。它既得到道学家的热心支持,因为它有助于传播、光大儒家圣人之道;又得到书商的支持,因为它与利禄之途有关,书商可以从中牟利。因此,评点之学在宋代发达,多种评点范本流传至今就理所当然了。

宋代影响最大的古文评点范本有三种:吕祖谦《古文关键》、谢枋得《文章轨

# 明 清 之 际 小 说 评 点 考 论

□林 岗

范》、楼钥《崇古文诀》。①吕祖谦编取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张耒之文共60余篇,辑成《古文关键》二卷。四库全书《提要》谓其宗旨:“各标举其命义布局之处,示学者以门径。故谓之关键。卷首冠以总论看文、作文之法。”②张云章《古文关键序》亦说,“观其标抹评释,亦偶以是教学者,乃举一反三之意。且卷后论策为多,又取便于科举。”王守仁序《文章轨范》亦以为编选宗旨与科举有关:“宋谢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资于场屋者自汉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标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轨范》。盖古文之奥不止于是,独为举业者设耳。”③后学子总是要掌握古文的奥义,无论以此载道也好,博个仕途出身也好,都离不开古文、经义的用世价值。

姚瑶《崇古文诀序》代表了道学家对古文评点的支持意见:“文者载道之器。古之君子非有意于为文,而不能不尽心于明道。故曰辞达而已矣。能达其辞于道,非深切著明,则道不见也。此文之有关键,非深于文者安能发其蕴奥而探古人之用心哉!”④当然,评点对于科举、载道的用

世价值并不直接决定于评点本身,它们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评点学的思想倾向和促进评点的文本品评的特性。评点最根本的地方是它对具体文章的条分缕析。

就具体文体作详尽的条分缕析,形式上最可能的选择当然就是评点。上述三种古文评点本奠定了评点的基本形式,它的确有助于后学沿着其指点揣摩原作者命意遣词的精微奥妙处。总括宋人的评点,约由三部分组成:卷前看文作文法;每篇前的总评;伴随行文的随处批语和重点句子的圈点。日后的小说评点大体承袭这种形式,小说评点置于篇前的“读法”,相当于看文作文法;回前评则相当于篇前总评;夹批、眉批、圈点就是行文的随处批语和圈点。当然,形式相似并不见得精神相同。古文评点形式在每个人具体运用的时候,并非都一致。评家所得深浅不一,不能强求相同。以最为周详的吕祖谦《古文关键》为例,卷前总括了四条“看文字法”:

第一看大概主张

第二看文势规模

第三看纲目关键 如何是主意首尾相应,如何是一篇铺叙次第,如何是抑扬开合处。

第四看警策句法 如何是缴结有力处,如何是融化屈折剪裁有力,如何是实体贴题目处。

吕祖谦在“看韩文法”下总结韩文特点云:“学韩文简古,不可不学他法度。”以韩愈《师说》作例,吕祖谦为此篇“总评”云:“此篇最是结得段段有力。中间三段自有三意说起,然大概意思相承都不失本意。”吕祖谦的行文随处评点亦颇贯彻他条分缕析的本旨。姑且以韩愈《师说》一段示例:

大意说两句。 人不可无师。

关锁好。人不可无师处应上是第二。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之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承接紧,有精神。 乎说 无此说

不精神

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结句处 缴 本意

承接得好

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⑤。

由此可知,宋代古文评点的特征有二。一是文本读解、品评的精细化,精细到甚至琐碎的程度。它们和士大夫在序跋、书信里论文偶然探讨大问题不同,清一色地是关于文本细微末节的条分缕析。二是文本精细分析的根本用意在于揣摩古人作文之法。所以,古文评点家总是以作文带动看文,看懂古人文法精妙的目的是日后能师其法而作文,评家一付“写作学”的手眼。这种写作学的眼光与文学欣赏说到底还是有区别的。文学欣赏亦需要有文本的细致品评做基础,但文学欣赏不停止于文本的细致品评,由此还涉及人生体验、审美趣味等更深层次的问题。宋代古文评点家对字法、句法、句子语义的连接无不抱有极大的热情。如谢枋得评韩愈《后二十九日复上宰相书》首段:“这一段连下九个‘皆已’字,变化七样句法。字有多少,句有长短,文有顺逆,起伏钝挫如层澜惊涛怒波。读者但见其精神,不见其重叠,此章法句法也。”⑥韩愈此文九个单句连用“皆已”,颇似句式排比,起层递加强语气的作用,令评家激赏不已。盖为拈出此类句法可以令后学找到揣摩模仿的门径。晚明小说评点学在某种程度上,依然留有宋代古文评点的写作学视角的痕迹。

评点作为一种批评形式,既是一种评者表示文本细读心得的形式,因此亦有可能被评者用于诗歌、小说笔记等方面。这种倾向在宋代就有,现今传下来的南宋词人刘辰翁评点本《世说新语》就是明证。如该书有:“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憔悴,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

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刘辰翁在“见此芒芒”后批云：“似痴、似懒、似多、似少，转使柔情易断，非丈夫语，然非我辈未易能言。”<sup>⑦</sup>总的看来，他的《世说新语》批点比较简略，文本分析较少，对人物、语言发感慨，说心得，下针砭的取向明显。虽是批点，但品味、用语大似诗话。属批点中的雅士风格一类。据记载，刘辰翁因宋亡不仕，除批点《世说》外，还弄过不少诗文批点，上至老庄，下至杜甫、苏轼、陆游，皆有批点。<sup>⑧</sup>后来明人如李贽、金圣叹批点圣人经典、小说、戏曲，其文笔训练留有古文、时文批点专注文本的痕迹，但批点的宗旨更多是承接刘辰翁批点《世说》的“雅好”。

明代高举古文旗帜的有唐顺之、茅坤等人的“唐宋派”。他们继承宋代文人的做法，选取前代文可以为法者成集加以评点，刻印刊行。明代此类文集中影响较大者有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评点体例远比吕祖谦《古文关键》来得简单。有论例总评八家文，每家集前有简评其人其文，而每篇前亦有简评，以文意为主。但没有行文随处批点。《四库提要》云：“今观是集大抵亦为举业而设。所评论疏舛尤不可枚举。”<sup>⑨</sup>对此作评价不高。明代归有光有一部归评《史记》，以不同颜色、大小的圈点标示对《史记》文脉要紧处和遣词造句的妙处。贬之者或谓狼圈密点，不堪卒读，但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则视为学文的秘传。姚鼐说：“震川阅本《史记》，于学文最为有益，圈点启发人意，有愈于解说者矣。”<sup>⑩</sup>归有光细读《史记》文本的心得，其《评点〈史记〉意例》可以作证：

事迹错综处太史公叙得来如大塘上打纤，千船万船不相妨碍。晓得文章撮头千绪万端，文字就可做了。作文如画，全要界画。

《史记》只实实说去，要紧处多跌荡，跌荡处多要紧。亦有跌荡处不在气脉上，故不用黄圈点，虽跌荡处不是放肆。以细读文本而论，归有光在明代诸古文家

中所得最深。他继承宋代文人专注辨识行文细微处，以小处所得的积累来启示后学作风。总之，明人的古文批点，在宋人的细致工夫处很难再出新意，评价不及宋人。唯独归有光别具手眼，寻出《史记》加以圈点，做出光大古文评点的另一番业绩。

明代以八股取士，而八股是比经义格式更严格周密的文体。编集、批点、讲解、刊行八股文，在明清相当盛行。当时八股评选充斥书市，从流传下来的《小题正鹄》、《八股举隅》、《闾墨秘籍》、《时墨写真》一类八股文集及其批点，可以推想当时的盛况。士子长久接受八股的训练，社会受八股风气薰习，晚明的小说批点不免受其影响。章学诚说：“时文体卑而法密。”<sup>⑪</sup>“体卑”云云，当指时文只能用于博取仕途功名的敲门砖；而“法密”指时文本形式严谨，文体慎密。在诸文体中，前人比时文为诗中之律诗，就是这个意思。八股文取义于四书五经，题目不能越出四书五经文字的范围，而且以朱熹注释为释义标准。文字的口气要模仿圣人，这就是代圣人立言。在这样的前提下按照一定的格式引申发挥、组织文字而成文章。由于明清士人长期浸淫于八股文的写作训练，对八股文的这种特质掌握得非常透彻，他们常常会将之运用于小说、传奇的写作，运用于文学作品的文体读解——如小说、传奇的评点。这种技巧运用于写作即产生八股文在文艺审美方面的影响，运用于评点即产生它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 二

综合上述关于宋代古文、经义教育和明代古文、时文训练的论述，可以看出它们与晚明小说评点兴起的关系。第一，小说评点的形式基本上是从古文批点借用过来的。虽然古文批点与后起的小说评点在详略和批评角度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纯粹从外在形式看，评点的体制已经大备于宋代古文批点。这种形式行之有效，

是批者细阅原文示人心得的最佳方式。其“理”相同，其“法”当然可以借用。所以，批点不独可以用于古文、小说，举凡其它一切文体，诗歌、杂剧、传奇、八股，无不运用。第二，古文、经义教育，尤其是八股文的训练，养成了一套“时文手眼”的批评习惯，它的思想方法与使用术语，在小说评点里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因为，无论是批点古文、从事时文讲解，还是后来评点小说、传奇，都是同一批文人所为。尽管见识趣味不同，但接受的教养、训练的背景是一样的。传奇小说与古文时文虽属不同文体，但生长于相同的文化背景，其中的审美趣味必有超越文体差异而相互贯通之处。正是这些相互贯通之处，使得评点家的“时文手眼”施于新兴文体时同样能够言之成理。当我们看到评点的形式和“时文手眼”的批评习惯对小说评点不同份量的时候，应当注意到，形式的借用毕竟是外在的，批评习惯的影响才是更为内在而深刻的。

客观地看待八股文，不得不如章学诚那样承认它“法密”。试图从文脉语气、句子组织、遣词造句等细微末节处推求普遍意义的“法”，这是诗文评的共通现象。明八股文大行其道以后，诗文评求“法”的呼声更加强烈。前、后七子与唐宋派莫不如此。虽然他们师法的古人各不同，但求“法”之心如出一辙。金圣叹等人在小说、戏曲评点中也屡言“法”，将它们比之《左传》、《史记》等正宗文体，以“法度精严”赞之。当然，此“法”不同彼“法”。但这种现象不得不使我们追溯到八股文的影响。时文“法密”，只有对其文体各种各样的“法”烂熟于心，才能符合其要求。从时文“法”的训练中，士人养成了辨识行文形式技巧的习惯。这对文本意识的育成有正面影响。

谈到“时文手眼”与小说评点的关系，首先应当注意它有助于育成和提高小说评点中的文本意识。金圣叹编选、批点过多部时文选集，可惜没有流传下来，我们不能具体探求他如何解说时文之“法”，以

及由这种解说探讨他文本意识的成因。但有一个流传故事，讲到他对时文如何烂熟，以致用此法开玩笑：

吴门金解元圣叹，善批小说性滑稽，喜诙谐。自言人生，惟新婚及入泮二者为最乐。然妻不能屡娶，无如何。入泮，屡黜屡试也。每遇岁试，或以俚辞入诗文，或于卷尾作小诗，讥刺试官。辄被黜，复更名入泮。如是者数矣。司训者恶之，促令面课，命作《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文。金于后比起曰：“禽兽不可以教谕，即教谕亦禽兽也。”对曰：“禽兽不可以训导，即训导亦禽兽也。”学博见之，亦无如何。

#### ⑫

时文之法与小说传奇之法不同，但时文特有的“法密”及其训练，对评点家的文本意识当有助益。

“时文手眼”不但在比较抽象的文本意识方面影响小说评点，造成评点重视研讨文本的倾向，而且评点在思想方法、术语运用方面也可以看出时文的痕迹。八股讲究破题，一篇文章全从破题铺陈而来。评点家亦由此养成看一篇文章时常根据题与文相互揣测来理解的习惯。金批《西厢记》“前候”一出，讲了一段他解文的逻辑思路：

凡作文必有题，题也者，文之所由出也。乃我亦尝取题而熟睹之矣，见其中间全无有文。夫题之中间全无有文，而彼天下能文之人，都从何处得文者耶？……题有其前，则有其后，则有其中间。抑不宁惟是而已也，且有其前之前，且有其后之后。且有其前之后，而尚非中间，而犹为中间之前。且有其后之前，而既非中间，而已为中间之后。此真不可以不致察也。诚察题之有前，有察其有前前，而于是焉先写其前前，夫然后写其前，夫然后写其几几欲至中间，而犹为中间之前，夫然后始写其中间。至于其后，亦复如是。而后信题固蹙，而吾文乃甚舒长也。题固急，

而吾文乃甚迂迟也。题固直，而吾文乃甚委折也。题固竭，而吾文乃甚悠扬也。<sup>⑬</sup>这纯粹是相题作文的八股文那一套。只要有题，不愁作不出文字。一篇文字的意思，亦当从题目去推求它。金批杜诗就特地指出杜甫是“妙于制题”的人<sup>⑭</sup>，而解《水浒传》和《西厢记》的题旨，也都有以题解文、以文求题的倾向。例如，金氏认为《西厢记》所以名“西厢”，是因为张生与莺莺之事发生于西厢。推因缘之极致，乃因崔相国营建别院，遂有西厢，为西厢月下之事挽弓逗缘。而老夫人念禽犊之恩，开春院让千金小姐逗弄春色，是老夫人不慎之因缘。所以，金圣叹批语极赞莺莺是知书守礼的佳人，而张生则是有情的才子，反对淫荡男女的说法。金圣叹对《西厢记》题旨的推论，纯粹是“时文手眼”<sup>⑮</sup>，有合理的地方，也有牵强附会之处。

由于时文“法密”，有一套专门分析它的术语。这些术语经常被评点家借用来分析所评点的文体，最常见的就是起承转合。假如破题是“起”，承题、起讲、入题就是“承”，四比八股就是“转”，而收结就是“合”。但其它文体在布局上未必具有时文的这种特点。而借用起承转合分析其它文体时，亦未必具有八股文起承转合的那种意思，只是指文章结构的完整性。所以，借用得是否合理，要看具体的情形，不能抽象判断。起承转合作为文本分析的术语，它代表评价作品时的一种眼光，这就是结构布局的完整性标准。在这方面，时文术语的影响当然是正面的。但评点家的这付“时文手眼”，用于分析具体作品，也很可能造成故作解人的情况。金圣叹评点杜诗，可取之处不多。这与他过分强调杜诗如时文，一律用起承转合解之有关。他说：“诗与文，虽是两样体，却是一样法。一样法者，起承转合也。除起承转合，更无文法；除起承转合，亦更无诗法也。学作文，必从破题起，学作诗，亦必从第一二句起。从第一二句起，方谓之诗，为其有起承转合也。不见人学作文，却先作中二比也。”<sup>⑯</sup>无论诗还是文，都要讲究

布局完整，这是对的。但完整的布局却未必就是起承转合式的布局。从这个角度看，养成“时文手眼”的批评习惯，这对评点学的影响有正面的，也有消极的，我们必须谨慎分析。

评点，纯粹是一种批评形式。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上，虽然它被运用于诗、文、八股文、传奇、小说等多种文体，但真正影响大、产生有份量批评成果的，还是当它被用于批评小说、传奇的时候。所以，尽管宋代评点形式的发展比较完备，而真正能够发扬光大做出业绩的，还是明清之际。评点的形式源远流长，它在历史中受着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发生着变化。各种因素的影响，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明代官方考试文体八股文的作用。小说、传奇的评点在分析、术语方面都留下了时文训练的痕迹；文人才子讲究时文绵密的“文法”，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评点家批点小说、传奇时的“文学自觉”。

①《崇古文诀》四库《提要》云：“世所传诵，惟吕祖谦《古文关键》、谢枋得《文章轨范》及访此书而已。”（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版第1354册第2页）宋代流传下来的古文评点还有真德秀的《文章正宗》。真德秀本除文之外还有诗歌，分辞令、议论、叙事、诗歌四门，唯评点简略，不及上述三本。

②⑤《古文关键》之《提要》，见上述全书第1351册第715、718—720页。

③⑥王守仁《文章轨范序》，见上述全书第11359册第543、545页。

④姚瑶《崇古文诀序》，见上述全书第1354册第2页。

⑦刘辰翁评点《世说新语》，见黄霖、韩同文编《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⑧同注第⑦，第77—79页。

⑨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之四库《提要》，见上述全书第1383册第12、15页。

⑩姚鼐《答徐季雅书》，见《惜抱轩全集》之《惜抱尺牍》。

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章学诚《文史



# 多论古代笔记中的训诂

□陈焕良

我国古代的笔记中保存着丰富的训诂资料,其中既保存了先秦两汉的古训,也阐明了许多词语的新义以及近代的方言俗语,是训诂学中有待进一步开发的新领域。

## 一、古代笔记要籍简介

为了充分地发掘和利用古代笔记中丰富的训诂资料,必须对历代的笔记有个大致的了解。

“笔记”也叫“杂识”、“杂记”、“笔谈”、“笔录”、“礼记”、“随笔”等,历代史书中记载书目的《艺文志》、《经籍志》常把它归于“小说”类。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又把“小说”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类。清乾隆中,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将“小说家类”分为“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三派。胡应麟所说的“志怪”和“传奇”,后来发展为文艺创作的“小说”;而“杂录”、“丛谈”,“辨订”等就是现在一般所说

的“笔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分三类中的“叙述杂事”和“缀辑琐语”也可以说是“笔记”,而“记录异闻”亦即“志怪”。今人刘知秋《历代笔记概述》把从魏晋到明清的笔记分为三大类:其一、小说故事;其二、历史琐闻;其三、考据辨证。这三类笔记中,与训诂关系最为密切的是第三类。下面简介其中若干要籍。

考据、辨证类的笔记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最早的一部就是后汉班固所撰的《白虎通义》,一名《白虎通德论》,简称《白虎通》。此书虽为讲说五经而作,但与一般的经传注疏不同,它对于了解古代的政教制度乃至古代的词语很有帮助。稍后有应劭所撰的《风俗通义》,应氏沿袭班氏《白虎通义》的体例,分门别类地论述事物,把训诂与考订辨证地结合起来。作者自序曰:“谓之《风俗通义》者,言通于流俗之过谬,而事该于义理也。”应劭的《汉官仪》、蔡邕的《独断》也属于这一类的著作。

魏晋南北朝主要有晋崔豹所撰《古今

通义新编·论课蒙学文法》第300页。

⑫采蘅子《虫鸣漫录》,见《历代小说笔记选》清代部分之第四册,广东人民出版社版,第895页。

⑬金圣叹批《西厢记》三之一:“前候”,见《品书四绝》,湖北矢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94-95页。

⑭金圣叹谓杜诗之题大有讲究,有“以诗补题者”,有“以题补诗者”;有“诗全非题者”,有“题全非诗者”。见《才子杜诗觥》卷一,《登袞州城楼》诗总批,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

⑮陈万益也订为八股文对金圣叹评点有启发作用:“金圣叹文学批评方法受八股文启示的地方,可以约为最重要的两点:就是对题目的重视和起承转合的要求。”见《金圣叹的文学批评考述》,《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资料汇编》之《金圣叹及其文学批评》,台北天一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页。

⑯金圣叹《示顾祖頌等人书》,见《鱼庭闻贯》,收在《金圣叹批选唐诗六百首》,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作者林岗,深圳大学中国文化传播系(518060) 责任编辑:陶原珂

注)、或题为《古今杂志》、《古今杂记》,共分舆服、郡邑、音乐、鸟兽、鱼虫、草木、杂注、问答、释义八类,是以考证名物制度为主的。

唐代得首推封演所撰《封氏闻见记》,今本十卷,前六卷记叙掌故、考证名物,以考证的部分为最有价值。其次苏鹗所撰《苏氏演义》,原书十卷,今本仅存二卷,系清人辑自《永乐大典》。这是一部考究经传、订正名物、解释语词、辨证讹谬的笔记。另外有李匡人所撰《资暇集》,旧本题李济翁撰,乃因宋人避赵匡胤之讳,故以李匡人之字署名。本书分三卷:上卷多纠正俗说之谬;中卷多论述事物的原由,可借以探索语源;下卷多述物品,皆有益于考据。

宋代以《容斋随笔》和《困学纪闻》最为显著。《容斋随笔》,洪迈撰。计《随笔》、《续随笔》、《三笔》、《四笔》各十六卷,《五笔》十卷,共七十四卷,兼载经史典故、诸子百家之言以及诗文语词等等,于解释语词、考证名物之中足见其详明之至。王应麟所撰《困学纪闻》二十卷,是一部读书杂记,计有讲解经书的八卷,谈论天道地理和诸子的二卷,考订史实的六卷,评论传文的三卷。杂识一卷。其中不乏训诂所需资料。其他讲求文字训诂,内容较为充实的,还有王观国所撰《学林》。此书专门考辨六经史传以及他书文字之形音义,罗列众说,参校异同,加以订正,附及语词,兼释名物。

元代以考辨为主的笔记不多,值得重视的有《敬斋古今注》,李治撰,《元史》及本书旧题误作李治。书名取“黄注充耳,所以塞聪”之义,表示专心著述,贯穿古今,不为外物所扰。“黄注”为塞耳之具。《元史》本传等误题书名作《古今难》。此书于考辨古籍,疏通文字,多所可取。

明代以杨慎的撰述为最多,其中著名的有《谭苑醍醐》八卷。作者原序曰:“醍醐者,炼酥之禁昌。佛氏借以喻性也,吾借之以名吾谭苑也。夫从乳出酪,从酪出酥,从生酥出熟酥,从熟酥出醍醐,犹之精义以入神,非一蹴之力也。”序言说明书名寓意,明其谈说之有味,乃经反复提炼而成。

有清一代,考据成风,因而考辨类的笔记,数量之多为往古所不及。其中有顾炎武历时 30 多年的笔记《日知录》,卷帙宏大,内容广博,是一部价值较高的考证笔记,历来很受重视。又有赵翼的《陔馀丛考》,内容之广不在《日知录》之下。又有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以其关于经义和文字、训诂、音韵等方面的内容最为可取。此外,桂馥的《礼朴》,其着重通过文字训诂来解说经义,考证名物部分也很有价值。

## 二、古代笔记的训诂内容

古代笔记的训诂内容,涉及面很广,各书各有所侧重,难以一概而论。但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关于经典歧义的注释。我国传统训诂学其主要目的是为经学服务的。因此解释经义便成为训诂的主要内容,它不但集中表现在注疏体式的训诂中,而且也反映到笔记体式的训诂中来。古代笔记不象注疏类一样系统地全面地解释某一经典,而是解释某一经典中的有关语句,时有新解,与原有的注疏每有歧义。兹举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与《孟子》有关的二例如下:

“被袵衣”,朱氏章句训“袵”为画,钱塘梁侍讲同书尝告予云:“古书,‘袵’训‘单’又训‘同’,皆无盛服之意。《三国志·魏文帝纪》注有云:‘舜承尧禅,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此必用《孟子》之文,‘袵衣’当是‘珍裘’也”。(卷三“袵衣”条)

《孟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检”当依《汉书·食货志》作“敛”。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自农而外工商贾皆不耕而食,则必巢粟以通之。而岁有丰歉,谷有贵贱,则不能无伤农夫之患,于是有发敛之法。丰岁则敛之于官,凶岁则巢之于民,记所谓虽遇凶旱水溢民无菜色者,用此道也。‘狗彘食人食’,犹言乐岁粒米狼戾耳。惠王不修发敛之制,丰岁

任其狼戾，一遇凶歉，食廩空虚，不得已为移民之计，自以为尽心，惑矣！（卷三“检”条）

上举二例，都是《孟子》中有歧义的语句，历来有不同的解释，钱氏所记，可聊备一说。

其次，关于名物典制的考证。名物有异同，典制有沿革，古代笔记所及者甚多。例如：

唐卢氏《杂说》：“文宗问宰臣：‘条脱是何物？’宰臣未对。上曰：‘《真诰》言安妃有金玉条脱为臂饰，即今钏也。’又《真诰》：‘萼绿华赠羊叔金条脱各一枚。’”余案，周处《风土记》曰：“仲夏造百索系臂，又有条达等组织杂物，以相赠遗。”唐徐坚撰《初学记》，引古诗云：“绕臂双条达”。然则条达之为钏必矣，第以达为脱，不知又何谓也。徐坚所引古诗，乃后汉繁钦《定情篇》云：“何以致契阔，绕腕双跳脱。”但跳脱二字不同。（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三“条脱为臂饰”）

据此可知，后世的钏，前代叫条脱，字也作“条达”、“跳脱”，名异物同。

刘熙《释名》曰：“过所，至关津以示之。”张晏注《汉书》“关传”云：“传，信也。若今过所。”过所者，今之行路文引也。（杨慎《谭苑醍醐》卷七）

据此可知，同是过关的通行证，汉代以前叫“传”，汉时叫“过所”，明代叫“行路文引”，简称“路引”。

《南史·阮长之传》：“宋以前，郡邑官田禄，以芒种为断。芒种前去官者，则一年禄悉归后人。至元嘉末，始改此科，计月分禄。”是按月分俸，自宋元嘉末始也。然《封氏闻见记》：“准例替人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取田米，高利自濠州改楚州，欲以米让前人，乃到处淹泊。候过数日始到。士论称之，”则唐制又不按月也。或此取田米又是俸外所得，另有一例耳。（赵翼《陔馀丛考》卷二七“按月分俸”）

《北史》：“崔浩定律令：妇人当刑而有

孕者，许产后百日乃决。”后世孕妇缓刑始此。《魏书》：“北海王元愉以谋逆诛，将并诛其孕妾李氏。崔光奏曰：‘李今怀妊，例待分产。乞停李狱，以俟孕育。’帝从之。”此浩定律后事也。然《汉刑法志》：“景帝诏孕而未乳当鞠系者，皆颂系之。”又《王莽传》：“莽子宇以血洒莽门，发觉饮药死。宇妻怀子系狱，须产子乃杀。”千宝《晋书》：“毋邱俭起兵被诛，其孙女适刘氏，以孕系廷尉。”则孕妇迟刑，本汉魏之制。岂元魏时此律已废，至浩而又著为令欤。（赵翼《陔馀丛考》卷二七“孕妇缓刑”）

以上二条皆与古代的典章制度有关，分别考证“按月分俸”、“孕妇缓刑”的起始

复次，关于方言俗语的研究。历代笔记尤其是宋明以来的笔记，都注重方言俗语的研究，有的对方言俗语进行解释，有的用方言俗语来印证文献中的古语，有的刻意探索方言俗语的源流。例如：

江西俚俗骂人，有曰客作儿。案：陈从易《寄荔枝与盛参政诗》云：“樱桃真小子，龙眼是凡姿，橄榄为下辈，枇杷客作儿。”盛问其说，云：“樱桃味酸，小子也。龙眼无文采，凡姿也。橄榄初涩后甘，下辈也。枇杷核大肉少，客作儿也。凡客作儿者，佣夫也。”（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俗骂客作”）这是对江西俚俗骂人的话“客作儿”进行解释的。

《庄子》云：“程生马。”尝观《文字注》：“秦人谓豹曰程。”予至延州，人至今谓虎为豹“程”，盖言“虫”也。方言如此，抑亦旧俗如此。（沈括《梦溪笔谈》）

沈括根据他所接触到的方言解释了《庄子》中这个“程”字，为后来的注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前代注家对它并无确定的解释。

世俗以小食为点心，不知所始。按吴曾《能改斋漫录》云：“唐郑倓为江淮留后，家人备夫人晨饌。夫人顾其弟曰：‘治妆未毕，我未及餐，尔且可点心。’其弟举甌已罄，俄而女仆请饭库钥匙，备夫人点心。倓诘

曰：“适已点心，今何得又请。”是唐时已有此语也。亦见《辍耕录》。又《癸辛杂识》记，南宋赵温叔丞相善啖，阜陵闻之曰：“朕欲作小点心相请。”乃设具饮玉海至六七，又啖笼炊百枚。（赵翼《陔馀丛考》卷四三“点心”）

这一条考证俗语“点心”的由来，材料非常丰富。同书卷四三“成语”条胪列世俗称引成语 200 条，亦皆有所自。

今人谓牝驴为草驴，《北齐书·杨愔传》：“选人鲁漫汉在元子里坊骑秃尾草驴。”是北齐时已有此语。山东河北人谓牝猫为女猫。《隋书·外戚独孤陀传》：“猫女可来无住宫中。”是隋时已有此语。（顾炎武《日知录》卷三二“草驴女猫”）

顾氏同书同卷中还有“草马”、“雌雄牝牡”二条，可与上例参阅，从中可以看到古今对动物性别的称呼之异同，方言俗语的称说从古籍中可找到其源流。又“月半”条云：“今人谓十五为月半，盖古经已有之。《仪礼·士丧礼》：‘月半不殷奠。’《礼记·祭义》‘朔月月半，君巡牲。’”皆其例也。洪迈《容斋随笔》卷三“俗语有所本”也可为证。

### 三、笔记体式的训诂特点

古代笔记中的训诂与随文释义的注疏以及通释语义的专著等其他体式相比起来，有它自己的特点，其不足之处又是比较明显的。因此在运用古代笔记中的训诂资料时，必须根据其特点加以认真的分析，以便更好地发挥古代笔记的作用。

运用散文笔法，可读性较强，这是笔记体式的训诂一个突出的特点。“笔记”一词原本就指与辞赋等文体相对而言的散文，与其他体式的训诂相比，笔记体式的训诂更具有散文笔法，加之文字短小精悍，可读性较强。例如洪迈《容斋续笔》卷一五“注书难”一则谈到：

注书至难，虽孔安国、马融、郑康成、王弼之解经，杜元凯之解《左传》，颜师古之注

《汉书》，亦不能无失。王荆公《诗新经》“八月剥枣。”解云：“‘剥’者，剥其皮而进之，所以养老也。”毛公本注云：“剥，击也。”陆德明音“（剥）普卜反。”公皆不用。后从蒋山郊步至民家，问其翁安在？曰：“去扑枣。”始悟前非。即具奏乞除去十三字，故今本无之。

这一则把议论和记叙有机地结合起来，其用讲故事的形式来达到训诂的目的，较之直接说明文学的通假，更为通俗易懂，令人过目不忘。

利用目验材料，可信度较高，这是笔记体式的训诂另一突出的特点。古代笔记的作者，尤其是宋明时期的人，比较注重利用身经目验的材料来证成词义，例如前面提到的沈括根据他接触到的方言解释了《庄子》中的“程”字，王安石根据亲身经历改正了原来对《诗经》“八月剥枣”的误解，都是实例。又如宋人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二云：

余昔知安州，见荆湘人家多以草竹为卜。《楚辞》云：“索琼茅以筮兮，命灵氛为余占之。”其注曰：“琼茅，灵草。筮，小破竹。楚人名结草折竹而卜曰筮”。盖因遗俗之旧也。

·庞元英以目验材料论证王逸注之成义，使其可信度更高。

资料分散，不便检索，这是笔记体式的训诂不足之处。古代笔记中的中诂资料虽然丰富，但它们都是散见于各书之中，于各书之中所占的比例殊不相同，加之各书的分类、编目也不一致，有的据编目可获查检线索，有的则需披览全文之后方能“沙里淘金”。

随时记录，不加诠次，这是笔记体式的训诂又一缺憾，古代笔记多为作者研读之时偶有所得、所疑、所思、旋即记录，积日成帖。正如顾炎武自述《日知录》之所由来：“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由于这类笔记大都是随时记录，因此缺乏严密的体例，因而也就不成系统，内容难免芜杂。这一点可以洪迈

《容斋随笔》为代表,洪氏自序云:“予老去习懒,读书不多,意之所之,随即记录,因其后先,无复涂次,故目之曰‘随笔’。”

互相抄袭,陈陈相因,这是各类笔记的通病,即使是与训诂关系较为密切的杂考笔记亦在难免,同一个材料,同时出现于几种笔记之中,例如前面提到的《谭苑醍醐》“过所”一则与《容斋四笔》“过所”一则,详略不同而已。《陔馀丛考》“点心”一则,亦见《能改斋漫录》、《辍耕录》等书。不同书对同一材料的引用,有时文字完全雷同,有时互有抵牾,引用书证,又往往只凭记忆,不查原文,或者任意删改原文,不合作者原意。因此引用笔记中的训诂资料必须加以鉴别,去伪存真,于其中的引证,必须查对原文,避免以讹传讹。

#### 四、充分挖掘古代笔记中的训诂资源

古代笔记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通病,但它们的价值是不容抹煞的,其所积累的训诂资料非常丰富,有的直接为训诂专著提供了依据,为所征引。例如《古今注》卷上“都邑”类的“杨沟”一条:

长安御沟,谓之杨沟,谓植高杨于其上也。一曰羊沟,谓羊喜抵触垣墙,故为沟以隔之,故曰羊沟也。

这里的“杨沟”、“羊沟”两说,即为《辞源》和《辞海》所引用。又《辞源》、《辞海》“过所”一词都引用了《容斋随笔》的材料。

杂考笔记中的训诂,于解说经史、考证名物方面,每有独到的见解,有的可与训诂专书加以参照,有的则可纠正其非,例如《谭苑醍醐》卷六“四载”一条,不墨守《说文》等成说,以为“四载”即“行涂以楯,行险以撮,行山乘橐,行沙乘轨。”言之成理。而《礼朴》卷二“温经”的“贯三人耳”一条,根

据《司马法》的“小罪,聃”和《说文解字》的“聃,军法以矢贯耳也”的解释,指出“贯耳是一种军法。”纠正了孔颖达疏《左传·僖公二十七年》“鞭七人,贯三人耳”两句,以“耳”为助词的错误。

杂考笔记中的训诂,于研究古代的汉语词汇,比较古今词义的异同,探索方俗词语的源流,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例如《陔馀丛考》卷三六、三七、三八、四二,可资参考者多,仅举卷三十“舅”一则:

舅之称有三。《尔雅》“母之昆弟为舅”《秦风》所谓“我送舅氏”是也。妻父曰外舅。《孟子》注“谓我舅者,吾谓之甥”是也。夫之父曰舅。《礼记》所谓“舅姑”,《尔雅》所谓“姑舅在,则称君舅君姑,没则曰先舅先姑”是也。后人呼妻兄弟曰舅,本非古法。《尔雅》谓妻之昆弟为甥,刘熙《释名》谓之外甥。是今之所谓舅,正古之所谓甥,乃俗呼正相反。盖妻之昆弟,方谓我之子为甥,而我呼妻之兄弟亦为甥,本无差别,故从乎己之子之称以尊之耳。《唐书·朱延寿传》:“延寿为杨行密妻弟。行密以其私附朱全忠,乃诳其妻曰:‘我丧明,诸子幼,得来代,我无忧矣。’及至,乃杀之。”《通鉴》则云:“军府事当悉授三舅。”胡三省注云:“延寿第三,呼妻之兄弟为舅,始见于此。”则五代时已有此称也。

古代笔记积累了丰富的训诂资料,只可惜还没有认真地进行整理。如果能够对古代笔记中的训诂资料作一次全面的收集,然后用科学的方法分类排比,以便检索,那么它在汉语研究中的作用将是难以估量的。

作者陈焕良,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510275)

责任编辑:童 轩

# 雷达的文学批评初探

□ 邝邦洪

雷达是新时期涌现出来的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他先后出版了《小说艺术探胜》、《文学的青春》、《蜕变与新潮》、《传统的创作》、《民族灵魂的重铸》和《文学活着》等多部文论集。其中《文学活着》被列入由陈荒煤和冯牧主编的文学评论家丛书。这几部文论集,体现了雷达文学批评的鲜明特色,体现了他为当代文学批评作出的突出贡献。

雷达的文学批评注重从现实出发,切入具体的文学作品,发表独到的见解。在雷达的文学批评中,有不少评论是针对单篇作品而写的。雷达写这类评论文章,对作品研究得既全面又深入,评论涉及到作品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篇章结构、语言

艺术等等。他通过对具体作品的评价和分析,挖掘作家作品新的创意。例如在《一卷当代农村风俗画——略论〈芙蓉镇〉》中,他切入作品实际,对作品的社会风俗画、人物性格世界、结构艺术等,都作出了具体而准确的评价,揭示出作品新的创意。他认为“作者把政治风俗化,把风俗政治化的生动描写,……为他的人物造成了一种典型而又独特的环境,一个便于人物活动其间的氛围和舞台。”在具体分析胡玉音、秦书田、谷燕山的性格特征的基础上,他指出作者善于在矛盾的漩涡里写人,在风俗画中写人,在黑与白、笑和泪的尖锐对比中写人,在悲剧、正剧、喜剧的交错中写人,在人与物的辩证关系中写人。他还指出,作者善于通过人生的真谛,表现人生的正义和道德力量。他认为《芙蓉镇》的艺术结构,继承了我国传统现实主义的特色,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还有《对精神文明的呼唤——简谈〈爬满青藤的木屋〉》、《性格的力量——谈〈风吹唢呐声〉的人物描写》、《英雄雕像群——〈高山下的花环〉人物赞》、《悲壮之美——谈〈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等,都是切入到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写的评论,这类评论文章,往往能寻找到作品的独创性,表现出他对历史与现实、人生与艺术的理解与思考,能给作者、研究者和读者以启发。

雷达的文学批评还善于“由此及彼”,即由具体的作品分析而联想到与之相关的现实文艺问题,引导作家和读者通过具体作品思考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使文学评论发挥更大作用。例如,雷达在评论叶文玲的《心香》时,由评论《心香》哑女的形象美、心灵美,又由此论及美学问题。雷达概括道:“虽然马克思提出‘按照美的法则改造世界’,但多少年来,我们对美的法则的研究,对生活美的发现,对艺术美的创造,却总是被冷落着,遗忘着。其实,不是冷落,是忌讳,不是遗忘,是疑惧。”雷达接着愤怒地指控“四人帮”手提“阶段斗争”的尚方宝剑,专以杀伐毁坏生活美、艺术美为能事,以至十年浩劫,整个社会来了个美

与丑的大颠倒、大混乱。作为评论家的雷达,又以敏锐的目光,细心地发现“作家们开始注意到从美与丑的特定角度,去观察人、研究人、描写人了。”雷达把叶文玲的《心香》欣喜地评论为“打开了‘一扇生命的窗子’(罗丹语)”,“使读者耳目为之一新”,把读者的“视线和思路更多地引向了如何认识美、分辨美和对待美了。”最后,雷达热切地希望“作家们更多地雕塑出真实的、在善与恶的斗争中诞生的美的灵魂,以之去美化、净化人们的心灵,陶冶人们的感情,提高人们的道德情操和审美能力。”

此外,雷达还从评论《人生》中高加林的形象,分析造成高加林悲剧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由此论及马克思美学中的悲剧观。他还从评论《河的子孙》、《鲁班的子孙》,论及文学作品的思想深度问题。他认为,文学创造必须反对无冲突论,必须真正把蕴藏在生活内部的本质性矛盾挖掘出来,并给予生动准确的描绘和正确的评论,才能写出文学作品的思想深度。雷达还从评论《红点颏儿》的语言谈及文学语言问题。这样“由此及彼”地进行文学批评,不仅有助于创作与理论、批评与理论的结合互长,而且有利于提高读者的审美理论修养和鉴赏能力。

雷达的文学批评还注意创作思潮的宏观研究,以促进新时期文学创作。例如,他对乡土文学的思考是比较深入的。乡土文学在我国文坛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现象,已形成一大流派,拥有大量的作家和丰富的作品。但对乡土文学的研讨较薄弱。到底什么是乡土文学,这并没有明确的界说。雷达在《关于乡土文学的通信》中,从鲁迅、沈从文、叶紫、赵树理、周立波、柳青、马峰、西戎、孙犁等作家作品开始思考,并参照鲁迅、茅盾关于乡土文学的论述,对乡土文学作出这样的界定:“一、指描写农村生活的,而这农村又必定是养育过作家的那一片乡土的作品。二、作者笔下的这一片乡土,必定是有它与其它地域不同的、独特的社会习尚、风土人情、山川景物之类。三、作者笔下的这片乡土又是与整个时代、

社会紧密地联系着,……包含着丰富广泛的时代内容。”雷达的这一高度概括,对于读者理解乡土文学,对于研究者研究乡土文学,都具有启迪意义。又如,他的《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新时期文学主潮论纲》对新时期初期表现农民、妇女和知识分子的作品如《李顺大造屋》、《未亡人》、《银杏树》、《爱是不能忘记的》、《人到中年》、《布礼》、《灵与肉》等作品作了分析,对作家探索民族灵魂、民族心理、民族性格的具体人物形象进行剖析、评价,从而指出这一阶段文学探索的缺憾和局限的三个方面:第一,基本停留在对已被鲁迅发现过的“国民性”特征的重新发现和认同上。这种“重新发现”虽有续接传统、贯通主潮、开拓新路的重要意义,但其思想高度并没有超越鲁迅早期对“国民性”的认识水准。第二,这个阶段民族灵魂的发现还是处在传统观念制约下的发现,它所依据的社会理想和价值尺度比较陈旧。第三,单一化和静止化倾向(指形象塑造)。雷达的这一分析评价,对作家和研究者来说,是很有启发性的。回想当年,当这些作品一问世时,人们的评价相当高,对它的缺陷和局限缺少理论性的评论。如今雷达作出有理有据的概括分析与评价,不仅有助于探索反映民族生活、民族性格和民族灵魂的文学创作的发展,而且也有助于促进文艺思想和理论的活跃和发展。另外,《文学史并非观念史》、《关于小说创作的若干思考》、《从生存相到生活化——九十年代初期的小说潮流》等,都是从宏观的角度对文学创作思潮中的嬗变和演进、利弊和得失,进行思考和辨析的,他所运用的批评模式主要是历史的美学的批评模式。他探讨的这些命题,对促进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是很有意义的。

雷达的文学批评不搞“新名词大轰炸”,特别注重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由于雷达有较深的文艺理论修养,有丰富的文学历史知识,因此,他在开展评论时,能够旁证博引,提出比较全面而深刻的见解。尤其是他对一个作家的整体评论,对错综复杂的文艺现象作多侧面的考察,都

注意紧扣评论对象,深入分析,以事实与理论为根据,论证自己的观点。我们从他的《论汪曾祺的小说》、《邓友梅的市井小说》、《论任大星的小说创作》、《论“红高粱家族”的艺术独创性》、《论王朔现象》等评论文章,都可以看出雷达注意从整体把握作家和作品的本质,进行有理有据地分析评价,让人心服口服。对一些有争议的作家作品,他关于论辩、以理服人的特点更突出。例如《论王朔现象》,他指出有的人认为王朔的小说是“流氓文学”、“无赖文学”,把王朔的小说贬得很低。而他却认为,“王朔现象是一个崭新的文学现象是最具特定时代性的产物。王朔小说的社会认识意义远远超越了他小说本身的价值。他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视角和一种最新的社会心态,应该说,主要不是其小说艺术性使他成功了,而是他小说中人物的生存境遇、生活态度和精神特征使他成功了。”为了让你信服他所得出的结论,他具体分析了王朔小说为什么拥有大量读者的原因,分析了王朔小说中顽主群像和顽主世界,让你相信“当代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尚不为人知的世界,一些尚不为人深知的年轻生命,以及尚不为人所知的秩序。”当然,雷达也毫不客气地指出王朔创作中的弱点:“一是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王朔几乎无例外地缺乏独立的人格意识。这种态度已经遮蔽了他的视线,不但女性形象重复,而且很难打破原先的模式深化下去。二是他的顽主世界的封闭性,“哥儿们”的面孔、语汇、行为模式很相似,同样缺乏各自的人格独特性和差异性,这也在影响他作品的广度。”这种批评也是相当准确和中肯的。同样,当雷达指出评论对象的不足时,更注意细致的分析,以理服人。例如在《军营改革者的雄姿——中篇小说〈第三代开天人〉的得与失》中,雷达在评论它的得失时,就较具体地分

析了作品在艺术构思,情节进展和人物关系处理上的落套,指出描写改革者的作品不应重复“轻车熟路”,而应该寻求新的途径、新的角度,开拓出新艺术境界。

从雷达的文学批评中,我们还可以深深地感到,雷达在满腔热情地培育青年作家和业余作者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鲁迅曾经指出:“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华盖集·并非闲话(三)》)。作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家,是应当担负起“剪除恶草”和“灌溉佳花”的任务的。雷达对作家作品的评论,有剪除恶草的,但更多的还是灌溉佳花。从他的《小说艺术探胜》到《文学活着》来看,他是新时期评论新作家、新作品最多的文学批评家之一。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细读老中青作家和业余作者的大量作品,进行追踪评论,满腔热情地肯定作家们的创作成果。近年来,他的文学批评转向了长篇小说,对《白鹿原》、《废都》、《古船》、《少年天子》、《平凡的世界》、《战争和人》、《中国知青梦》等长篇小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写出了有影响的评论文章。

雷达在《文学活着》的后记中曾说:“文学批评是极重要的,它是文学的思想引擎和美学光亮,没有文学批评的文学,就像没有阳光的天气,是闷暗而缺乏光彩的。”我以为,雷达的文学批评,在发现新人力作,推动文学思潮的健康发展,熏陶人们的审美情趣,提高人的道德情操,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让文学沐浴着阳光。从他出版的多部文论集来看,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文学批评家,他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作者邝邦洪,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510631)

责任编辑:陶原珂



## 21 世纪南中国教育发展畅想

□冯增俊

“南中国”常常被等同于英语的 South China,但目前所指已不再仅仅为华南地区,而有更广泛的含义。尤其是在走向 21 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南中国”一词日益超出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更多地被赋予经济、文化及政治上的特征。根据这些变化,我们认为“南中国”包含了三个层次的内涵。第一层次为核心层,由广东省珠江三角洲、香港、澳门、台湾四大区域构成;第二层次为中观层,由全广东省、广西沿海、海南东部沿海及福建和香港、澳门、台湾等区域构成;第三层次为宏观层或称大南中国,由广东、广西、海南和福建、浙江到上海等长江以南沿海和台湾、香港、澳门等区域构成。这里,核心区域是由珠江三角洲、香港、澳门和台湾四地为主体的,本文的论述也主要以此为基础。

从华南向“南中国”概念的演变,是由这一区域经济和发展的独特现象所决定的。首先,自鸦片战争以来,这一区域就成为中国乃至东亚和亚太区域发展和变革的一个焦点,尤其是二战后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也使其成为亚太乃至世界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引人注目的区域。其次,该区域虽属中国领土,但分属四种不同的政体,是一个集中了多种政治、经济力量的交汇点。该区域不仅四种政治力量活动频繁,而且在世纪之交将要终结殖民统治,实现香港和澳门的主权回归,令举世瞩目。再次,该区域具有面对东南亚乃至世界华人,又背靠中国内地为后盾;市场广阔,发展潜力无穷,为商家必争之地。因此,自 60 年代以来,该区域经济发展迅速,尤其是在 80 年代中国推行改革开放后,该区域经济增长更为迅速,随着香港、澳门主权回归和内地与台湾实现“三通”,将使该区域呈现出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

21 世纪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发展机

遇,也将使南中国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使其间冲突与融合、竞争与合作、消亡与发展并存,各种发展契机将纷至沓来,但也会稍纵即逝。如主权回归将为合作提供更广阔的前景,但又极有可能因政体的更易而使其与国外的联系产生新的不协调。一方面,经济会加速增长,另一方面却又会由于这种跃进而引发政体上、文化上更加深刻的裂变和不适应。其中,南中国教育领域的适应与发展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 一、政体多轨但教育将日趋一体化。

21 世纪,尽管港澳回归,四地同属中国,但仍将各自为政,对立、磨擦还会出现。然而,在南中国新一轮发展中,教育将呈现较大的互助合作势头,趋向一体化发展。这种一体化发展不是用某一标准来统一教育制度或体系,更不是合四为一。其核心主要表现为: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经济推动下,诱发各方发展优势,激发互动点,使之加强合作定位,寻求共同的发展。一是各方都呈现出发展势头,有共同的发展要求,呈现出相互促进之势;二是各方教育在走向 21 世纪的发展启动下,将形成某种互动的内在联系点及推进态势;三是形成某种推进本区域教育共同目标。

教育一体化发展在南中国已初露端倪,表现出很好的前景,但各地差异仍然明显,港台的现代教育意识要自觉些,教育的经济与社会作用也较为成熟;而珠江三角洲办教育的热情很高,但科学办教育仍有待加强;澳门教育发展如何与经济进一步结合,仍将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大问题。促进教育改革,使之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是推进南中国教育走向一体化发展的关键一环。

### 二、教育发展成为区域发展主旋律。

在 21 世纪,“发展”将成为南中国未来

教育突出的主旋律,以配合区域经济和社会的演进。这种教育发展表现出质与量两个方面。在质量上,该区域的教育体系在日趋合理的同时,教育质量也在不断提高,并将涌现出许多名校,成为群英汇集之地。另一方面,在经济迅速发展的推动下,南中国教育将呈现出规模的更大扩张。尽管四地的扩张点及其方向有很大差异,但发展即教育的总量增加,将仍然是最重要的特征。扩张的重点是高等教育,如台湾目前正在扩张现有院校规模,同时规划扩建 10 多所高校,使高校在学生有较大提高,并使学校布局更加合理,香港高校扩张速度不会过快,但在整体上仍有较大增长。21 世纪初,该区域适龄青年入学率将逐步达到 30% 左右。

由于 21 世纪将是该区域再次汇集人才的新时期,人口增加将促进基础教育总量膨胀,使基础教育呈现较快的增长,普及义务教育仍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另外,私立教育也将有较大发展。目前台湾私立教育体系较完善,正努力提高质量。香港、广东、澳门私立高校的发展也已逐步启动。据专家预言,广东私立高校是未来教育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终身教育体系则将实现转型升级,使各种教育体制合轨共行,尤其是继续教育将成为南中国走向未来教育发展中的重头戏,成为提高在职人员水平,促进该区域成为“亚太发展极”的有力因素。

### 三、教育目的各异,但体制将趋于互动。

在四地政体不变的格局下,各地教育仍将按各自原有的发展逻辑在演进,其教育目的和总体目标仍将抱定原有的宗旨,很难想见有全面的趋同。但是,在教育体制上会呈现出较明显的共同发展趋势。一是学制将趋于统一,其中最大事莫过于在香港争论了半个多世纪的本科将实现“三改四”,即统一四年制本科。届时,这一区域将实行六岁儿童统一入学;在小学六年制的基础上,四地将会努力推进小学五年制,初中四年制以及高中三年制;即“五、四、三制”;大专教育在多样化前提下,四年制本科将趋于统一。二是在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制度方面将以不同形式达致对等性协议,而在高中教育后的文

凭水平、专科水平以及专业型、学术型文凭的对待问题将达致必要的共识。在这一情况下,香港的学历政策将有一定程度放松,但认可学历、甄别就业的原则不会改变,并且将为粤、澳、台等地所采用。这将极大地促进该区域的教育改革。三是四地教育体系将在相互借鉴的基础上形成更加严密的教育系统,并相互渗透,如内地的自学考试制度、师资培训制度对香港、澳门、台湾的辐射,香港、澳门、台湾的研究生教育体制对珠江三角洲也会产生重大影响。

四、教育将从游离状态走向合作,并成为区域合作的带头因素。

从目前南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内地与香港的经济联系不断加深并日益紧密结合,但是教育上的合作还不很多,现有的合作相当程度上仍处于小型、分散和自发性的状态。在 21 世纪强大的发展主题下,南中国教育将走出这种“独家门庭”的心态,合作互动将成为主旋律,并成为支持经济合作发展的重要力量。教育的这种合作的最重要表现是:(1)各地教育将在发展和互利的前提下,相互借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如香港英语教学与内地的中文教学、香港的应用研究与内地的基础研究的合作和借鉴,在教育研究方法上定性定量、思辩与实证的相互融合等;(2)形成统一规划、分工合作、优势互补的人才培训机制,香港在人才规划上的经验将对内地产生积极影响,并有望在南中国区域内形成一定的培养分工,尤其是不同人才模式、教育模式的交流配合将使南中国教育呈现新的生机。

五、将共同面对“普九”后的教育质量问题的挑战,解决世纪性的教育难题。

普及九年以上义务教育,加上高等教育的大幅度发展后,如何使以往选拔精英型教育转向面对全体学生发展的教育,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尤其是提高以往那些从小学就被清除出学校的所谓“差等生”或“问题儿童”的教育质量,并使他们成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在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香港、台湾“普九”较早,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探索。随着珠江三角洲及澳门的教

育在世纪末的普及,这一难题也已来临。联手通力合作,这是南中国策应 21 世纪挑战的重大举措。香港自 80 年代以来推行的“目标本位课程”、“解决第五组别学生教育问题策略”以及目前提出的“优质学校教育”等措施,都体现了为解决这一重大问题所做出的努力。

21 世纪将为南中国带来很大的发展机遇,极大地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从而从根本上缓和高考竞争的压力,为所有希望进入高级学校学习者提供多样化的机会,解决“争分夺位”的问题,为真正推行素质教育和全面发展教育奠定基础。同时,这一区域就业制度将更加成熟,现代教育观念有了新的提高,也将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前提条件。届时,分数不再是评价学生能否升学的唯一凭证,而将成为一种关键性的发展评测,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测评和分数已不再成为限制学生发展的指标,而是全面开发学生智能和促进健康发展以及培养特色的依据。由于单一的或纯粹的分数型高考已消失,任何类型发展的学生都有可能得到相应的培养或深造的机会。届时,一个健全的教育体系和健康的教育群体将在南中国出现。

#### 六、意识形态教育与德育趋于相通。

21 世纪的南中国教育,意识形态相对立的状态将会继续存在,但是这并不妨碍学校公民与道德教育趋于相通和交流合作。一是都会重视学校德育,努力探讨新世纪公民与道德教育的主题;二是积极合作寻求解决青少年犯罪日益严重的问题,探讨德育对提高教育质量的一系列对策;三是逐步建立相应的机构,以协调四地的德育工作,尤其是消除引发青少年犯罪的各种社会问题,对该区域的历史转变进行必要的探讨,提出科学的防范措施。德育是当代世界发展的重要主题,把握历史条件下德育的转变和特点,是建造南中国教育时代的重大举措。

#### 七、方言纷呈而教育语言将趋于统一。

教育语言一直是南中国尤其是粤港澳三地较突出的教育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香港的英文与中文、澳门的葡文与中文问

题,其次是方言与普通话问题。以往在教育语言上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教育语言被作为政治问题,无视学生发展,否认了教育规律,导致学生语言能力的普遍下降;二是教育语言的作用被经济现象所掩盖,商业语言引导教育语言,因此使该区域教育语言错综复杂。21 世纪,南中国将为教育语言的研究和统一创造良好条件。这种统一不仅是时代要求,也是南中国各方共同发展的迫切需要。教育语言的统一将呈现出下列特点:(1)在认可汉语并以汉语为主导下形成多样化教育语言。承认汉语作为教育语言为主体,根据地区需要发展英语、葡语等多种教育语言,将有效地促进大多数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在这里,尽管部分学校可能是以英文、葡文为主,但整个区域教育语言以中文为主体,也不影响本地方言(如广州话)广泛流行,而普通话则会得到广泛的认同和使用。(2)香港和澳门多元教育语言的经验将在解除政治色彩倾向后,为各地所广泛采纳,双语教育将成为南中国教育的一大特色。(3)多元语言教育将走出政治或经济的角逐场,从中发掘出多元语言教育对学生发展所具有的内在重要功能,只有到那时,多元化教育语言才会真正显示出在中文背景下对中国教育发展的重要意义和特有的作用。

#### 主要参考文献:

- 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报》。  
卢乃桂《教育与发展》,香港《教育学报》第 21 期。  
黄显华编著《强迫普及学校教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黄显华、戴希立主编《香港教育——迈向 2000 年》,香港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  
香港教育工作者联合会《全面发展香港教育的长远策略》,香港《香港教育》1997 年第 4 期。  
冯增俊等主编《珠江三角洲教育现代化研究丛书》,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作者冯增俊,华南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教授(510631)  
责任编辑:陶原珂

# 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繁荣社会科学研究

## ——“邓小平理论旗帜与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综述

□本刊记者 哲 生

为了密切联系社会科学战线的实际,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于最近邀请了社会科学界部分专家学者,围绕“邓小平理论旗帜与社会科学工作”这个主题,举行了座谈会。张磊、张江明、曾牧野、梁钊、吴群策、梁渭雄、李恒瑞、范英、吴奕新等出席了座谈会。会上发言热烈,畅所欲言。现将座谈会上的一些发言综述于后。

**张江明教授:**要开创社科工作新局面,一定要高举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新阶段的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贯彻十五大精神及其提出的“两个一”和“两个三”。所谓“两个一”,一个是学风问题,必须坚持和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学风。还有一个是研究中心问题。“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这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途径。所谓“两个三”,是指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三个着眼点和三个重要意义。江泽民同志指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要着眼于“理论的运用”、“理论的思考”、理论的“新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体现。第二个“三”是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有三个重要意义,它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增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都是很重要的。这里说明,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不仅是社会科学部门的事,而且是全党的大事。开创社科工作新局面,必须充分发挥作为联系党政与社会科学界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按照十五大提出“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的精

神,社科联必须认真做好“为党和政府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发挥智囊团和思想库的作用。要牢牢抓住社会科学的主攻方向是研究、探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组织联合攻关,对“重点”、“难点”、“热点”、“疑点”问题的解决提出有价值的科研成果,供党政部门咨询、参考,在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中作出贡献。与此同时,党政也应加强对社科联的领导和支持,经常给社科联提出一些课题开展研究;有关会议吸收社科联参加或列席,以了解上级意图,更好执行和配合;在硬件和软件方面给社科联工作以更大帮助,提供更有利条件来开创新局面。我们还要从社会科学的全局和更高角度上考虑开创社科联工作新局面。在“联”字上下功夫,做好联系、联合、联动的工作,把上中下和纵横加以联结,尤其是把各个学会的联合工作做好,它们分布在党、政、经、文、科、群、教等部门,人才萃汇,把工作任务贯彻到各个学会中去,又把各学会的计划、课题、研究纳入社科联的总体规划之中,互相促进,利用学会的优势,联合攻关,是可以为开创新局面作出重要贡献的。

**梁渭雄研究员:**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这里说的“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当然包括社会科学事业和社会科学工作。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是社会科学工作的灵魂和首要任务。“十五大”报告又进一步指出:邓小平理论“是

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这里,更进一步揭示了邓小平理论与社会科学的内在关系,邓小平理论贯通和涵盖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同时,它又需要通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广东的社会科学工作,在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方面,是鲜明的、有成效的。十多年来,坚持不懈地开展了邓小平理论体系研究、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作用的研究、邓小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辩证法思想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社会主义产权制度改革研究、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特区研究和“一国两制”研究以及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的研究,等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是,与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要求,还存在着差距,其中最重要的还在于进一步贯彻落实作为邓小平理论的灵魂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问题。对于我们社会科学工作来说,也就是科学的认识路线问题,学风问题。我们广东社会科学界过去之所以取得一定的成绩,在若干领域的研究方面在全国首先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新的观点、新的成果,就是由于遵循了这样的认识路线,发扬了良好的学风。我们社会科学工作只有继续坚持和发扬这样的思想路线、认识路线,才能保持理论勇气,进一步去闯那些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盲区”、“难区”和“禁区”,为研究和解答党的十五大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作出新的贡献。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显示出社会科学对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对于增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能力的重大作用。

**吴群策教授:**十五大把高举邓小平理

论伟大旗帜作为主题,并要求我们把邓小平理论作为一门科学、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来对待,要求我们在学习和运用邓小平理论的时候,要努力领会它的精神实质,把握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一个好的学风。这就根本区别于过去一些本本主义者对先哲理论的所谓“高举”,那种“背诵语录”式的“高举”、“两个凡是”式的“高举”,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实际的学风,决不是真正的高举。

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正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基本职责,也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中能否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地在理论工作中做出新贡献的首要条件。

回顾近 20 年的历程,广东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自觉地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勇于分析新情况、探索解决新问题的新答案,因而能够在发展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等一些领域,取得一批有影响的理论成果。然而,我们仍然不应当低估长期以来本本主义的流毒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自身的影响。实际上,近年来我们一些理论观念的进步,诸如劳动力市场、按股分红、按生产要素分配等,多半是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取得广泛共识,而理论工作者才艰难地突破自己头脑中原有的本本框框予以认可的。难道我们不应当更加自觉地清理对本本作教条式理解的影响吗?

广东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新鲜经验。许多实际工作者本着“少说多做”的实干精神,不事张扬地开拓创新,打开了新局面。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理应深入实际,开展系统的调查研究,和实际工作者一道进行总结提炼,出一批和广东实践相称的理论成果。如果说前一段还有人顾忌“说多错多”,现在已经看得更清楚,广东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突破和创新,是完全符合十五大精神的,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就应当大胆地实践,大胆地进行理论总结。

**梁 钊教授:**社会科学工作的首要任

务,就是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始终不渝地用邓小平理论教育干部和群众,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此,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一定要强调以下三点:(1)深刻认识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历史地位。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明确写进党章,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是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精神支柱。在当代中国,只有这一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问题,使国家走向富强,民族走向振兴,人民走向富裕,社会走向文明进步!(2)深刻认识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对传统观点的重大突破。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丰富和发展扎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特别是扎根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邓小平理论才是真正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时候,我们特别要强调全面准确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统一性和一贯性。着力弄清邓小平理论对传统观点的重大突破:一是要彻底抛弃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传统观念,树立从中国国情出发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二是要彻底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观念,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三是彻底抛弃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四是要彻底抛弃把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传统观念和因此而带来的追求“一大二公”,社会主义必须纯之又纯的传统思想。树立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三个有利于”的正确思想。(3)学习邓小平理论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十五大对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问题十分强调。社会科学理论工作,一定要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于中心工作,注重于对科学理论的应用,注重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

的实践,新的发展,研究新情况,探索新问题。因循守旧,不深入实际,不深入群众,脱离实践,不做探索,搞照抄照搬,闭门造车,拼拼凑凑,习惯从马列的书本上寻章摘句,是没有意义,没有出路的,这是一种必须坚决摒弃的坏学风。

**曾牧野研究员:**要系统研究、宣传、贯彻邓小平理论,我认为对于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首要问题是要认识这一理论本身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也是这一理论的精髓;只有把握这一“基础”、“精髓”,才能真正领会、把握这一理论怎样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怎样成为民族振兴、国家发展的强大的精神支柱。这里我只从经济与经济学的角度,说明邓小平理论怎样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如下的一系列新观点、新决策,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1)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的新理论,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坚决摒弃“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确定全党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也是搞好社会主义建设的最根本的指导思想;(2)提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坚持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3)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昭示全党全国人民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提出“分三步走”的战略决策,逐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4)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的是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阐明要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5)提出改革旧体制、建立新体制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特别是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6)提出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实现现代化必须坚持对外开放,要大胆

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为我所用、为中国经济走向世界、推进经济国际化指明了方向；(7)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论断，为我国实现科技现代化、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装备改造国民经济、发挥科技人才作用开辟了广阔的场所；(8)提出在抓好经济工作的同时，要重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论断，为抓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科学文化教育指明了方向；(9)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需要的论断；(10)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解决香港回归问题，利用香港的诸多优势，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思想。

依据十五大精神，我认为在经济与经济学领域的如下一些重大课题，应该进行研究：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基本纲领的研究；调整与完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研究；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研究；国有企业改革与股份制；国有企业改革与股份合作制；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研究；关于完善分配结构的研究；关于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与健全、实施“再就业工程”的研究；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继续办好经济特区的研究；市场经济下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与完善的研究；加快政府机构调整、转变职能改革的研究；关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研究；等等。

**李恒瑞教授：**贯彻十五大精神，繁荣社会科学研究，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开创理论研究的新局面，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理论研究方面进一步解放思想，实现新的突破。邓小平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它的社会改革开放观。在邓小平社会改革开放观的指导下，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成就斐然。今天，我们要增创改革开放的新优势，不仅要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上增创新优势，而且要在改革开放的理论建设上增创新优势，要做“理论强省”，争取赶上“国家队”的水平。为此，我觉得社会科

学研究要重视以下三个方面的观念更新、理论创新：(一)在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上观念更新、理论创新。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相结合，是我党的前无古人的理论和实践创造，也是我国经济、社会的改革和开放的核心问题。从理论上说明为什么必须结合、能够结合，在实践上、理论上解决怎么样结合的问题，这是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也是改革开放的要害问题、关键问题。与此有关的具体理论问题有：(1)在“什么是公有制”的问题上解放思想。过去的公有制的结构和形式，是在否定市场经济的指导思想下形成的，因而对市场经济具有一种先天的“排他性”。现在，就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律、要求、状况来改革公有制，即坚持公有制，“重塑”公有制。为此，要变传统的公有制为现代公有制，即股份制的、混合兼容的、以公有资本控股的形式实现的公有制。当然，我们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而要创造出东方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2)关于按劳分配的理论问题。按劳分配首先是市场经济的原则，即等价交换的原则在分配领域中的体现；私有制下不可能得以实现，公有制下才有可能实现，所以这又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承认了这一点，才能进一步说明按劳的“劳”应当是什么，从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和市场经济这两个方面的统一上予以新的解释；才能进一步说明“按劳分配”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关系问题；才能进一步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共同富裕”的内涵及其实现途径、实现形式问题。(二)学习研究邓小平的新发展观，树立社会发展的新观念。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为指导，吸收西方发展理论研究的新成果，从中国实际出发，创立中国共产党人的新发展观。邓小平的发展观是协调持续的社会发展观，即横向上的协调发展，纵向上的持续发展。这种发展观的基本思路，可否这样概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为中心，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公正、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生态平衡五大要素的统一与同步，探索东方式的、社会

主义的“后发式”道路和模式。广东应当在研究和实践邓小平新发展观上,在探索中国式的“后发式”道路的问题上,也同样继续扮演“先行一步”的角色,作出新的贡献。(三)关于新时期道德建设,我想提出社会道德体系的“复合结构”这一问题。前面讲过,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的结合,形成社会经济基础的“复合结构”。经济基础结构上加入了一个新因素,即市场经济关系。作为经济生活的反映的社会道德结构,也相应发生着重大的变化。现在是两个系列的社会道德观念和原则;一个是社会主义道德,即反映公有制关系的道德;一个是市场经济道德,反映市场经济的交换关系的道德。道德是二重结构或曰“复合结构”的。过去是否定市场经济道德的,现在则要承认市场经济道德,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现在的问题,一是承认这种二重结构,不承认主义是毫无道理的。既然市场经济的道路是必然的、正确的选择,那么市场经济的道德原则、观念就是不能否定的,而是具有积极作用的。二是对这两个系列的道德观念道德原则的内涵作出正确的概括,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引出合理的结论。这是精神文明理论的基本建设项目,对我国的社会发展有着长远的意义。

**范英研究员:**广东是形成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发源地。从远一点来看,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关于改革开放的许多有益思路,从近一些来看,卓炯等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学术理论探索,珠三角及三个经济特区的丰富实践经验,毗邻香港、澳门而亟待解决的领土回归大计等等,对邓小平理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文明建设、一国两制及其整个构架的形成,都间接、直接地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可以说,近20年来,广东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既是邓小平理论指引的结果,而前述情况又是形成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发源地。认识这一点,对于认识邓小平理论与积极发展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无疑有着特殊性意义。别的不说,就以卓炯等经济学

家在六、七、八十年代积极地提出和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勇气和理论贡献而言,对邓小平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不就是一个很好的、积极作用的明证吗?当然,在六、七、八十年代积极地提出和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问题,不是吃香,而是吃苦,不会受到支持,而是受到压力。因为他们积极地言人所未言,讲人所未讲,被世俗看成是“离经叛道”的怪论。但在今天,他们积极地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所增添的夺目的光彩,以及他们在邓小平理论的伟大价值中所得到的应有的肯定,真正地显示了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不是在地位作用上可有可无、不关大局,也不是在逆境中自暴自弃、自生自灭,更不是没有脊梁骨,随波逐流、毫无建树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21世纪的挑战与机遇,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迫切需要;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各项事业的迫切需要;三、提高现代文明综合素质、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迫切需要。以崭新姿态来落实全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工作。我在《现代哲学》1995年第2期上,设想过一个较为系统的思路,这里不作重赘。总之,广东如果在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上抓住“积极”二字,并在“积极”二字上下功夫,肯定会有新的作为、新的发现、新的创意和新的贡献!

**陈家义教授:**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广东的社科界有以下几方面可继续努力:一、如何依据邓小平理论把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和设置经济特区先走一步的试验区的实践经验总结提升到理论的、带规律性的高度上来;二、如何根据邓小平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思路,探索香港回归之后粤港关系在各个方面的合作和发展;三、如何按照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主张,依据广东先行一步的实践,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精神文明建设理论。



# 香港回归后粤台关系展望研讨会综述

□庄伟光

广东省台湾事务办公室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香港回归后粤台关系展望研讨会”于1997年9月8日至10日在广东省顺德市委党校召开。会议共收到论文30余篇。来自广东省各地的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近百人,就香港回归后粤台关系等有关问题进行研讨。现就本次研讨会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 一、九七香港回归具有划时代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

(1)九七香港回归是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提出和制订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在香港的率先实践,对于澳门顺利回归,对于台湾的和平统一,圆满解决中国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具有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垂范作用;(2)九七香港回归是祖国统一大业的伟大胜利和民族振兴的具体体现,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增强了中华民族对祖国的向心力,增强了祖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极大地激发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情感;(3)九七香港回归是祖国和港澳台进一步繁荣发展、和平统一台湾的历史契机,进一步加强彼此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法律诸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4)九七香港回归有助于祖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法制文明建设,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总之,九七香港回归是我们伟大祖国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上的一件大事,其意义深远而重大。

## 二、香港回归后影响着台湾对祖国向

## 心力的主要因素

(1)政治和社会稳定是中国社会经济繁荣的基本条件,是香港继续繁荣发展、澳门顺利回归、台湾和平统一的新里程碑,是影响对祖国向心力的最基本因素,是提高台湾民众对祖国向心力的基础。稳定直接影响着台湾对祖国和平统一的信心。稳定压倒一切,是沟通海峡两岸人民的桥梁,是增强台湾对祖国向心力的根本保证;(2)经济繁荣与发展是影响台湾对祖国向心力的另一大因素,是根本的保证。海峡两岸逐步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相辅相成的无边界经济关系,将会透过九七香港回归这一历史契机,在各自经济繁荣中向更为健康的方向发展;(3)法治的健全与完善是提高台湾对祖国向心力,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一个极为重要因素,是增强台湾同胞对祖国信心的坚实保障。健全法治、清正廉洁、公而忘私、严于律己是中华民族认同的传统美德,以此中华民族认同感,透过九七香港回归,使祖国和平统一大业阔步向前迈进。

## 三、香港回归后粤台关系展望

(一)香港回归开拓了内地、港、台“两岸三边”关系的新格局,中央人民政府不仅重新规划了对港台政策,台湾当局也相应重新调整了对港政策,藉此来促进“两岸三边”关系的发展,逐步形成“中华经济圈”;(二)“两岸三边”关系的新形势为粤台关系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促进了粤台经济的进一步交流与融合,促进两岸“三通”的早日实现,使粤台文化交流步入新台阶;(三)香

港回归后应充分认识及利用粤台经济的互补性,取长补短,互利互惠,共同繁荣,不应以政治分歧来影响和干扰海峡两岸的经济合作,通过发展经济关系,促进政治的发展,进而创造条件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同时也要充分利用香港回归后在粤台经贸合作中的桥梁和中介作用,充分利用祖国庞大的市场,进一步加强和发展粤台经贸关系。因为香港九七回归后,香港在粤台关系中的投资中介地位是不可替代的,贸易中介地位不变,将继续保持香港的航空、航海转运中心地位不变;(四)如何进一步促进粤台各方面的关系:(1)了解和研究台湾当局对港和对内地的经贸政策;(2)大力改善台商投资内地的各项环境;(3)积极拓展吸引台资的渠道;(4)进一步加强对台的宣传工作;(5)继续发展以经贸为主的粤台各项交流合作活动;(6)加强港澳地区的对台工作;(7)充分利用香港回归的历史契机,进一步发挥香港在粤台关系中的中介地位和桥梁作用;(8)健全和完善法制,营造良好社会环境;(9)加强引导,优化投向,合理布局,把握市场的开放度;(10)对台商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11)加强有关方面的人才培养,培养造就出适应改革开放需要,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法制观念强,通晓国际惯例的管理队伍;(12)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促进粤台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 四、香港回归对台湾的影响

(一)香港回归中国在对台关系中的影响:(1)在国际上避免台湾问题的国际化,避免外来因素干涉台湾问题;(2)在对台关系上,寻求和平统一和发展的基本原则,加深中华民族对统一的认同感;(3)积极拓展粤台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4)加快两岸经贸交流的发展。(二)香港回归对台湾问题的影响:(1)对促进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和

祖国和平统一起到积极作用;(2)有利于激发台湾民众的民族感情,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3)带动了民族精神的振兴和民族智慧的焕发;(4)对台湾当局所推行的明统实独政策产生了严重的冲击;(5)给台湾妄图扩展“国际生存空间”,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分裂祖国活动予以迎头痛击;(6)唤醒民众的爱国心,给台湾民众的心灵予启迪和震荡;(7)给台湾未来的和平统一予示范、借鉴和鼓舞。(三)香港九七回归对台湾的示范作用:(1)经济稳定发展的示范作用;(2)与祖国内地紧密合作的示范作用;(3)“两岸直通”的示范作用;(4)高度自治的示范作用;(5)生活方式和水平保持不变的示范作用;(6)民主、自由不会失去的示范作用;(7)国际尊严不会失去的示范作用;(8)解除国际社会顾虑的示范作用;(9)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示范作用;(10)不怕风波的示范作用。

#### 五、今后广东省对台工作的设想

(1)坚持“一国两制”伟大科学构想的深入研究;(2)坚持纵横结合、虚实结合、重点和一般结合的调研工作,分工合作,进一步深化、提高调研质量,扩大调研队伍,并逐步加以法律规范化;(3)抓好调研成果跟踪的深化、反馈、转化及应用,真正地为对台工作提供服务;(4)汇集涉台科研成果,为对台工作提供参考。与此同时也必须更加明确和平统一大业这一对台工作的目标,加大粤台交流与合作的力度,及时总结对台胞宣传和介绍香港成功的经验。对台工作是一项综合工程,尚需我们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努力,甚至付出巨大的代价。

作者庄伟光,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中心副研究员(510620)

责任编辑:罗 苹

# 粤澳关系研究的跨世纪展望

## ——第十次粤澳关系研讨会综述

□ 谭湛明

1997年11月1日至2日,由澳门社会科学会和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共同举办的以“粤澳携手合作迈向廿一世纪——粤澳关系研讨十年的回顾与展望”为主题的第十次粤澳关系研讨会在澳门隆重举行。来自粤澳两地的专家、学者60多人欢聚一堂,对粤澳合作关系的发展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历史、法律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回顾和探讨,经过大会发言和相互交换意见,在不少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这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旨在总结过去、开拓未来的高层次学术研讨会。

### 一、对十年来粤澳关系研究发展历程的基本描述和评价。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10年来,“粤澳关系研讨会”组织开展有成效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积极带动和促进了两地学者对粤澳经济及其他关系的深入研究。培养了粤澳关系的研究队伍和提高了科研水平,促进了有关研究机构的建立,出版、推广了粤澳关系研究的书刊。发挥了理论先导的作用,为政府的决策、协调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见。对推动区域联系与合作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为我国1999年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此外,在研究方法上以及两地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这些成果与经验为今后继续加强两地理论界的合作,寻求新的突破以进一步深入研究澳门以及澳门同广东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促进两地发展特别是促进澳门平稳过渡以及回归后保持稳定与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理论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1)关于澳门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纠正了人们认识中有港无澳,忽视澳门的传统观念,为粤澳关系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2)深入探讨了粤澳关系的特殊性和重要性。(3)探讨了关于加强粤澳关系,实行两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问题。(4)探讨了扩展澳门同广东及其他省区合作的战略问题。

在实践方面,两地学者在历次粤澳关系研讨会上提出的一些具体的建议,对政府部门和企业界人士的决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建议主要有:关于粤澳两地大型基础设施协调与合作的建议,关于开发珠海横琴和修建横琴——路环大桥的建议,关于在横琴——路环河道两岸联合建设中西文化交汇主题公园的建议,关于建设一桥连三地的伶仃洋大桥的建议,关于加强珠海、澳门机场协调与合作的建议,关于建立民间智囊组织珠澳经济合作促进协会的建议,关于开发澳门深水港、发挥澳门自由港优势的建议,以及关于提高澳门的地位和作用、确保澳门平稳过渡的一些具体建议等等,都受到政府部门和社会的重视,并反映在政府的决策或有关企业家的投资决策中。此外,通过研讨会推动了两地学者对粤澳关系的研究和民间的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

### 二、关于粤澳关系研究进展中的存在问题

不少学者认为,10年来粤澳关系研究,虽然取得不少成果,但侧重于宏观方面的探讨,具操作意义的微观方面的论文很少。通过比较,存在着如下几方面的问题:1. 理论研讨的深度不够,广度不足,很多问题深入不下去。不少论文虽然揭示了粤澳合作的障碍、问题,但提不出切实可行的具体的解决措施,降低了论文建议的可行性。2. 在研究方法上由于受制于出境管理等因素,很多论文只停留在对二手资料的整理而作出一般性的宏观的探讨和推论,缺乏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务实地作微观的分析和论证。例如:过去研讨时均提出澳门可到珠海、江门等地投资食品工业等行业,却没有研讨澳门资金如何进入江门等地开办食品工业,因此宏观的建议难以被采用。又如研究广东如何利用澳门这一桥梁将产品打入欧洲及拉丁美洲市场的可行性报告等,都是具有相当大的实用价值的,而过去一直未见这方面的研究报告。3. 在研究领域方面,侧重于经济领域,对文化、历史、科技、教育、社会、法制

等领域的合作探讨比较少。4. 出席研讨会的老面孔多, 新人物少, 尤其是中青年学者较少。5. 对粤澳关系研究的经费投入不足。6. 组织上结构比较松散, 没有主攻方向和长远规划, 没有组织学者确立专门的研究课题等等。

另有学者指出: 每次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及会上的发言, 具突破性的仍不多, 尤其是针对某行业如何合作的论文、可行性报告等, 在全部提交的论文中所占比例较少。在研讨的广度上不够, 目前, 研究澳门与内地的合作仅仅停留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四个市, 而对澳门与珠三角东部地区的合作, 与粤北、粤东、粤西的合作研究得极少, 更谈不上对与桂、滇、黔、川合作的研究。

### 三、探寻跨世纪合作的研究路向

在研讨过程中, 与会代表普遍感到, 自目前起至 1999 年澳门回归祖国的后过渡期内, 粤澳关系研究正面临着迈向 21 世纪的挑战和机遇。与会代表在探寻建立粤澳关系研究的方法论路向时提出, 不仅要继续深入研究粤澳经济方面的合作, 还要广泛开展粤澳文化、教育、历史、科技、社会、法律等方面的研究合作; 不仅要从事理论上深入探讨合作的整合点, 还要从实践上拿出合作的可行性报告来; 不仅要探讨澳门与珠江三角洲相邻城市的合作, 还要探讨澳门与珠三角东部地区和粤北、粤东、粤西的合作, 探讨澳门与内地桂、滇、黔、川的合作等, 使之适应 1999 年澳门回归祖国后长期发展的需要。

具体来说, 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 应更进一步明确研讨的方向与目标, 包括理论上达到的目标与实践上达到的目标。理论上应当深入研讨粤澳关系和区域经济合作的特殊性, 为丰富和深化区域经济合作理论作出贡献。实践上则应使研讨的内容更具合理性与可行性。“粤澳经济合作关系”属典型的应用科学范畴, 研究课题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其对政府决策及实际工作的参考作用大小上。简而言之, 就是理论要深化, 内容要务实, 提出的建议具可操作性。

2. 制定研究课题要考虑时段性。粤澳关系及合作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 不同时期两地的合作要求和合作条件都不同。在后过渡期内表现了这样的特点: 一方面澳门同广东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另一方面, 澳门确

保平稳过渡而需要解决的经济、治安以及公务员本地化等问题十分紧迫。尤其在 1999 年澳门回归祖国后, 澳门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面对的任务是全面落实和巩固“一国两制”, 有效地实行澳人治澳、高度自治, 确保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 这样, 有关粤澳关系的课题就要根据上述两个阶段的条件和要求分别加以设定, 以回应现实和历史的需要。

3. 研究课题针对性要强。首先要克服“大香港小澳门”的轻视澳门的思想, 加强对澳门的宣传, 增强同澳门合作的意识。二是要针对澳门发展的现实需要和主客观条件提出研究课题, 不能搞大而空的论证。

4. 要扩大研究领域, 制定研究课题要有战略目光。研讨粤澳关系及其合作还必须看到澳门在全国及广东改革开放中的战略性地位而注意选题的战略性。结合上述的几项原则, 适度地、重点地注意题材的全局性、长远性和前瞻性, 扩大研究的范围。例如在区域合作上, 不要只局限于某个小区域的合作、近区域的合作, 还要扩展到大区域的合作; 在领域的合作上, 不要只局限于个别领域、个别行业的合作, 还要扩大到其他领域、其他行业甚至社会整体的合作; 在合作的时间上, 不只是局限于中短期的合作, 也要有长远的合作, 要有发展战略的研究。这种研究, 可以以区域合作为主线, 也可以以领域合作或专项合作为主线。合作区域不限于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区, 凡是关系到澳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地区, 例如粤东地区、粤北地区、西江流域地区的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区的合作, 都可以而且应当开展研究。

5. 建议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内地特别是广东与澳门关系的研究, 进一步放宽内地专家、学者出境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等的审批手续, 以便使内地学者能更方便地对澳门开展实地调研, 掌握第一手的资料、数据, 拿出准确的、有份量的研究成果。

6. 要进一步建立和健全必要的研究机构(包括人员编制等), 要扩大研究合作的范围。除了现有的专业研究人员外, 还可广邀工商企业界的人士参予投资项目论证, 发展中青年研究力量的加入, 甚至还可请香港学术界的有识之士加入我们的研究行列, 将粤澳关系研究扩大到粤港澳关

# 关于经典的确立

——广东现代文学研究会学术研讨会纪要

□ 傅宗洪 唐正杰

随着世纪末的临近,回顾中国文学在20世纪的发展历程已成为文学史研究一个热点,其表现形态之一便是多种带总结性的文学选本的出现。但由于选家的文学史观念与审美标准的差异,各种选本对“经典”的认定也显出了某种程度的混乱。如何使这种评价接近历史的真实,这是1997年10月25日在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以“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选择原则和标准”为题召开的座谈会上,与会者共同关心的话题。

大家一致认为,以往的文学史研究与教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过于偏重“政治第一”的原则,用“革命”作为择取的标准。由此,在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上就出现了“拔高”与“贬抑”并存的非文学史观照的畸形状态。近些年来,一大批富有才华的中青年学者以其卓有成效的研究,对这一状态的改变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对标准与原则的把握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情绪化、随意化倾向。

中山大学金钦俊认为有两点首先应该明确的是:(1)不能将文学的功利性误解为文学应追求现实功利目的,甚至直接的政治效用;(2)不能将艺术的审美特性等同于唯美主义的追求。对“功利”与“审美”基本内涵的认识,是我们建立标准与原则的重要前提。文学往往并不是以“玩具”或“工具”的极端面目出现的,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广阔地带才是最适于文学发展的空间,因

为一切人生的常态以及由此引发的思虑几乎尽显于此。有了这样的观念校正,我们或许会少一些从“功利”与“审美”的极端角度入手看待文学。

在会上,不少学者对标准与原则的确立提出了具体的思路。

中山大学王剑丛认为:选择应从如下三个方面入手:看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看其在艺术上是否有创新,看其是否对社会有益。当然,这些标准具体用来衡量作家时,就显得复杂得多,因为这三条原则都很难量化。

暨南大学吴锡河认为:文学性、审美性和多样性应是确立择取原则的三个方面。所谓多样性,就是作家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思想与美学追求的复杂性,历史研究的选择取舍必须将之融入自己的视野。在评价作家时,不能仅仅根据某一部作品而忽略了其它作品。在标准问题,因人废文或因文废人,都不是一个严肃的文学史家应有的行为方式。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杨鼎川认为:任何文学史的构成都无法忽略同一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的重大事件对作家及其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现代文学史的构成尤其如此。因此,我们在讨论现代文学史作家作品的择取标准时,就应该考虑哪些是具有较大历史价值的文本。但是,这决不是择取工作的全部,甚至也不是其主要部分,因为,文学史毕竟不是社会发

系研究,使学术研究的范围更广,影响和作用更大。同时,在科研经费上增加必要的投入,最好是建立一个粤澳关系研究基金,通过各种渠道筹备充足的科研经费,使一些具有重大价值的研究课题得以顺

利完成,使每年一次的研讨会论文及其他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得以顺利出版和推广。

作者谭湛明,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助

展史的文学版。我们应该拥有一种超越社会历史评判的姿态,这种姿态具体而言便是对审美标准与文化含量的看重。以这双目光打量文学世界,我们才能确定真正意义上的“文本经典”。“文化含量”这一择取标准的提出,尤其引起与会者的兴趣。华南师范大学刘炎生认为:对政治功利问题,我们应持历史主义的态度。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中有不少是伴随着政治的风雨而穿行于历史空间的,因而,在考察这一历史现象的时候,持一种理性的历史主义态度成为重要。关于“标准”与“原则”,具体说来:(1)必须以史的眼光来择取和评价作家作品;(2)必须正确看待政治功利主义问题;(3)对作家作品的政治功利性不宜理解得过于狭小;(4)必以思想与艺术并重与统一作为择取原则;(5)反对单一化,重视多样化;(6)坚持实事求是的择取和评价态度。

与会学者还注意到标准与原则的相对性和多元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伍方斐认为:不要试图确立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应该允许从不同角度去考察历史,有所侧重才更可能有独立的见解。另外,从教学方面着眼,文学史应越写越薄;但如果从研究的角度着眼,文学史则应越写越厚——研究深化与细致化之后的厚。两极化的追求目标必然带来标准与原则确立的差异:前者注重省略与稳定,后者注重拓展与深入。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陶原珂认为:评价经典作品与评价经典作家,这是密切联系而又往往不能完全等同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讨论原则与标准的时候,应该考虑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关于文学作品的文化定位,似有必要从本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考虑问题,如“文化小说”之类的命

名,往往偏重于地域的、原生的文化色彩的作品,并未顾及本世纪中外文化交融的基本特色,容易引起对“文化的”的误解。

广东民族学院袁向东认为:经典的择取离不开一个时代的审美情趣,各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经典。标准的确立应有一个理论的支持,因为,文学史主要不是个人激情的倾诉,而是理性思考的展示。“拨乱反正”是需要理性背景的,但有的新文学史著作重排作家座次情况让我们惊叹的同时,却未能让我们看到这种判断不可或缺的背景。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傅宗洪认为:应该淡化“功利性”这一提法,因为,伟大的艺术时常伴随着伟大的“不纯洁性”,而渺小的艺术则时常表现出渺小的“纯洁性”,这是中外文学艺术史反复证明了的客观存在。因此,“纯”与“不纯”,不应该作为择取的标准。

与会学者企望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即把真正的文本经典称作“经典文本”,而把其余作品看作“背景文本”,数百年后,背景文本将逐渐从文学史中消失,或只作为文学背景存在,而经得起时间淘洗的经典文本则会更加显示其难以磨灭的光彩。

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还对标准与原则的确立作了多向度的探讨。如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唐正杰认为:以往的标准渗透着男性中心意识,这不利于对女作家的评价。必须看到,女作家是以一种不同于男作家的经验方式进行创作的,唯其如此,她们的创作就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经验世界,其成就是任何男性作家的创作都无法代替的。所以,重建的新标准应当是克服了性别偏见的尺度。

作者傅宗洪、唐正杰,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人文分院副教授、讲师(528000)

责任编辑:陶原珂

# 《学术研究》1997年1—12期总目录

(括弧内前一数字是期数,后一数字是页数)

## 学习贯彻十五大精神

认真学习 深刻领会

- 广东社科界学习十五大精神(笔谈)…………… (9.5)
- 广东青年社科界学习座谈十五大精神…………… 顾润清(9.13)
-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动摇
- 学习江泽民同志十五大报告的体会…………… 张江明(9.14)
-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增创国有企业新优势…………… 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体改办联合课题组(9.17)
- 联系实际学习邓小平理论
- 评《邓小平理论在广东》…………… 吴奕新(9.26)
- 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杨春贵(10.5)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高齐云(10.11)
- 改革发展新阶段与建设广东现代文明…………… 广东省精神文明研究中心课题组(10.14)
- 进一步解放思想 加快企业改革新步伐…………… 曾牧野 李新家(11.5)
- 改革发展的关键在提高效益…………… 梁 钊(11.8)
- 经济理论创新更需要大手笔…………… 刘开云(11.11)
-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的深刻论述…………… 黄永尧(12.9)
- 把握好股份合作制的内涵…………… 温志明 陈代余(12.12)

## 豪情迎九七 大笔写回归

南海珠还 神州同庆

- 广东社科界举行迎接香港回归祖国学习理论座谈会…………… (5.5)
- 爱国主义的伟大胜利(张磊) 扬眉吐气的伟大节日(曾牧野) 满怀豪情 信心十足(夏书章) 伟大的胜利(张江明) 铭记过去,放眼未来(李 羽) 庆香港回归,颂“一国两制”(施汉荣) 运用辩证法唯物论的光辉范例(刘 嵘) 欢庆香港回归,学好基本法(黎学玲) 香港回归后粤港经济合作新走向(雷 强) “九七”后香港与内地经济合作新特点(郑佩玉) “一国两制”得人心,香港经济全面好转(郑天祥) 香港回归的历史意义(李龙潜)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把握机遇(梁琼芳) 研究香港 借鉴香港(冯增俊) 百年的期待(饶芃子) 文化也要互补共荣(张 绰) 香港回归与文化共荣(张振金) 回归前后的香港语言生活(詹伯慧) 从香港即将回归想到的(桂诗春) 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回顾(邓开颂) 香港回归是一曲爱国主义的颂歌(刘泽生)
- “一国两制”的基本特点和历史意义…………… 吴奕新(6.7)
- 香港回归后加强粤港澳产业合作的思考…………… 廖建祥(6.12)
- 论粤港合作发展高科技产业…………… 何佳声(6.15)
- 爱国情怀与天朝观念
- 试析两次鸦片战争之间岭南知识界的文化心态与社会舆论…………… 赵春晨(6.19)
- 50年代以来的香港小说创作…………… 何 慧(6.24)
- 香港学校公民教育的发展与前瞻…………… 石礞平 张倩苇(6.28)

## 邓小平理论研究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 广东专家学者学习座谈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 陈家义(2.5)
- 邓小平南方谈话闪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辩证法的光辉
- 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5周年…………… 张江明(2.7)
- 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与实践唯物主义
- 论实践对于辩证法的首要地位…………… 吴启文(6.32)
- 坚持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统一
- 论邓小平理论的一个基本思想…………… 田 丰(6.39)
-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双重贡献…………… 王振海(6.45)
-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阔步迈向二十一世纪…………… 于幼军(8.5)

## 可持续发展研究

“可持续发展:一种新的文明观”

- 第六届全国各省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学术研讨会综述…………… 世 木(1.5)
- 发展与发展观
- 兼论可持续发展…………… 赵凤歧(2.11)
-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与市场理性的培育…………… 任建东(2.17)
- 可持续发展的哲学思考…………… 陈 春(8.47)
- 邓小平可持续发展观研究…………… 陈 述(8.51)
- 正确认识可持续发展的几个矛盾关系…………… 许公全(8.54)

## 经 济

交易费用、经济绩效与文化

- 西方法律与经济学理论评析…………… 聂德宗(1.8)
- 企业托管:制度创新与经济绩效…………… 甄荣军(1.14)
- 我国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变动趋势分析…………… 李善民(1.17)
- 公共产品生产的国际比较…………… 金小川(1.21)
- 社会主义:让更多的人受益受惠
- 读邓伟根博士《产权改革》…………… 周叔莲 徐林发(1.25)
- 国有外贸企业资本经营探析…………… 许经勇 徐清军 袁向阳(2.21)
- 战略选择权理论与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时机选择…………… 顾乃康(2.25)
- 论企业家技术创新的条件…………… 田贵庚 江小亚(2.29)
- 资本市场与中国经济发展…………… 苟文均(3.7)
- 马克思主义关于银行效益的思想初探…………… 曾国坚 何五星(3.11)
- 简谈国有企业经营者年薪制…………… 马壮昌 章云龙(3.15)
- 深圳市宝安区国有企业改革试点的实践与探索…………… 梁道行(3.19)
- 意大利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及其启示…………… 叶祥松(3.22)
- 高负债率下国有企业筹资问题研究…………… 谢林林(4.5)
- 合约的安排与合约的选择
- 张五常合约理论评介…………… 易宪容(4.8)
- 国际大都市信息化战略研讨述要…………… 锦 岩(4.13)
- 经济增长与知识转移…………… [澳大利亚]T·托平(4.15)



论中国商品市场的国际化趋势 .....	毛蕴诗(5.31)
西方劳资关系研究的基本问题 .....	周长城(5.35)
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政策选择 .....	陈广汉(5.39)
企业家:特殊的劳动力及其独特的价值内涵 .....	邓伟根 蒋盛辉(5.43)
论合作型企业员工关系的处理模式 .....	刘 昕(6.49)
对伪劣商品市场不合作博弈的解释及对策 .....	李新春(6.53)
论中国外贸宏观结构长期趋势与发展战略选择 .....	谢 康(6.57)
对公有制企业集体与个人关系的经济学思考 .....	阮恩光(7.8)
关于企业支薪制与分享制的比较研究 .....	江 涛(7.12)
马克思制度经济学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横向比较 .....	杨成长(7.15)
关于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的几点看法 .....	曾牧野 李新家(8.16)
从企业的角度考察劳动、市场与价格的关系 .....	郭兴瑞(8.21)
价格机制:劳动价值一元论的困境 .....	王则柯(8.25)
国有资产安全问题探析 .....	王 霞(8.28)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特征 .....	薛敬孝(8.32)
现代合约经济学的演进与发展 .....	易宪容(9.28)
对教育与经济学增长的一个交易费用经济学解释 .....	赖德胜(9.31)
西方跨国公司战略联盟与现代企业组织创新 .....	张志元(9.35)
试论企业技术联盟的特点和实质 .....	蔡 兵(9.39)
梯度推进的经济建设蓝图	
——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规划研究》 .....	张卓元 徐林发(9.42)
我国农地产权结构改革必须坚持渐进改革方式 .....	綦好东(10.24)
中国国债市场发展的功能与制度分析 .....	高 波(10.28)
论欧洲货币体系向欧洲货币联盟转变面临的问题和前景 .....	李 昶(10.32)
从东亚的崛起看政府干预经济的有效方式及其条件 .....	周 军(10.37)
求真务实 别具一格	
——评《现代经济理论实用读本》 .....	杨永华(10.41)
关于公有制市场经济均衡模型的构造 .....	李子江(11.15)
关于股份合作制企业产权关系的辨析 .....	潘嘉玮(11.18)
对卓炯在商品经济理论中运用一般与特殊辩证关系原理的探讨	
——卓炯经济思想研究之三 .....	何国文(11.21)
论信息高速公路与经济发展 .....	张 颖(11.24)
中外信息产业政策的比较研究 .....	梁俊兰(11.28)
顺德改革发展战略的经济学思考 .....	郑年胜(12.14)
论中国资本市场深化的宏观效应 .....	陈孝兵(12.20)
技术改造与集约经营 .....	陈学工(12.24)
从信息经济学论及市场激励机制	
——兼谈 1996 年诺贝尔学奖得主米尔利斯和维克里的贡献	
.....	陈拍顺(12.28)

### “思想道德文化建设与广东实践”征文

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伟大创造

——从南海市看农村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	吴赤锋(3.26)
----------------------------	-----------

加强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之我见 .....	陈政绍(3.30)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必须坚持“两个紧密结合”	
——佛山市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实践与思考 .....	姚军毅(4.17)
广州市道德建设的现实基础与发展要求 .....	李振连(4.20)
广东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思路和对策 .....	章海山(5.23)
社会主义义利观与广东社会发展 .....	黄明喜(5.27)
坚持“两手抓”,实现两个文明互相促进 .....	高齐云 曾德雄(7.18)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伦理道德建设的起点与目标 .....	李 萍(7.22)
社会开放与伦理抉择模式的转换	
——以广东为例的观察与分析 .....	任剑涛(7.26)
广东经济伦理发展的模式 .....	霍秀媚(7.29)
实施“文化南山”战略 创建现代文明城区 .....	黄锦奎 程 效(7.33)
阳江市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	蔡 龙(7.37)

## 哲 学

论人道主义道德原则在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的地位 .....	黄楠森(1.28)
从中西文化比较看超越“人类中心论”的可能性	
——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反思 .....	高秉江(1.32)
论青年的道德建设 .....	潘逸阳(2.33)
冯友兰对辩证法思想的反思 .....	张翼星(2.37)
以符号学析公孙龙子的《指物论》 .....	朱前鸿(2.40)
关于卢卡奇的自然——历史观问题 .....	翁寒松(3.32)
现代的召唤:走出伦理中心主义困境 .....	任剑涛(3.35)
试论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挑战 .....	刘超球(3.43)
生命意识的觉醒	
——杨王孙、叔本华之比较 .....	李珺平(4.27)
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对逻辑的冲击 .....	程仲棠(8.38)
论现象学方法论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 .....	[美]沃 野(8.43)
评徐复观对儒家道德政治理想的现代转进 .....	肖 滨(9.49)
扬雄《法言》的文化守成主义 .....	杨海文(9.54)
扬雄信道的思想特质 .....	雷健坤(9.58)
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 .....	范 英(11.31)
关于经济伦理若干问题的思考 .....	叶 蓬(11.36)
陈献章的道德范畴理论 .....	宋志明(11.40)
“人定胜天”是对荀子《天论》的误解 .....	雷庆翼(11.45)

## 法 学

行政诉权面临的若干问题及对策 .....	刘 恒(1.37)
改革开放与广东依法治省实践 .....	张富强(12.32)
现代企业信用的法律思考 .....	黎学玲 邢 翔(12.37)

### 纪念叶剑英 100 周年诞辰

坚持科学的领导艺术与领导方法

——学习《叶剑英选集》的一点体会 .....	张江明(4.34)
叶剑英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贡献 .....	张 焯(4.38)

## 历 史

论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的理想社会的异同 .....	臧世俊(1.42)
近代接受史学理论试说 .....	李洪岩(1.47)
“东南有天子气”释	
——秦汉区域社会文化史研究 .....	冷鹏飞(1.52)
从新发现的庚戌新军起义资料谈起 .....	黄大德(2.45)
政治权力与近代中日航运 .....	江道源(2.51)
汉学研究在瑞典 .....	[瑞典]罗多弼(3.47)
两汉时期的巴蜀文化与岭南文化 .....	李绪柏(3.50)
清末广西两次会党大起义的比较研究 .....	蒋 玲(3.56)
史学与史家	
——《史学新论》之二 .....	田昌五(4.43)
明代两广总督府的设立及对粤西的经略 .....	颜广文(4.52)
张之洞的清议及其作用 .....	钟康模(4.56)
中国口述史学漫谈 .....	钟少华(5.46)
司马迁师承孔安国说考辨 .....	陈桐生(5.52)
清前期广州的中英茶叶贸易 .....	杨仁飞(5.56)
纳粹德国为何对美国宣战 .....	蒋相泽(6.62)
从李之芳《赋役详稿》看清代赋税征课额的构成 .....	何 平(6.67)
东汉西北边疆政策述评 .....	高 荣(7.42)
19世纪30年代在华西人的中国人口观 .....	郭小东(7.46)
洪仁玕西学思想的再评价 .....	刘圣宜(7.52)
鸦片战争与台湾 .....	周文顺(7.57)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确立的地理基础与历史条件 .....	邓剑秋 张艳国(8.58)
近代城市发展的中国模式及其与美国城市化的比较 .....	于云汉(8.62)
“作爰田”注释新探 .....	屈友贤(8.67)
《辞源》、《辞海》、《汉语大词典》“女史”释例商榷 .....	郑之洪(8.70)
专家纵论：清代广东人口膨胀原因及其影响 .....	本刊记者 林有能(9.63)
家庭史学简况 .....	舒晓昀(9.68)
清末广东对外交涉体制之演变 .....	吴义雄(9.72)
陈、黄之湖南新政试析 .....	郑海麟(9.77)
广东历史上的农业开发(笔谈) .....	(10.44)
日本侵华期间的地图测绘 .....	朱竞梅(10.54)
浅谈宋代妇女的就业 .....	吴旭霞(10.59)
动态的历史过程与辩证的历史分析	
——以太平天国为中心 .....	郭世佑(11.51)
论汉代史学之新传统 .....	刘斯翰(11.56)
中国人对罗素思想的误解 .....	袁伟时(11.60)
浅谈民国政制史的研究状况及方向 .....	张 皓(11.65)
从族谱看珠江三角洲的宗族伦理与宗族制的特点 .....	叶显恩 韦庆远(12.41)

清代广东沿海地区会馆分布考 .....	刘正刚(12.47)
十年来有关南昌起义若干问题研究综述 .....	张晓冬(12.51)

### 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

香港回归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	郑群(12.55)
新的探索 新的建树	
《当代中华凝聚力》序 .....	张磊(12.57)
“一国两制”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	章权才(12.59)
增强凝聚力 克服离散力	
——香港回归后长期繁荣稳定的保证 .....	陈剑安(12.63)

### 岭南文化研究

释“粤” .....	何科根(1.76)
也论客家精神 .....	张应斌(2.80)
屈大均的儒学情结 .....	何天杰(8.73)
岭南佛教传播的轨迹 .....	黄木百权(8.78)
东夷文化与岭南民俗“封利是” .....	刘付靖(8.82)

### 文学·语言

试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	王元骧(1.58)
对汉语方言分区问题的再认识 .....	高然(1.62)
唐传奇与元杂剧相关作品的比较研究 .....	程国赋(2.71)
从陈澧《切韵考》论清浊看古今声调 .....	罗伟豪(2.76)
浪子词人柳永与正统君臣审美意识的冲突 .....	张海鸥(3.61)
黎明时分的三支响箭	
——论“五四”女作家的杂文、新诗和“问题小说” .....	钱红(3.66)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导论”读后放言 .....	黎乔桂(3.71)
略论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 .....	曾毅平(4.70)
根同株异竞映辉	
——司马攻与黄孟文微型小说比较 .....	赵朕(4.73)
论旅游的美学本质 .....	许宗元(4.76)
试论新历史小说的比喻结构与动机 .....	林明(5.62)
接受美学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 .....	樊宝英(5.67)
社会语用问题 .....	何自然(6.72)
论李商隐诗化情境的生成方式 .....	熊国华(6.77)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诗文融合传统 .....	郭杰(7.69)
顾城后期诗歌艺术形式分析 .....	伍方斐(7.74)
广东客家方言研究之我见 .....	詹伯慧(7.79)
林语堂和鲁迅“国民性探讨”比较论 .....	朱双一(8.87)
鹰之歌：黄国彬散文艺术漫笔 .....	袁良骏(8.91)
论方玉润《诗经原始》的政治教化思想 .....	边家珍(8.95)
论苏轼的文人品格与诗风 .....	马茂军(9.83)
冰心·丁玲·张爱玲	

——“五四”女性神话的终结 .....	姚玳玫(9.88)
略论东南亚华人语言的研究 .....	李如龙(9.93)
中国农民的法律心理:一种本土化的解释 .....	戴健林(9.97)
西方古典美学“理想”范畴的研究 .....	王强东(10.73)
“题歌赋诗以会意为功”	
——试论王绩的佛学思想及其文学实践 .....	张海沙(10.79)
改革尝试与学派的追求	
——评劳承万教授主编的《文艺学美学丛书》 .....	申家仁(10.84)
说“最”	
——最、最之分合及其与聚、撮之关系 .....	姚炳祺(10.88)
再论我国“文学的自觉时代”	
——“宋齐说”质疑 .....	李文初(11.74)
也谈南北文化之划分及老庄的文化归属 .....	刘绍瑾(10.80)
明清之际小说评点考论 .....	林 岗(12.67)
刍论古代笔记中的训诂 .....	陈焕良(12.72)
雷达的文学批评初探 .....	邝邦洪(12.77)

## 教 育

我国地方教育立法刍议 .....	陈立鹏(1.67)
学校公民教育:问题及其对策 .....	黄甫全(4.79)
关于依法建设教育强省的思考 .....	朱源星(5.71)
21世纪南中国教育发展畅想 .....	冯增俊(12.80)

## 香港研究

论香港土地管理制度的特色及其借鉴意义 .....	张富强(1.72)
香港正在成功地走向平稳过渡 .....	吴奕新(2.55)

## 澳门研究

浅释港澳档案所藏有关孙中山与澳门关系研究的一些资料 .....	(澳门)霍启昌(2.60)
明代两广总督对澳门商埠的设置与管治 .....	刘伟铿(2.66)
试析当前困扰澳门的两大经济问题 .....	雷 强 李句(4.61)
从政治发展看澳门历史分期 .....	[澳门]吴志良(4.64)
福建人与澳门妈祖文化渊源	
——兼与谭世宝先生商榷 .....	徐晓望(7.59)
龙思泰与《早期澳门史》 .....	章文钦(7.65)
论1999年前后澳门文化特征之保留及发展 .....	[澳门]魏美昌(10.62)
早期美国传教士在澳门的活动(1830-1844年) .....	林 芸(10.68)

## 学者访谈录

寻求现代化的历程与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	
——访博士导师朱立元教授 .....	本刊特约记者 王命前(1.82)
中国当代文艺学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	

——访博士导师陆贵山教授 .....	卢铁澎(2.85)
哲学博士访谈系列之一:欧阳康博士访谈录 .....	本刊特约记者 冯平(3.39)
龙泉明教授谈现代文学研究 .....	王毅(3.77)
哲学博士访谈系列之二:俞吾金博士访谈录 .....	本刊特约记者 冯平(4.30)
哲学博士访谈系列之三:李德顺博士访谈录 .....	本刊特约记者 冯平(9.44)
哲学博士访谈系列之四:王宏维博士访谈录 .....	本刊特约记者 冯平(11.48)

## 书 评·出版

### 一部研究广州史的集大成之作

——评《广州简史》 .....

宋德华(1.85)

《公有制与均贫富》出版 .....

(2.70)

### 宋庆龄研究中的重大成果

——《宋庆龄辞典》评价 .....

吴淑珍(2.87)

### 广东市场经济改革的理论“印记”

——读《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 .....

杨昌俊(3.80)

读《清诗流派史》 .....

陈永正(3.82)

### 东盟教育研究的扛鼎之作

——评《战后东盟教育研究》 .....

王学风(3.84)

### 馆藏档案的史料价值

——读《孙中山与广东——广东省档案馆馆藏海关档案选译》 .....

赵立人(4.84)

步出书斋 .....

徐中玉(5.75)

###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际出发

——读《市场经济的哲学研究》有感 .....

高齐云 黄椰婴(5.76)

### 内容丰富 刻意求新

——评《孙中山与中国国民革命》 .....

魏宏运(5.78)

### 当代中国词汇学的创造性成果

——评苏新春的《当代中国词汇学》 .....

宋永培(5.80)

### 流域:验证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区间

——延自《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概论》的一段思想 .....

郑英隆(6.81)

### 一部大长志气的好书

——读《广东通史》古代上册 .....

姜伯勤(6.84)

### 老树经霜志不摧

——读《卢叔度集》 .....

吴国钦(6.87)

漫议出版策划与编辑转型 .....

孙永怡(7.82)

评《广东近代文学史》 .....

倪建设(7.86)

### 秦汉史研究的新得与心得

——《秦汉史论集(外三篇)》述评 .....

刘汉东(11.84)

### 开拓古典“辨读”的新域

——《诗品辨读》简评 .....

郑训佐 凌惠卿(11.86)

在《广东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家文库》首发式上的讲话 .....

于幼军(12.5)

### 广东文化建设之路上的坚定一步

——《广东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家文库》(第一、第二批)评介 .....

王为理(12.7)

《广东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家文库》出版 .....

(12.1)

## 学术动态

- 广东省人大制度“依法治省”研讨会综述 ..... 陈家义(1.87)
- 对“爱国主义”的学理思考
- “爱国主义与时代精神”研讨述评 ..... 林有能(3.5)
- 广东逻辑学会 1996 年学术年会论点综述 ..... 黄绍汪(3.85)
- “慧能与岭南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 王承文(3.86)
- “中国道学与当代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 阮纪正(4.86)
- 坚定信心 抓住机遇 再上台阶
- 广东省理论工作会议综述 ..... 刘小敏(5.82)
- “审美心理流变与文化转型”学术研讨会综述 ..... 刘学兰 朱艳卿(5.84)
- 本地学界刍谈“广东社会语用建设” ..... 王 可(5.87)
- 历史与现实的交融
- “鸦片战争与香港”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 张 磊(6.5)
- 与历史同行 与时代俱进
- “张磊研究员从事学术活动 40 周年”座谈会纪要 ..... 王 杰(7.5)
- “名作细读研讨会”纪要 ..... 韦中华(8.97)
- 广东省第二次社会科学著作出版资助书目揭晓 ..... (9.1)
- 广东省社科界老专家举行座谈会 ..... (9.67)
- 第六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述要 ..... 王 可(11.87)
- 河源市社科联和云浮市社科联相继成立 ..... (11.20)
- 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繁荣社会科学研究
- “邓小平理论旗帜与社会科学研究”座谈会综述 ..... 本刊记者 哲 生(12.83)
- 香港回归后粤台关系展望研讨会综述 ..... 庄伟光(12.88)
- 粤澳关系研究的跨世纪展望
- 第十次粤澳关系研讨会综述 ..... 谭湛明(12.90)
- 关于经典的确立
- 广东现代文学研究会学术研讨会纪要 ..... 傅宗洪 唐正杰(12.92)
- (黄荣显整理)

# 学术研宄

ACADEMIC  
RESEARCH

'97·12 总第 157 期

·月刊·

- 社科综合类国际交流期刊
-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 广东省第一、二届优秀社会科学期刊
- 首届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期刊译奖获奖期刊

查 证

代号

索

包

ISSN 1000-7326



ISSN1000-7326  
CN44-1070

每月 20 日出版 定价:4.00 元